北京文博

2009.3（总 57 期）

● 文物工作

北京文物事业发展的历史成果

——对北京市文物局组建 30 年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 孔繁峙 (6)

新形势下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所的职责和任务 …… 张　展 (14)

● “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专栏

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工作 60 年历程 …… 王玉伟 (19)

北京考古六十年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3)

● 博物馆学

博物馆“大社教”构想初探 …… 杨丹丹 (30)

资料室如何适应博物馆的现代化进程——以首都博物馆为例 …… 王晓侠 (33)

● 考古简报

北京华能热电厂墓地发掘简报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36)

朝阳区北顶娘娘庙东侧清代墓葬发掘简报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43)

● 文物研究

北京市区县地上文物的分布及其自然人文特点

——近、远郊区县部分 …… 陈晓苏 (53)

关于元青花生产状况的几点思考 …… 陈　扬 (62)

清代雍正官窑单色釉的成就 …… 唐小萍 (66)

清乾隆皇帝的裕陵妃园寝 …… 付　幸 (73)

北京民俗博物馆馆藏丧俗文书 …… 李彩萍 (79)

● 北京史地

万寿寺行宫及其文化遗产 …… 孔祥利 (84)

北京文博

2009.3（总 57 期）

试谈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 …… 韩建识 (89)

翻阅昨天的照片 感受今天的发展

——前门商业大街老店铺的变迁 …… 叶　芷　周　莎 (93)

● 文物保护

明代《钟馗驾牛图》色彩分析 …… 何秋菊　楼朋竹　范胜利 (99)

●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 2009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尹　君 (102)

封面：北京天安门

封底：北京天安门广场

封二、彩插页：文物局专家榜

封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部分介绍（十）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主任**：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王　丹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　岗　王鸿年　巴爱民　卢迎红　许　伟

刘建业　刘超英　李建平　吴梦麟　宋大川　张若妮　张展(大)　张展(小)　陈　旭　赵其昌

郗志群　姚　安　耿春卫　高小龙　高凯军　郭小凌　崔国民　葛英会　韩　永　韩　扬

舒小峰　温桂华　谭烈飞

主　编：陈晓苏　　**编辑部主任**：韩建识

本期责编：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2009

CULTURA L RELICS WORK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Cause's Development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f 30 Years' Development sinc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Founded ····· *by* Kong Fanzhi(6)

Duties and Tasks of Appraisal Institute of Outbound Cultural Relics of Beijing under New Situation ····· *by* Zhang Zhan(14)

COLUMN OF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60 Years' Cours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Sites Protection Work of Beijing
····· *by* Wang Yuwei(19)

60 Years' Archaeological Work in Beijing ·····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23)

MUSEOLOGY

Tentative Study on Designs for Great Social Education of Museum ····· *by* Yang Dandan(30)

How Data Room Get Used to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of Museum
——A Case Study of the Capital Museum ····· *by* Wang Xiaoxia(33)

ARCHAEOLOGICAL REPORT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Cemetery of Beijing Huaneng Plant
·····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36)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Qing Dynasty Graves in East of the North Temple of the Goddess of Mont. Tai in Chaoyang District ·····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43)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Distribution and Natural and Humanistic Characters of Cultural Relics on the Ground in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Beijing——Part of the Suburb and Exurb ····· *by* Chen Xiaosu(53)

Thinking about Production Status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s of Yuan Dynasty
····· *by* Chen Yang(62)

Achievements of Official Kilns Monochrome Glaze during Yongzheng's Reign of Qing Dynasty
····· *by* Tang Xiaoping(66)

Imperial Concubines' Mausoleum in Emperor Qianlong's Yu Tomb of Qing Dynasty
····· *by* Fu Xing(73)

Funeral Customs Instruments Collected in Beijing Folk Customs Museum ··· *by* Li Caiping(79)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2009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Traveling Palace of Wanshou Temple and Its Cultural Heritage ····· *by* Kong Xiangli(84)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about Jinlushengmu Bell-Founding Niangniang Temple ····· *by* Han Jianshi(89)

Look over Yesterday's Photos, Feel Today's Development

——Changes of Old Stores on the Qianmen Commercial Street ····· *by* Ye Zhi, Zhou Sha(93)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Color Analysis of Painting of Zhong Kui Drives Cattle of Ming Dynasty ····· *by* He Qiuju, Lou Pengzhu, Fan Shengli(99)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2nd Quarter of 2009) ····· *by* Yin Jun(102)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iors:*Hou Renzhi,Li Xueqin,Lv Jimin*

Chairman:*Su Bai*

Vice-chairmen:*Kong Fanzhi,Liao Jingwen,Wang Shiren,Cao Zixi,Qi Xin,Ma Xigui*

Members:*Yu Ping,Wang Dan,Wang Danjiang,Wang Yuwei,Wang Youquan,Wang Gang,Wang Hongnian,Ba Aimin,Lu Yinghong,Xu Wei,Liu Jianye,Liu Chaoying,Li Jianping,Wu Menglin,Song Dachuan,Zhang Ruoni,Zhang Zhan(Elder),Zhang Zhan(Younger),Chen Xu,Zhao Qichang,Xi Zhiqun,Yao An,Geng Chunwei,Gao Xiaolong,Gao Kaijun,Guo Xiaoling,Cui Guomin,Ge Yinghui,Han Yong,Han Yang,Shu Xiaofeng,Wen Guihua,Tan Liefei*

Editor-in-chief:*Chen Xiaosu*

Director of Edtiorial Department:*Han Jiansh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Han Jianshi,Chen Qian,Gao Zhiwe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Book and Data Centre,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URL: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bjwb1995@yahoo.com.cn

北京文物事业发展的历史成果

——对北京市文物局组建30年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孔 繁 峙

30年前，在首都社会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洪流之际，市委、市政府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和首都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于1978年底组建了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从此，北京文博工作作为全市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正式拉开了序幕。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也开始伴随着首都城市的时代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与首都其他行业一样，全市的文博工作在首都城市翻天覆地的建设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岁月，不断地改进观念，与时俱进，紧密围绕和推动首都“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不断地发挥着文博事业在首都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一、北京文博事业30年发展历程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组建于1978年11月28日，恰好是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刚刚起步的伟大历史时刻；北京市文物工作的发展壮大，正好是处在首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和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回顾北京市文物局组建3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使我们深切的感受到，全市文博事业30年来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变化；北京文物事业的成长道路，走的正是一条文物工作为首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发展道路；北京文物事业30年经历了一个全市几代文物工作者为之奋斗并不断探索在首都城市建设与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中推进文博工作发展的历程。

北京市文物局自组建以来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全市文物事业的起步阶段（1978年—1988年）

市文物局在1978年底组建之时，正处于我国“文革”全面结束与实施“改革开放”的初期，面对十年内乱给文博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与严重干扰等被动局面，全市文物工作起步艰难，特别是建局之初的几届老领导及一批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在当时保护历史文物缺少社会支持的环境下，凭着崇高的职业责任感和对祖国历史文化高度负责的精神，顶着来自于各方的困难和压力，在当年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奋发进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开展了文物保护与推进博物馆建设等各项工作，在首都城市建设发展的步伐中，艰难的开创了北京市文物事业，这一时期全市各项文博管理工作的建立与形成，为此后首都文博事业的发展与壮大，写下了闪光的开篇：

——制定并实施了全国第一部省市级文物保护法规，使首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有了法规依据。市文物局组建之初，正面临“十年动乱”对祖国历史文化造成严重破坏所遗留的被动局面，文物保护不被社会所关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全市范围内文物盗窃、破坏事件时有发生，文物建筑受到建设开发及不合理利用的严重冲击。针对当年首都文物

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市文物局在组建初期，即着手研究和制定了有关全市文物保护的行政规章和法令。特别是在1981年经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是北京市颁布的第一部文物保护的专项法规。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北京地区自“十年动乱”时期破坏文物时代的彻底结束和依法实施文物保护的新时期的到来。

——建立了全市各级行政区域内的文物管理工作机构。为适应首都地区文物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并实现对各类文物实施有效的保护，我市首次在全市18个区县政府部门设立了负责本区县文物保护工作的专门机构——区县文化文物局，使区县政府部门首次担负起管理文博工作的职责，在全市初步形成了市、区（县）两级文物行政管理体制。为有效地实施管理工作，各区县都分别设立了“文物科”和“文物管理所”等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此外，一些文物大区还在乡、镇、村普遍建立了兼职的文物保护联络员，为全市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机构和人员保证。

——设立了北京市专题从事文物保护、研究的科研机构——市文物研究所和市古建研究所，全面负责北京地区的考古研究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等科研工作。

——召开了北京地区第一、二次文物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自“文革”以来全市文物保护的状况，针对首都文物保护工作的突出问题，首次制定并提出了具有北京特色的文物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开展了“十年动乱”后的全市文物大普查工作。针对“十年动乱”对北京历史文物的破坏状况，这一时期先后组织18个区县开展了两次全市性的文物大普查。按照规范的标准，全市共登记各类文物7309项，普查的广度、深度和文物内容之丰富都超过了1958年全市第一次文物大普查，为全市文物工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两次普查的基础上，全市有18项重点文物单位报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文物单位；市政府批准并公布了144项市级文物单位；各区县政府先后公布800余项区保单位和暂保单位。

——及时抢险修复了一批重要的历史文物建筑。建局之初，在市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市文物局采取了各种措施，对全市一大批级别高、影响大但破损严重的文物建筑开展维修保护工作，1979年即启动了国子监、五塔寺、白塔寺、东南城角楼、德胜门箭楼等重要文物建筑修缮工程，1982年开展了慕田峪长城的维修；1984年启动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掀起了保护维修长城的热潮，引起了社会对文物保护的关注。

为了妥善处理首都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这一时期对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分批开展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建设与保护的矛盾。

——初步建立了首都区域内的文物保护的专家组织，组织和动员了关心首都文物工作的以著名专家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开展全市文物保护活动，正是在侯仁之、单士元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不断呼吁下，方使得在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的突出问题不断得到解决。

这一时期，是北京文物工作的建立与完善时期，是北京文物事业的起步阶段，经过这十年的发展，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首都文物工作的管理体制，形成了一套文物管理规范与制度，开始探索首都文物保护工作深化的内容与发展方式，为首都文物工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阶段，北京文物事业完善与发展阶段（1989年—1998年）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首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首都文物事业也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文博各项工作得到全面推进：

——研究制定了新形势下全市文物工作发展的方针和工作思路。市政府针对首都文物工作的特点和发展状况，及时研究制定了首都文物工作“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方针，明确了在首都的建设发展中做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关系。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不断出台新的举措。1991年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名单，旧城内的国子监街、什刹海、东交民巷等24条历史文化街区，确定为具有名城价值的历史建筑加以保护。对于残存的部分城墙遗迹都采取了保护措施，“危房改造”工程是这一时期名城保护的突出矛盾，为在全市开展的“危房改造”工程中妥善处理改造工程与古都保护的关系，在旧城的不同区域开展了一系列危房改造试点工作，结合危改工程中不断发现的大量城砖，在广大市民中开展了“捐城砖、修城墙”的活动，提高了市民保护名城的热情和积极性。

——北京地区博物馆建设呈现了快速发展趋势。在博物馆建设上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单纯由政府投资建馆的局限，逐步出现了政府、社会、国

家、集体、个人多种体制投资建馆的新局面，其中私人建立的博物馆在此时已出现了十余家。与此同时，行业性博物馆开始大量涌现，工艺美术馆、地质博物馆、钱币博物馆等一批行业博物馆在不断的丰富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种类和内容。

——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科研成果。在中国社科院等科研部门的参与下，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首次确立了北京建城之始的房山琉璃河商周城址的建城年代。围绕着这一重要的科研成果，市政府隆重举办了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庆祝活动。此外还取得了金陵调查、金中都水关遗址以及王府井古人类生活遗迹等多项考古科研成果。

——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在文物经营活动中得以确立。随着首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归口经营、统一价格”的文物经营方式被彻底打破，以“古玩城”为代表的旧工艺品市场迅速发展，经营活动空前活跃；文物拍卖公司作为文物经营的一个新行业，也在经历了一场社会的关注与争论后得以确立，翰海、中商、嘉德等一批拍卖公司都以突出的经营业绩，迅速成为国内著名的文物经营企业。以文物商店、文物拍卖和旧工艺品销售为主体的新的市场格局的形成，使北京文物市场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第三阶段，文博事业跨越式提高阶段（1999年—2008年）

这一阶段的文博工作，正处于北京奥运会的申办、筹建到举办的关键时期，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众多的历史建筑遗迹，将成为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上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历史精华。因此，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为北京历史名城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推动了首都文博事业跨越式的发展。这一时期首都文博工作的发展与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奥运标准促进文博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一时期的文博工作，坚持以奥运为重心，落实了“人文奥运”的理念和目标，发扬了努力追求与积极奋进的奥运精神，增强了为奥运做贡献的责任感，极大的促进了文博系统广大干部在认识观念上、管理方式上、保护理念上和工作水平上的不断提高，进而实现了文博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如在文物保护和遗产项目的保护方式、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工作观念，学习和借鉴了国际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和方法，突出了国际公认的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北京地区的六大“人类遗产”项目全部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外围缓冲区的保护方式，使我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现了同国际社会的“对接”；在全局各文博单位坚持了奥运标准和“人文奥运”的理念，不断提高文博队伍的思想素质和认识水平，经过几年的努力，全面提升了各单位的整体工作水平，各博物馆在馆容馆貌、内外环境、展陈效果、接待讲解、礼仪服务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都逐步达到了奥运接待工作的标准。特别是在奥运前建成并开放的新首博，由于坚持了奥运标准，该馆在开放之初即在管理方式、工作理念、运营方法、展览陈列、服务接待和工作水平等各方面，都较老首博实现了一个飞跃，整体工作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开馆之初即先后引进法国、英国、美国、希腊等国的著名博物馆开展的多项合作展览项目，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文物建筑的维修保护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果。由于长期以来全市文物保护经费的严重不足，致使全市的历史文物建筑普遍破旧衰败，为彻底改变我市文物保护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并为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市政府做出了对全市文物建筑开展大规模修缮工作的决定。自2000年以来，全市先后启动“3.3亿”文物抢险工程和“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围绕着市级以上的重点文物建筑，以北京名城的“两线、一街、一区”和“两线、五区、六景”为重点区域，开展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物建筑的抢险修缮工程。首先完成了南起永定门、天坛、先农坛、正阳门箭楼、城楼、天安门、故宫、景山、后门桥到钟鼓楼这条古都城市中轴路上文物建筑的修缮工程，同时对位于朝阜路上的白塔寺、历代帝王庙、广济寺、大高玄殿、北大红楼、大慈延福宫、孚王府等重点文物单位进行修缮。经过一系列的整治维修措施，初步恢复了古都城市内的什刹海、国子监街、皇城等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普遍修缮了京西寺庙景区、三山五园、明十三陵、长城和卢沟桥、宛平城等著名文化景区的文物建筑。

长达8年的“3.3亿”文物抢险工程和“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如期完成，取得了全市文物保护工作历史性的重大成果，共修缮文物保护单位139项，其中一批著名的文物建筑经过修缮后首次实现对社会开放，初步扭转了全市文物建筑多年失修的被动局面，首次实现了全市的国家级文物单位无险情、市级开放的文物单位无重大隐患的目标，全市的文物保护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一大批文物建筑在奥运会期间向世界展示

了其原有的历史面貌。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进入整体保护的新时期。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始终存在着首都发展与古都保护的矛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北京申奥成功而开展的奥运建设工程以及首都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使北京名城的保护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为了从根本上协调现代建设与名城保护的关系，在奥运筹建的关键时期，市政府于 2004 年及时制定并报经国务院批复了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首次提出了对北京城市的功能做出战略性的重大调整。新修订的总体规划，同以往的城市规划相比，取得了两项重大的历史性突破：一是对古都城市怎样保护的问题，首次提出了“北京名城整体保护”的构想，突出强调了对名城的保护，城市的建设发展要服从名城保护的需要；二是对首都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功能调整，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新城发展的战略举措，新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的都市功能将规划在旧城之外。按照新的城市规划，北京名城的保护与首都新城的建设将在两个区域内，分别向保护与建设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在新的规划实施以后，旧城内以拆除四合院为代价的“危房改造”已全面停止，转而开展了胡同、四合院的维修保护，一大批现代化的建设项目和娱乐设施、现代商城都逐步调至旧城之外。“名城整体保护”规划的实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多年来北京名城保护的被动局面。30 年来，对北京古都的保护，从最初的文物建筑的保护、历史街区的保护，发展到对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最终达到了古都保护与首都建设的和谐发展，标志着北京名城保护工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博物馆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自 2000 年以来，随着首都迎奥运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加快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工作的落实，北京地区博物馆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就是新首都博物馆的建设与开放。多年以来，由于市财政资金不足等原因，首都博物馆自 1981 年成立以来，其馆址始终处于孔庙内，由于“馆庙合一”，其展陈面积及保管条件，均不能承担起首博综合馆的任务，这一时期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建设新首博的决定，用了 5 年时间，终于在长安街上建成了一座大型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功能完备的现代化新首博，并成为奥运期间迎接各国宾客的重要活动场所。

这期间，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建设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首都地区多种体制发展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推动了博物馆的建设发展，社会办馆的热情出现了新的高潮，中央部委、市府委办局、区县部门、集体、个人以及外省来京办馆等等，使得北京地区拥有的博物馆注册总量由 1999 年的百余座，发展到 2008 年的 144 座，全市各类博物馆每年以 500 余个固定陈列和 400 余个临时展览等多种形式和内容，展示着首都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建设成就。博物馆工作已成为体现首都文化中心的重要内容。

——科研与考古工作取得了新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首都加快了城市文化的建设速度，为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的建设目标，丰富首都的社会文化生活，市文物局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发展，加大了科研工作力度，逐年增加了科研出版经费的投入，加快了科研成果的立项与出版。这一时期，在局的行政机构中首次设置了局考古科研处，专题负责全市文博系统的科研工作。为推动文博科研工作的发展，召开了北京文博系统科研工作大会，研究制定了文博系统科研工作发展规划和文博人才培养规划，成立了局学术委员会和科研评审机构，提出了全局科研工作的目标和要求，特别是加大了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扶植、培养工作，通过选拔的方式，对业务突出的科研人员采取境内、外在职培训、进修、代培等多种方式，不断推动文博科研人员的快速成长。

为配合首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奥运筹建工程而开展的考古科研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一时期完成了一大批首都重大工程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一批新的收获，其中最突出的是圆满完成了南水北调工程中北京地区 80 公里地段的考古勘察、发掘和完成了奥运工程中 18 个场馆建设工地的考古发掘工作，仅配合奥运场馆工程进行的考古勘探面积就达到 158 万平方米，清理两汉以来各代墓葬 700 余座，随着工程的完成，陆续出版了一批考古发掘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

这一阶段的文博工作正处于北京奥运会的申报、筹备和举办的整个过程，文博工作一方面是充分利用古都北京深厚浓郁的民族文化为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提供东方特有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是借力首都奥运筹备这一历史机遇极大的提升了文博自身的整体水平。

二、正确地认识和看待市文物局建局

30 年来的文博工作

怎样认识和看待建局 30 年以来所经历的三个“十年”的文博工作，是关系到如何正确总结建局 30 年来首都文博工作的经验，也是关系到全市文博工作怎样继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总结和研究首都文博 30 年工作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三个“十年”的工作进行比较后，会有人这样认为：在 30 年工作中，还是第一个“十年”的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小，全市的历史建筑在第一个“十年”保留的多，拆的少；而后一个“十年”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太大，旧城的历史建筑拆的过多，保护工作还不如前“十年”；还有人会认为，后一个“十年”全市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工作十分突出，博物馆建设的速度快，文物市场活跃等，这些发展变化是前“十年”所没有的，等等。

上述不同看法的关键，是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建局以来三个“十年”的工作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在认识、评价和总结建局 30 年工作的时候，必须防止两种片面的看法：一种是在肯定近年来全市在文物建筑修缮、博物馆建设、文物经营等方面的工作成果时，有意无意地贬低第一个“十年”或第二个“十年”的工作成就，认为第三个“十年”文物工作最突出；另一种看法是认为，建局之初的第一个“十年”全市没有大型的建设工程，大面积拆的少，历史名城的原有格局和古都风貌保存的好，从而否定第三个“十年”中的名城保护工作等等。

怎样认识和看待市文物局建局以来三个“十年”的工作呢？

第一，要充分肯定文物局组建后第一个“十年”的工作。特别是要肯定建局初期的老一辈领导和文物工作者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能顶住“文革”遗留的消极影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采取了多种措施，开创了全市的各项文博工作，为全市的文物保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北京文物事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要充分肯定建局 30 年来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工作。“三个阶段”的文博工作是密切关联的，不能截然分开，如同一座自下而上建成的大厦一样，“三个阶段”的工作发展，是一种继承关系，是一个整体，同等重要，如果没有第一个“十年”所打下的基础，就不会有第二个特别是第三个“十年”的发展；如果没有当年老一辈领导和老同志在第一个“十年”的开创性工作，也就不会有眼下第三个“十年”所取得的突出成果，更不会有今天如此规模的首都文博事业。

第三，要充分肯定建局 30 年来每一个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市文物局建局以来的 30 年历程是不平凡的，除了全市政治影响的因素外，这 30 年来文博工作的发展曾走过弯路，曾遇到过诸多曲折，曾开展过多次探索，30 年来，每一代文博工作者都为首都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努力，首都文博事业在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是建局 30 年文博事业整体发展的共同成果。

三、建局 30 年文物工作发展取得了五个方面的突破

（一）在文物的认识观念与保护思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建局之初，整个社会经济正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人们对历史文物的认识以及文物的作用，也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在社会上也只是适应某一阶层的需要，距首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百姓生活还十分遥远。随着建局以来的首都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尤其是首都广大民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日渐旺盛，在首都历史文物的保护利用与宣传的影响作用下，人们对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认识，也逐步发生了重要转变。在人们的观念中，北京的古代建筑及各类文物，已从以往的历史遗存物，成为北京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载体，承载着首都历史发展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信息，已成为新时期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特别是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文物工作的深入发展，我们对文物的认识特别是对文物工作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正逐步发生着重大变化，文物工作的范围及领域有了空前的扩展，全市的文物工作已从当初的文物保护单位扩展到对历史街区、近现代优秀建筑、工业遗迹、历史村镇、四合院胡同以及历史名城的保护；文物保护的概念已从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物的保护、研究、利用、开放、宣传等工作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工作体系。

自建局以来，随着首都社会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物工作也实现了一个从最初的封闭状态向对外开放的转变，首都文博工作的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活动发展迅速，全市文博工作积极参与和不断扩大与国际文化遗产的交流活动。北京地区历史建筑中的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天坛、

长城、颐和园、十三陵等六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人类遗产项目，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在不断学习和借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开放的先进经验及理念，国际视野下的文物管理、保护的认识及观念正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二）在古都名城的保护观念与保护方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参与北京名城保护是建局以来逐步形成并不断扩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北京自 1949 年以来，就产生了古都保护与首都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对古都城市的保护，是在首都的建设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工作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为在首都城市的发展中协调好古都城市的保护工作，北京市最初采取了“重点保护”与“重点建设”的方式，兼顾首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由于当时还未能提出名城保护的概念，所以延续数百年的老北京城墙在首都城市的发展中消失了，成为北京名城保护中的一个永久遗憾。至 80 年代以后，国务院提出了在城市发展中要注意做好历史名城保护的要求，这一时期的首都城市建设规划，首次提出了在城市建设中保护北京旧城轮廓、保护城市中轴建筑和重要历史建筑等名城保护的概念。进入 90 年代后，市政府先后公布了 33 片历史文化街区，以便在城市建设中协调与名城保护的关系。但是，随着首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古都的传统保护与首都的现代建设的矛盾就越发突出，特别是随着北京申奥成功而在全市广泛开展的奥运筹建工作，以及首都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使北京名城的保护与首都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为彻底解决这一历史矛盾，市政府于 2004 年及时制定并报经国务院批复的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首次提出了北京名城整体保护的构想，首都城市的功能将按照“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发展布局首次做出战略性转移，此后名城的保护与新城的建设将在两个区域内，分别向保护与建设两个不同方向发展。“整体保护”方式的实施，是北京名城保护工作的一大突破，将从根本上摆脱以往名城保护的被动局面，并为名城的全面保护开拓了无限的发展空间。

（三）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利用与延续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伴随着古都发展而延续至今的最具传统特色的民居建筑，是北京名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以往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旧城内为数众多的胡同、四合院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没能作为历史名城的重要内容加以保护，长期以来更是忽视其胡同四合院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而是一味的追求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价值。由于多年失修和居住人口的激增，很多四合院都成为建筑破旧、居住拥挤、环境恶劣的大杂院。90 年代的“危房改造”和扩路工程，又使一批胡同四合院在城市建筑中消失了。相对于文物建筑的保护而言，对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却是一项起步晚、措施滞后的十分艰难的工作。尽管市政府在 1990 年以后陆续公布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措施，但由于政府财力不足等多种原因，致使全市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直至 2004 年北京新的总体规划的实施，才首次将胡同四合院的保护赋予了名城的意义，实现了胡同四合院从使用向保护的转变，延续至今数百年历史的胡同四合院由此获得了新生。从此，旧城内开展了以保护胡同四合院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整治工作，先后开展并完成了国子监大街、南北锣鼓巷、什刹海、鼓楼东大街、烟袋斜街等历史街区的整治工作，极大的改善了历史街区的传统环境。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胡同四合院维修、管理规定，每年投入巨资（自 2008 年开始每年投资 10 亿）对旧城胡同四合院开展了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工程，极大的改善了胡同四合院的生活环境和居住质量，使胡同四合院的传统建筑形制和名城历史风貌得以延续。

（四）博物馆建设从政府建馆向社会办馆的多种体制的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在建局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投资建馆始终是博物馆建设的主体。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加快了首都社会、经济、文化的前进步伐，促进了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及社会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了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国民经济实力的提升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办馆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几十年来，北京地区的一大批在市场经济领域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经济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因日益关注企业的文化形象，而开始加大本行业的文化建设的工作力度，一大批中央在京的部委、市属单位、集体和个体企业，都在经济实力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纷纷参与到行业办馆的建设行列，从而不断丰富着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内容与种类。如银行系统建成中国钱币博物馆、铁路交通部门建成铁路博物馆、网通公司建成了电信博物馆、公安部门建设了警察博物馆，以及相关行业建设了自来水博物馆、

戏曲博物馆、医史博物馆等等，文物爱好者个人也先后建成绘画、陶器、家具等20余座私人博物馆。社会各部门及民众积极参与博物馆建设，不但极大的丰富了首都文化内容，加快了北京地区文化建设的发展步伐，而且初步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建馆的单一体制，使北京地区博物馆建设形成国家、集体、个人多体制投资、多渠道发展博物馆事业的新格局。

（五）流散文物管理与流通方式取得了重大突破。民间传世文物的流通与管理，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建局之初，在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文物市场管理与文物的经营是一种专营体制，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及不断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在文物市场经济活动中得以确立，从而打破了文物独家经营的历史格局，彻底改变了北京地区文物“归口经营”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经过近30年的发展后，全市已形成全国规模最大、营销人员众多的旧工艺品市场和文物经营市场以及文物拍卖市场，其中仅文物拍卖年经营额就超过百亿元。首都文物市场的这一巨大变化，促进了民间传世文物的交流，极大的丰富了首都社会文化生活。

四、建局30年全市文物工作发展取得五项历史成果

一是，全市文物建筑的保护维修工作取得重大成果。自建局30年以来，已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市文物大普查工作，及时掌握了各时期全市文物的保存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公布了六批209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向国务院上报了五批79项国家级文物单位名单，全市各区县政府先后公布了700余项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全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已从建局初的19项国家级单位增至98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从建局初的15项增至224项；故宫、长城等六项文物单位被公布为世界人类遗产项目；98%的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已完成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文物建筑的保护维修始终是历年来的一项重点工作，从1979年建局之初，即开始对国子监、五塔寺、白塔寺等文物建筑的抢险工作，此后，随着全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政府不断加大对全市文物建筑保护维修的投资力度，目前，全市用于文物建筑的维修资金已从建局初期的每年几十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每年1.5亿元，为建局初期的200余倍。自2000年以来，在全市先后实施了“3.3亿”文物抢险工程和“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围绕着“整治两线景观，恢复五区风貌，重现京都六景”开展了大规模的维修工作，长达8年时间，共修缮文物保护单位139项，修缮面积近33万平方米，消除了66个文物单位的安全隐患；修复后扩大开放的文物单位有58处，修复后新开放的41处，全市一大批价值高、影响大的历史文物建筑如天坛、颐和园、永定门城楼、纪晓岚故居、历代帝王庙等一批重要建筑的保护与开放，普遍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好评，并为北京奥运会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二是，北京地区博物馆建设取得重大成果。博物馆是首都文化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一个国家或首都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水平，建局30年来，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北京地区博物馆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业绩。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市文物局几届老领导曾筹备多年的首都博物馆，经过5年的筹建终于在北京奥运会前落成了，一座总投资12亿元的现代化大型博物馆，已成为我市对外展示首都文化的重要窗口。目前，北京地区拥有注册的博物馆总数，已由1978年建局初期的38座，发展到2008年的144座，并初步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博物馆系列，已成为一项门类众多、体制多样并具有较大规模的博物馆事业，其类别已从建局初期较为单一类型的博物馆，发展为现在包含有历史类、自然类、社科类、民俗类、军事类、科技类、遗址类等多种行业及内容。每年举办的展览涉及到首都的历史、教育、生产、文化、科学、金融、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每年向社会推出的展览超过400项，每年接待国内外观众量超过3000万人次，博物馆已成为首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特别是经过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的发展与提高，全市博物馆的整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各博物馆在陈列方式、展陈手段、展览内容、接待礼仪、讲解服务以及馆容馆貌、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一批中央在京博物馆和部分市属博物馆的整体工作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三是，民间流散文物的保护取得了历史性成果。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北京文物市场自建局30年来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和民间文物、旧工艺品流通的空前活跃，极大的带动了我国历史文物价值的大幅提升，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正在急剧地改

变着多年形成的中国历史文物价格较欧洲历史文物价格极不合理的悬殊比价，在目前的文物市场上，相同种类的单件文物从建局初期的千元、万元、十万元的最高界限，逐步达到了近年来的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亿元以上的升值，使我国历史文物的国际价格与欧洲国家历史文物的价格差距急剧缩小，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历史文物的国际地位及文化影响。由于国内文物价格的不断攀升并最终超过某些国外市场的价格，这一重大变化，使得多年形成的中国历史文物以各种渠道“流失”海外追逐高价的做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国早年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正逐步形成回流之势，在全市每年举办的几十场大型文物拍卖活动中，海外“回流”的中国文物已超过万件之多，其中一批早年流失海外的文物珍品，正是在文物拍卖的活动中，又重新“回归”祖国。这是建局以来全市文物保护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

四是，文物科研与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多项成果。自建局以来，以市文物研究所和市古建研究所为主体的科研工作，在各文博单位的积极参与下，紧密结合首都的发展建设和全市文博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在文物研究、古建保护技术和考古发掘以及博物馆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古建研究所在全市的文物保护修缮工作中，开展了多项历史建筑与近现代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批古建保护的科研成果，使全市很多重要的文物建筑得以原样保护与延续。如 90 年代在对长城的保护修缮工程中，成功的研究并采用了传统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通过对司马台长城历史残状的加固、保护，使此段长城的历史原貌得以延续，此种保护方法得到国际遗产组织的高度评价；在对湖广会馆修缮工程中，通过采用专项科研手段，使建于清中期的会馆大戏楼主梁得以保护并继续使用，从而使整座建筑的历史价值得以保留。

局属各单位都将科研工作列为年度的重要工作之一，全局各单位每年撰写科研文章 150 篇以上。各博物馆不断深化对本馆历史建筑的研究工作，不断地出版新的研究成果。近 30 年来，各馆对孔庙、国子监、万寿寺、五塔寺、大钟寺、大觉寺、先农坛、德胜门、正阳门、智化寺、大葆台、水关遗址等历史建筑的研究成果都已逐步形成系列性的丛刊或专著。

全市的考古研究工作，在首都城市建设发展的环境下，紧密围绕着北京名城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开展考古研究工作。30 年来，在考古研究与史学研究方面，获得了众多的科研成果：对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的考古与研究，取得了北京建城于公元前 1045 年的重大科研成果，并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对王府井古人类遗迹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北京地区二万三千年前古人类生活状况和气候、植被的科研成果；对门头沟东胡林人墓葬的考古与研究，取得了一万一千年前北京地区古人类山区生活与生产发展水平的科研成果；对延庆山戎墓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北京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山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及其特色的科研成果；对大葆台、老山西汉王陵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北京地区汉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及其葬制文化的科研成果；对金陵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对金代皇陵建筑规制及葬制的科研成果；对金中都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宋金时期水关工程建筑做法及金中都水系走向的科研成果；配合“西厢工程”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对金中都宫殿的位置及基础做法的认识；对毛家湾大型瓷片坑的发掘与研究，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明代瓷器种类及装饰手法的认识等等。众多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极大的完善和丰富了北京名城发展的历史和北京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内涵。

五是，文博队伍建设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果。建局初期，全局从事文博岗位的有学历的专业人员不足 50 人，多局限于考古、鉴定及首博等专业岗位上。经过 30 年的发展，仅市文物局系统已形成超过 1000 人的文博工作队伍，全局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员超过600人，其中博士生20人，硕士60人，本科生超过 200 人，取得中级以上文博职称的业务人员接近 180 人。目前在全局的古建研究、考古发掘、文物鉴定、市场管理以及各博物馆的征集、保管、研究、展陈、社教、讲解等各个专业岗位，已初步形成一支知识结构和职称结构较为完善的文博专业队伍。

市文物局自建局 30 年来，经过几届文物工作者的共用努力与奋斗，全面承担了保护首都文物的重任。今天，我们透过建局 30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仍能在首都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中，看到文物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这 30 年的发展，已经使北京文物保护工作登上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舞台并在世界上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当前，首都“人文北京”建设发展目标的确立，是后奥运新形势下全市文物发展的又一次历史性机遇，全市的文物工作必将再次实现新的飞跃。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新形势下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所的职责和任务

张展

对文物进出境行为进行管理，是《文物保护法》赋予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止珍贵文物流失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世界各国保护文物的通行做法，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内文物流通日益活跃的今天，做好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对于我国历史文物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于1951年就建立了文物进出境审核制度。几十年来，为国家保护了上百万件禁止出境的珍贵文物。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家文物局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指定口岸出境。我国文物法明确规定：国有文物、非国有文物中的珍贵文物和国家规定禁止出境的其他文物，不得出境。然而即使在今天，我国每年仍有大量

的文物通过各种文物流通渠道流向境外，其中不乏文物珍品。加强文物进出境审核监管，统一审核标准、严格审核程序、提高审核效率，对于严把国门、维护国家文物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是遏制文物流失现象的重要关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文物出口政策。目前，我国已在北京、天津等地设立了 14 个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政策水平和专业能力的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队伍，初步建立了文物进出境管理的法规制度体系框架。

2002 年 10 月，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专设了“文物进境出境”一章，充分显示了国家对文物进出境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2007 年 7 月，文化部颁发的《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由国家文物局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组建，机构性质是文物行政执法机构。目前，各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年审核文物数量达 40 余万件之多，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文物非法出境及非法转让行为的发生。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文物进出境审核的工作量逐年增长，审核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也不断加大。

一、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是严把国门、杜绝文物非法流失的重要保障

我国不限制文物进境，但对文物出境实行严格限制，并且实行文物出境许可和申报制度。按规定，珍贵文物禁止出境，一般文物限制出境。

根据 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 196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个人携带或托运、邮运出口的一切古化石和古旧的陶瓷、铜器、金银器、玉石、竹木牙角雕刻、漆器、家具、书画、碑帖、拓片、图书、文献资料、织绣、文房用品，以及货币、器具、工艺美术品等，均须事先经过文物管理部门鉴定，并在携运出口时，由携运人（或代运单位）主动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管理部门钤盖的火漆标志及加盖“外汇购买”章的文物销售发货票，或文物管理部门开具的文物出口证明查验放行。凡不符合上述手续的，按以下规定处理：对于携运人已向海关如实申报但未经鉴定的，海关不予放行；对于携运人未向海关申报或伪报物品名称及规格的，不论是否匿藏，均按走私论处。

我国参加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要求各缔约国采取措施，防止文物的非法进出口和非法转让，规定缔约国应“发放适当证件，出口国将在证件中说明有关文化财产的出口已经批准”，“除非附有上述出口证件，禁止文化财产从本国领土出口”，也就是说，未经许可，携带、运输、邮寄文物出境均属非法。

文物进出境鉴定是指对申报出境的文物，依据《文物保护法》及国家规定的文物出口界限和鉴定标准，进行鉴定、查验，决定其能否出境。198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文物出口和个人携带文物出境，都必须事先向海关申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鉴定，并发给许可出口凭证。文物出境必须从指定口岸运出。经鉴定不能出境的文物，国家可以征购。第二十八条规定：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除经国务院批准运往国外展览的以外，一律禁止出境。这为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文物进出境鉴定机构是代表国家进行文物进出境审核的专门机构，在当前文物走私和非法交易活动仍然十分严重的形势下，这是文物保护事业的一项关键性管理措施。多年来，文物鉴定部门紧密配合海关，对文物销售单位所销售文物、私人携带出境文物以及暂时进出境文物进行鉴定审核，保障了对文物正常出境的监管，截留了大量依法不准出境的文物，包括相当一部分珍贵文物。

出入境文物鉴定是文物出境前的一道重要专业“门槛”。经过鉴定后允许出境，相关文物将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国家因此会失去对该文物的有效控制。所以要求鉴定人员必须明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熟练掌握鉴定标准、控制宽严尺度，坚决防止重要文物流出国外。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所文物出入境鉴定内容又包括：销售单位申报出境的文物鉴定、私人所有并携运出境的旧存文物鉴定、暂时进出境文物鉴定、文物监管物品的鉴定（主要是指旧家具）。

二、文物出境鉴定标准和范围的调整

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

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实物，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活动的代表性实物，是受国家保护的可移动文物。上述文物出境，应当经过审核。《文物保护法》还规定，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文化部发布了部门规章《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管理办法》。根据此办法，将古猿化石、古人类化石以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四纪古脊椎动物化石列入禁止出境文物范围。

我国的文物出境限制从一开始就是很严格的。在原有的出境标准规定中存在两种不同的限制方式，第一种叫做“一律不出口”，也就是说不论年代如何，其珍贵程度、特殊意义等达到一定级别就不允许出口了；第二种是根据不同的文物情况分类以年代设槛，这种限制方式中，年代成为衡量一些文物能否出口的重要标准。

1960 年文化部《关于文物出口鉴定标准的几点意见》规定：1、以 1949 年为主要标准线，凡在 1949 年我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前制作、生产或出版的具有一定历史、科学和文化艺术价值的文物、图书，原则上一律禁止出口。2、革命文物，不论年限，原则上一律禁止出口。3、凡是有泄漏国家机密，或扭曲、丑化我国人民，或政治上有不良影响的文物、图书，一律禁止出口。4、少数民族的文物，1949 年以前生产的暂时一律不出口。5、凡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和艺术水平的艺术创作、原手稿等，原则上禁止出口。6、对于有计划组织出口的一般文物，应根据文物的类别，分别划定以下两个不同的年限：（一）一部分以 1795 年为限（即清代乾隆六十年为限），凡 1795 年以前的一律不准出口。（二）一部分以 1911 年为限（即清代宣统三年辛亥以前为限），凡 1911 年以前的，一律禁止出口。

2005 年 12 月，国家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按照通知及有关精神，2006 年国家文物局将文物进出境分解为三项工作内容，其中第一项就是进一步完善《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另外两项则是对进出境文物的体制管理以及文物进出境工作鉴定机构、体系、人员等进一步规范，根据上述工作，出台新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以及《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其中的最重要的调整之一就是对于个人携带出境文物年代下限的修改，即由 1795 年推后至 1911 年——清代中晚期的文物价值被得到了新的认定。

国家文物局从 2004 年启动了文物出境标准的修订工作，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文物进出境的状况，并广泛听取了各界意见，在专家的参与下，修订了文物出境标准。1960 年版《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诞生于 50 年前，标准起草时对于一些文物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些与今天是一致的，但也有一部分因为历史的发展已有了变化，在当初认为珍贵程度一般的，而现在已不可多得。有了这样的形势变化，出境限制年限后移也就顺理成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众对民族文化遗产认识的丰富，保护意识的增强，旧标准已经不能适应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国家文物局为此陆续颁发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对化石、古籍、古建筑构件、建国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等作出了补充规定。这些规定一并纳入了新标准。2007 年 7 月 3 日，国家文物局下发新的《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和《文物出境审核标准》。

2007 年版《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将文物分为六类：1949 年以前的各类艺术品、工艺美术品；1949 年以前的手稿、文献资料和图书资料；1949 年以前的与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有关的实物；1949 年以后的与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代表性实物；1949 年以后的反映各民族生产活动、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的代表性实物；国家文物局公布限制出境的已故现代著名书画家、工艺美术家的作品。

根据新文物出境标准，将 1960 年标准中个人携带文物禁止出境的下限时间由原来的乾隆六十年，也就是 1795 年，后移至 1911 年，1911 年成为文物出境审核的一条基本准线，整整推后了 116 年。凡此前生产、制作的文物一律禁止出境。这是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于文物出境标准的首次重大调整。同时，针对少数民族文物流失严重的情况，为加大少数民族文物的保护力度，新标准将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物禁止出境年限设定为 1966 年。

本次国家文物局的调整应该说与国际惯例的年限比较接近。其实，我国对于保护历史文物一贯重视，政策调整一脉相承。像原规定对于 1795 年后的一些文物珍品缺少限制，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部分文物越来越被重视，管理也越来越严。例如在 1987 年前，这部分文物还属于外贸工艺品公司经营，可出境买卖。1987 年后，国家将这部

分文物转交由文物商店经营，直到现在文物商店仍在经营这些文物。

本次文物出境下限年代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同时覆盖面也比较宽。在原《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中，设有三个年代门槛，即 1949 年、1911 年和 1795 年，其中以 1795 年设槛的文物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原标准在设定年代门槛的同时，还附有其他一些相关的限制规定，这就使得本次年代下限调整因品类不同而影响不同。如果以收藏界所最为关注的收藏大项来分析，本次限制的具体影响便可看得更为清楚。

以瓷器来说，原来的规定所执行的是 1795 年以前的文物一律不出口，同时规定，历代官窑与私家款识制品不出口。新标准年限后移之后，受到影响的实际上就是清末这一时期的民窑。1795 年以后，历代民窑中均不乏精品，有不少业内公认的好东西，因此新标准影响可谓非同小可。

而以书画来说，油画等相关作品的原有门槛为 1949 年，本次调整对其没有影响，而书法、国画等的一些门类时间下限原为 1795 年，但实际上，国家文物局还有一份 385 人的限制出境书画家名单。因此，如果新标准仍保留对于书画名家的限制，那书画类受到新标准的影响十分有限。

此外，钱币、邮票、图书，包括黄花梨、紫檀、乌木、老鸡翅木家具，原有的规定下限或在 1911 年以后，或有更为严格的出境限制，因此也影响不大。

受新标准影响最大的在以下几个收藏门类：玉器、料器、珐琅、紫砂（非名家款）、木雕、牙角（犀角原标准时间下限为 1911 年）、藤竹、缂丝、铁画、一般玻璃油画、生产工具、兵器（非名人、无铭文）、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锡器、漆器、织物、地毯、钟表、烟壶（非名家）、扇子（非名家）、舆服、度量衡（无年款）、法器、明器、碑帖、雕塑、部分文具等，这些门类中 1795 年到 1911 年的历代工艺精品将受到新标准的制约。

值得注意的是，重要文物的年限设定在 1949 年，少数民族的重要文物、艺术品的年限设定在 1966 年。这就是说，除了一般的年代后移之外，重要文物还会有相关的限制规定，而且会更加严格。本次出境限制新规对于保护民族文物极为有利。

又如，2007 年版《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与 1995 年版的《暂时入境文物复出境管理规定》的明显区别就是，新《办法》规定了因销售等原因临时进境文物在境内的滞留时间，除经海关和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批准外，不得超过 6 个月，而在旧的《规定》中并没有给回流文物在境内的滞留时间规定一个具体期限。

另外，1795 年后的文物在国外也并不是艺术品拍卖主流，因此新标准对于艺术品拍卖市场影响不大。不过，新标准使得更多的文物留在国内，对于国内拍卖市场较为有利。而精品之外，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遗存的工艺品属于中低档品种，对于普通大众收藏者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同时新标准也使更多收藏者开始关注这一时期的文物，收藏意识也将有所增强。

同时，现行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应当随着文物保护任务的变化和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规定文物出境审核标准将定期修订并公布。

2007 年版《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从 2009 年 7 月 1 日实施，为便于公众了解国家的文物进出境管理政策，北京文物鉴定所将国家文物局《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文物出境审核标准》发布在北京市文物局网站上，明确告知文物进出境的审核范围、审核标准、审核机构的地址以及如何办理相关手续等。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文物出境标准是内部掌握的，不对社会公开。这次《标准》第一次向社会公布，符合政府政务公开，依法行政的要求。对文物出境审核机构人员的鉴定水平及政策水平是一个新的考验，我们切实落实《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认真准确地执行《文物出境审核标准》，加强对文物进出境审核人员的培训，提高文物审核水平，既要把好国门，也要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服好务。

三、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所的现状

1957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批准在北京设立出口文物鉴定机构，同年 9 月 28 日，北京市文物出口鉴定组正式成立，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文物出口鉴定机构，至今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50 多年来，机构历经变化，1986 年改为北京市文物出境鉴定所。1994 年国家文物局授权北京市文物出境鉴定所为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北京站；2007 年国家文物局授权北京市文物出境鉴定所为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北京管理处。

北京市文物出境鉴定所负责北京口岸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任务艰巨，工作量很大。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等外交机构等常驻机构及外国人数多；又由于北京是全国乃

至亚洲的文物交易中心、拍卖中心，文物市场繁荣，这都决定了北京市文物出境鉴定所承担的文物进出境审核量居全国之首。近几年，鉴定所年均大约审核10余万件拟携运出境的文物监管物品，并对年平均万余件临时入境文物进行登记、查验，办理相关复出境审核手续。这样，大约每个月要完成近1万件文物监管物品的进出境审核工作。同时要对海关查扣的文物监管物品（每年数百至千余件不等）进行鉴定。

党中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任务，强调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北京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当成确立首都战略地位的战略措施。北京具有文物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巨大、人才储备丰厚和文物市场基础雄厚的优势。北京的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地位和独特的国际影响力，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很大的吸引力。2003年起，通过拍卖回流的文物明显增多。单北京一地，“临时进境”的文物一年就超过1万件。在新的形势下，北京市政府已经将大力发展包括文物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首都战略发展方向。北京是全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文物交易活跃，市场发展很快。目前，北京拥有百余家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公司，拍卖规模和交易量大。作为管理文物艺术品进出境的行政机构，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所承担的责任也会越来越重。

四、近期工作设想

第一是体制机制调整。此前，北京文物鉴定所作为具有行政审批权和执法权的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的政府职能，但自1990年机构改革以来实行的是“经费自筹，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体制，这种体制显然与所承担的政府职能是不相符的。这种体制从1990年至2008年，一直运行了18年。根据2007年新修订的《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文物局负责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工作，指定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承担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由国家文物局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组建。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是文物行政执法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工作，接受国家文物局业务指导。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的编制、办公场所及工作经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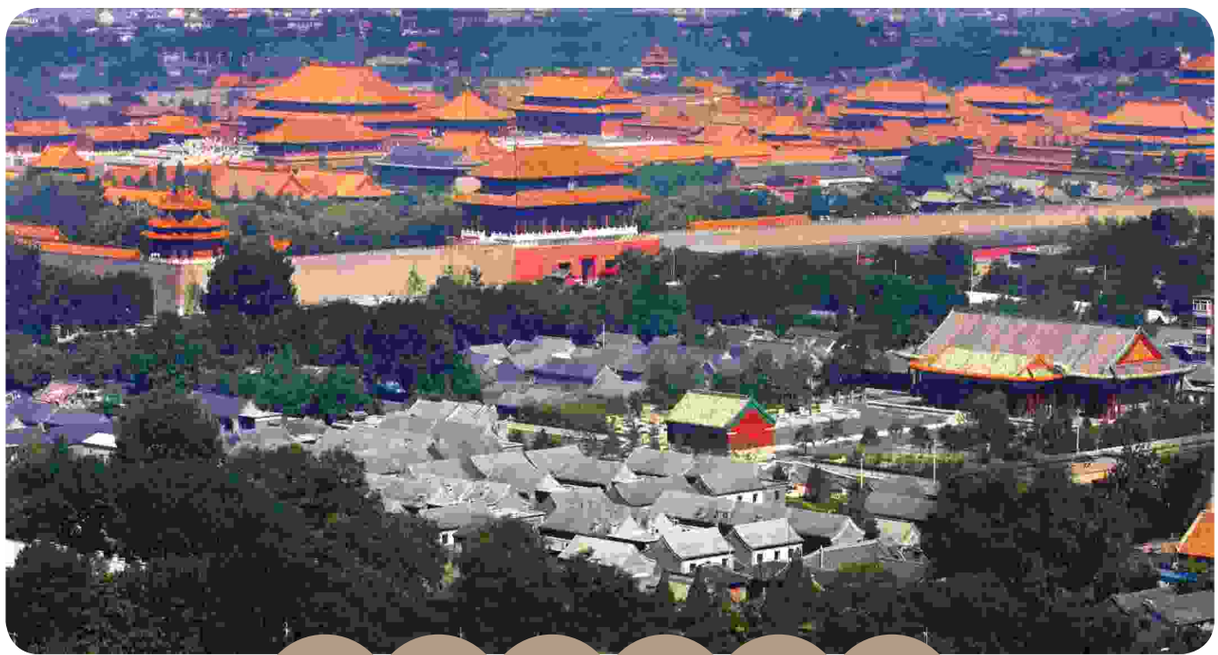
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过问下，从2007年开始，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启动了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所“自收自支体制向财政拨款体制”改制的工作。鉴定所正在进行体制的调整，拟分两步走：第一步，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改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第二步，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改为规范管理的事业单位。目前，第一步已经完成，2008年5月，北京市编制委员会已正式批准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所改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第二步，申请“事业单位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授权行使管理国家职能”的单位规范工资管理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第二是加强管理工作。针对目前我国的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工作方式手段落后现状，国家文物局决定在三个方面加强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工作。（一）实现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信息化联网办公。海关通过网络即时查核文物进出境审核的相关信息，在查验的文物有疑问时及时、高效地查验文物。（二）目前文物出境许可证、出境标识落后。文物出境许可证现为手工填表，没有电子化文本，也没有文物照片等必要信息，查核相关资料费时费力，统计数字也难以实现精准；文物出境标识仍然沿用火漆，使用方法复杂，易于造成文物损伤，而且仿制容易，对文物出入境管理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国家文物局近期将要求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应用电子化标签技术，在文物进出境审核的文物资料、照片等信息采集时，自动生成信息丰富完备、查询检索便利的新型文物出境许可证（电子标签）。由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在文物上标注电子标签，海关部门使用终端设备进行检验后，办理进出境手续。（三）是文物进出境审核手段科技化工作。目前，由于缺乏科技检测仪器设备，文物进出境审核只能依靠目鉴，科学性、准确性难以保证，审核鉴定效率低下。为此，国家文物局为北京等四个主要文物进出境审核部门配备了科技检测设备。包括高景深显微镜、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比重仪、精密切片机、火焰光度计等仪器设备，建立区域性的文物进出境科技检测工作室，加强大型仪器设备的资源共享，为文物进出境审核提供及时便捷的科技检测服务。

文物进出境审核监管职能作为保护国家对外文化主权和文物尊严的重要支撑，依法规范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流程，加大审核管理力度，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是新形势下文物部门必须要做的工作。

（作者为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所所长）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使大量珍贵文物得到修缮、保护。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北京市的文博事业开启了新的航程，呈现出勃勃生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我刊开辟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专栏，本期刊登了《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工作 60 年历程》和《北京考古六十年》两篇文章，旨在全面反映北京市在文物古迹保护和考古工作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工作60年历程

王 玉 伟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免受战争毁灭，北京的文物古迹迎来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使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得到修缮、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

建国初期，北京市政府成立了第一个主管文物的机构——北京市文物调查组，承担起了宣传文物保护、支持培训人才、盘点文物资源、抢救历史文物的工作任务。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坚持按“普遍保养，重点维修”的原则，对颐和园佛香阁、正阳门、天坛斋宫等一批文物古迹进行了抢修，同时为重点文物采取了安装避雷针等安全措施。

1955 年，调查组改名为北京市文物普查研究组，各区县抽调人员，经集中培训后，于 1957 年开始进行北京市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历时两年，

共登记各类文物 8060 项。其中，新中国成立后重要考古发现之一的琉璃河遗址，就是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经过多年研究，已被证实为西周燕国早期都城所在地，成为今天北京建城 3000 余年历史的重要依据。

为加强国家重点文物的保护，1957 年北京市公布了故宫、颐和园、天坛等 36 项以皇家建筑为主的重点文物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 年，北京故宫、卢沟桥、天安门等 18 项文物古迹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0 年代后，由于自然灾害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文物古迹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文物修缮工作基本停滞。但 70 年代后，故宫、北海、颐和园等重点文物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修缮保养。一些文物建筑被不合理占用，文物保护单位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文物建筑年久失修严重。由于当时计划经济的体制及国家致力于经济建设，文物保护的资金十分有限，文化遗产保护也局限于文物建筑本体的保护或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上，文物的保护环境和大量四合院等历史建筑的保护未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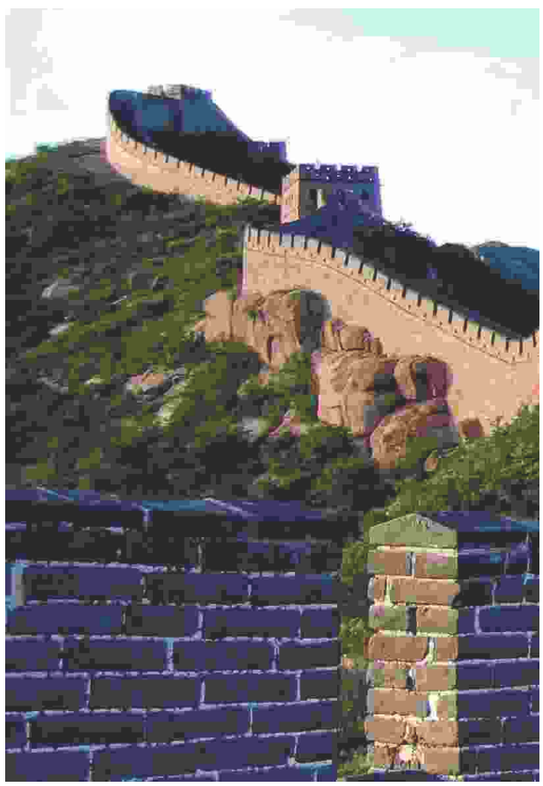
二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恢复经济建设和旅游发展的复杂形势，北京市于 1979 年公布了毛主席纪念堂、双清别墅、鲁迅故居等北京市第二批 33 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摸清经过“文革”劫难后文物的保存状况，盘点文物资源、拯救文物建筑成为当时文物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根据国务院统一布置，1981 年—1984 年北京市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次普查以区县为主，历时 3 年，普查文物 7309 项。这次普查发现了平谷上宅遗址等一些重要遗址、遗迹和墓葬，也发现了被认为是北京地区最早的遗迹之一的延庆千家店辛栅村古木化石群。这一发现对研究北京地区古代的环境、地区地理、气候、植被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经过普查，北京市于 1984 年公布了第三批 111 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金中都太液池遗址、老舍故居、中山会馆等一批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名人故居、会馆等名列其中。1982 年北京宋庆龄故居、皇史宬、古观象台等 6 项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我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文物的历史环境面临严峻的考验。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后，北京被国家公布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自此，文物保护的视野逐步向文物的历史环境拓展。为加强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保护，北京市文物部门和市规划部门自 1984 年起开始划定北京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此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周边建设进行严格的控制，以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环境不被进一步破坏。1984 年 11 月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 60 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规定，随后又于 1987 年公布了第二批 120 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规定，使文物建筑的保护环境及时得到有效的控制。1988 年，正阳门、太庙、圆明园遗址等 12 项文物单位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建设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危旧房改造计划正在酝酿。北京市于 1990 年公布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东堂、原燕京大学未名湖等第四批 20 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名列其中。其中遗址类、近现代建筑在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中所占比例迅速加大。在此基础上，1996 年戒台寺、历代帝王庙等 7 项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 年、1992 年和 1995 年，北京市相继划定并公布了第三批、第四批和第五批共 78 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加强对文物保护环境的保护。



根据北京市经济建设加速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北京市于 1997 年—1999 年开展了历时两年多的第三次文物普查，普查文物 7158 处。通过这次

普查，北京市大批的四合院、优秀近现代建筑被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为加强地下文物保护，防止地下文物在建设工程中遭受破坏，北京市分别于 1993 年和 1995 年公布了昌平雪山、门头沟龙泉务、海淀恩济庄等 2 批共 19 片地下文物埋藏区。根据规定，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必须进行考古勘查。同时，为加强地上文物的修缮保护，北京市财政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从 80 年代平均每年不足百万元增至每年一千余万，一批文物建筑得到及时的抢险修缮。

为确保文物修缮质量，在对施工企业培训的基础上，北京市文物局在全国率先开始实行市场准入制度。1992 年，经过对当时近 30 家从事文物修缮的施工企业的考察和评比，向其中 10 个企业颁发了修缮资质证书。此后，北京市加强了对文物修缮队伍的管理，文物保护工程水平不断稳步提高。

三

进入 21 世纪，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北京市政府在申办奥运会、建设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的过程中，将文物保护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党中央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近年来，文物保护从本体到环境，旧城保护从某一历史建筑本身发展到旧城整体保护，全社会关注文化遗产、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得到了极大提升。

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北京市于 2000 年公布了大兴黄村、海淀金山、延庆南菜园等第三批 17 片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加强城市建设区内地下文物的保护。结合大规模启动的危房改造，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工作也全面启动，为应对新的形势，北京市自 2000 年做出 3 年拨专款 3.3 亿抢修近百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战略决策，从投资规模到修缮数量均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3.3 亿”文物抢险计划的实施，使一大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长期以来年久失修的局面得到缓解。

北京市于 2001 年 7 月公布了清河汉城遗址、四九一电台、川底下古民居村落等第六批 40 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四合院建筑、民用近代建筑迅速增加。2003 年北京市又公布了皇城墙遗址、灵岳寺等第七批 30 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从建筑类型看，改变了过去古建筑在新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占统治地位的格局，优秀近现代建筑的比例明显增大。随后先农坛、金中都城水关遗址等



16项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又公布了北京市中南海、元大都城遗址、西什库教堂等38项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北京市又继续公布了两批58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奥运会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带来了机遇。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市政府决定从2003年起启动“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计划，提出了“保用并举，恢复景观，成片整治，形成风貌”的工作方针。每年投资的专项经费由1.1亿增至1.2亿，5年共投资6亿元，启动200余项文物保护工程。随着两项规划的顺利实施，一大批文物建筑得到抢修，涉及139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修缮面积约33万平方米，4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实现腾退或对社会开放。吸引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几十亿元，调动了社会各方面保护文物、爱护文物、共同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

历代帝王庙、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腾退和抢修，消除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文物保护单位部分实现了对社会开放，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许多文物保护单位的周边环境得到整治，社会公众对文物保护的理念逐步从传统的文物保护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转变。北京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一批历史文化景观风貌得到恢复，初步实现了“两线五区六景”[①]的计划目标。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做好新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是北京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重点。北京市在认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市文物建筑中长期修缮计划”，市政府决定自2008年开始用8年时间每年投资1.5亿元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总体设想是“完善两线景观，展现皇城格局，维护古都风貌，保护京郊史迹，整治文物环境，实现综合利用”。实现“原状真实完整，结构牢固稳定，技术手段先进，安全设施完善，技防手段先进，环境整洁优美，使用效益良好”的目标。

200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文物保护的传统观念迅速转变，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迅速提高，工业遗产、名人故居、商业老字号、乡土建筑、文化路线、文化景观等文化遗产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根据国务院统一布置，北京市先后启动了长城保护工程、北京市第四次文物普查、大运河调查等项目，标志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基础性工作更加深入、更加扎实。

随着中长期文物保护计划的实施，北京市将在近年内完成现有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基本完成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四有”资料[②]的整理等基础性工作。同时对文物资源进行整理，基本完成文物资源信息库建设，为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奠定基础。

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京市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为文物保护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保障，文物保护事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经过抢修，文物建筑的安全状况进一步好转。随着一大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腾退，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对社会开放，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更为合理的利用，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成绩斐然。

历史文化遗产在建设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科技北京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今北京市已成为全国的文物大省之一，拥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也已成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最为集中的区域，各类不可移动文物3500多处，其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890处，已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街区40余片，地下文物埋藏区36片。古都北京形成文物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个层次的基本格局。文物保护的手段更加科学，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更加清晰，文物保护工作正逐步纳入法制管理轨道。

北京60年文物保护的历程，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北京建设和文物保护共同发展，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突出的社会效益日趋显现。“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文化遗产成果，人人共享”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60年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使我们更加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会做得更好。

---

① “两线五区六景”：“两线”指中轴线、朝阜路沿线；“五区”指什刹海风貌区、国子监古建游览区、琉璃厂传统文化商业区、明清皇城景区、古城垣景区；“六景”指西郊风景名胜区、北京段长城风景保护区、帝王陵寝保护区、京郊运河文化带、宛平城史迹保护区、京西寺庙景区。

② “四有”：即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有管理机构。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



北京考古六十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是从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为保护城内的文物古迹，中共北平军事委员会设立文物部开始的。1951 年 7 月，北京市文物调查组成立，组织人员对当时所属的 11 个区县地上文物及古代墓葬、古遗迹进行登记，登记的总数量达到 7445 项[①]。同时，考古工作者还有计划地对金中都进行了重点考古调查，对明代万历皇帝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对董四墓村明代妃嫔墓做了清理。1962 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房山县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琉璃河西周遗址，并在刘李店及董家林二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这些工作成为当时令考古界瞩目的事件。尤其是对明定陵的考古发掘工作，是新中国建国以后有计划发掘的第一座古代帝王陵墓，成为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密切关注的事件。

“文革”开始以后，北京市的文物考古事业进入缓慢发展的阶段。一方面是大量的地面古代建筑被拆毁，大量的文物被砸毁，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的一些古代墓葬无法得到科学的清理。另一方面，文物考古工作得不到重视，队伍建设缓慢而滞后，甚至部分考古工作者改行。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工作者仍然坚持对元大都遗址和大葆台西汉墓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发掘。1972 年，考古工作者再一次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勘探、调查和发掘，确定了周初燕都的具体位置，其成果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及西周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北京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考古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1982 年 11 月 1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北京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和全国一样，步入了有法可依的正轨。1984 年，为了配合全国的文物普查工作，文物工作者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第二次全面的文物普查，发现了第一次文物普查未登记的文物 4772 项，拉开了新时期文物考古工作的序幕。1984 年 5 月，文化部颁布了《田野考古规程（试行）》，翌年 5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正式成立，主要负责北京市的田野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严格按照《规程》要求，对考古队伍和工地进行规范化管理，大大提高了田野考古人员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全市的文物考古工作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学科建设上，先进国家的一些考古思想和理念也不断传入我国，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北京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也逐步走向理性化的深入研究阶段。1985 ～ 1991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了山戎课题组在北京市北郊军都山地带开展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为了坚持科学性，课题组在发掘工作伊始，就一直比较注重利用现有条件，开展多学科综合考查与研究工作，出土了较为丰富的文物，积累了系统而完整的资料，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

三是随着全国城市基本建设的飞速发展，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基本建设更是呈现出点多、面积广、速度快的特点，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田野考古工作全面铺开。特别是进入本世纪后，基建考古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人员少的巨大压力。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一方面积极吸纳人才，壮大专业队伍；另一方面，科学组织人员，积极应对。不仅注重田野考古发掘，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和对文物的保护工作，组织科研人员认真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把田野考古、文物保护与深入开展科学研究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田野考古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注重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工程考古的同时，市文物研究所还树立了大遗址保护的观念，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制定大遗址保护项目。目前琉璃河商周遗址和金陵遗址两项大遗址保护工程已经启动。

一、旧石器时代的北京先民进化历程

据统计，迄今发现的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各阶段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约有48处，涉及北京9个区县，大多数集中于山区、半山区，平原地区只发现有3处。

现代考古研究表明，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大约属于地质时代的中更新世，距今60～20万年，当时的北京人已进入直立人阶段。这一期的遗址发现4处，为周口店第一地点、第十三地点、第十三A地点和密云上甸子乡黄土梁地点。中期在地质时代属于晚更新世初期，距今约20万年～10万年，当时的北京人已进入早期智人阶段，已发现人类活动遗址22处。较典型的有周口店新洞、周口店第十五地点及平谷县马家坟等。周口店“新洞人”的发现，证明了在北京猿人之后与山顶洞人之前，周口店一带人类活动一直绵延未绝；旧石器晚期属于地质时代的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0万年～2万年，此时的北京人已进入晚期智人阶段，已发现的遗存分布较广，不仅在北京的郊区有所发现，在城市的中心区也有分布，主要有房山周口店山顶洞、田园洞、密云东智、王府井东方广场等22处[②]。

二、新石器时代北京先民的生活遗迹

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全部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获得的。目前已发现的遗址、墓葬和零散遗存点约有40余处，较早时期的有门头沟斋堂镇东胡林遗址、怀柔转年遗址等，绝对年代在距今约11000～9000年前。1966年在东胡林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座，有三对保存完整的髌骨[③]。2001～2006年，考古工作者又对该遗址的西南部、大冲沟的西侧进行了连续发掘。保存完好的古人类遗骸的发现，填补了自山顶洞人、田园洞人以来北京地区人类发展史的一段空白。[④]

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发现的典型遗址有平谷县上宅村西北的上宅遗址、北埝头遗址，密云县燕落寨遗址及镇江营遗址等，绝对年代在距今约9000～7000年前。

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遗存的典型代表为位于昌平县城西4公里处的雪山遗址。研究表明，在不晚于1万年前，北京地区已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三、北京地区的夏商周考古

北京地区的夏商周考古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学术界认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包括夏家店下层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商文化以及西周燕文化等几个部分。

夏至商早期，北京地区的原始文化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范畴。在昌平区雪山村、下苑和张营，密云县燕落寨、凤凰山，平谷区刘家河，房山区塔照村、镇江营、西营和刘李店等都曾发现此类遗存。

比夏家店下层文化略晚的遗址中，以夏商之际的昌平张营遗址、商代中晚期的平谷区刘家河商墓最为重要。张营遗址主要的文化因素明显与北方系统相亲近，而与永定河以南地区差异较大；刘家河商墓不仅出土了十余件精美珍贵的青铜礼器，所出兵器中的铁刃铜钺，更把我国用铁的历史上溯了500多年。该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北京地区商代考古的空白，为探寻商代青铜文化遗存与中原殷商文化、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⑤]

西周燕文化以镇江营遗址和琉璃河遗址最为典型。镇江营遗址西周燕文化堆积至少可分为三层，为北京地区西周遗址的分期提供了地层资料；[⑥]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以北地区，1958年，北京市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1962～2002年，文物工作者先后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在遗址内不仅发现了城址、城墙、护城河、大型宫殿类建筑、居址、房基、灰坑、窖址、铸铜作坊、各类墓葬、车马坑等各类遗迹，而且获得了上万件的重要文物。其中一片刻有“成周”二字的龟甲，为琉璃河遗址的分期与断代提供了新的依据。该遗址属于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存，主体时代为西周时期，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⑦]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

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在今北京地区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一是位于北京南部的燕文化，一是位于北部燕山山地间的“玉皇庙文化”。

1、春秋燕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燕文化遗存，大部分分布在今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境内，其文化渊源与

本地传统的西周燕文化有着直接关系，但又有明显不同，是一个崭新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表明，东周燕文化大致形成于春秋中期，以房山镇江营与塔照遗址、丁家洼遗址等聚落遗址为代表，其代表性的遗迹为圆形、方形以及不规则形等各类灰坑等。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燕文化遗存发现数量较多，包括城址、聚落遗址、墓葬、窖藏等各种类型的遗存，主要有窦店战国城址、蔡庄城址、长沟城址等。

考古发现的东周时期的墓葬主要有顺义龙湾屯春秋战国之际的墓葬、怀柔城北战国时期墓地、昌平半截塔村战国墓、通县中赵甫村战国墓、房山岩上墓葬区战国墓葬等。出土的青铜器造型明显带有本地燕文化的特色，如器盖的兽钮风格、细高柄盖豆、椭圆体簋、三环钮敦等，铜器表面装饰的各类兽纹、狩猎纹等也是北方长城地带流行的纹饰。[8]

建国以来，北京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的聚落遗址多属零星发现，2005 年房山南正遗址属于规模较大的，遗址内涵丰富，延续使用的时间较长。

根据考古资料统计，在北京的 15 个区县范围内，都出土过燕国金属铸币，共 40 余处，铸币数量亦较可观，且形制与型式多互有差异。这表明大约在春秋晚期，金属货币即已开始在燕、赵地区铸行。

2 、玉皇庙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

玉皇庙文化在北京地区局限于延庆县北部八达岭以北的军都山一带，存续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考古发现以墓葬为主要形式，墓葬遗存以葫芦沟墓地、玉皇庙墓地、西梁垙墓地为代表，发现比较集中，墓葬数量较多。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青铜器、陶器、石器、玛瑙器和骨器，其中青铜器数量较多，包括兵器、工具以及各种形式的装饰品。墓地随葬的青铜器，以出土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铜刀、铜带钩、弹簧式铜丝耳环和动物纹铜牌饰最富文化特色。从数量看，出土青铜刀和铜带钩较青铜短剑为多。特别是在墓地南区中，出土了数例尖首刀币，这不但使青铜刀的发展轨迹序列更为清晰，而且为探索春秋战国之际燕、齐、赵地区的铜刀币的起源，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9]

五、汉唐时期考古

北京地区的汉唐考古，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集中在城址、墓葬、宗教遗迹等三个方面。2005 年以后，陆续清理汉代窑址 30 多座、唐代窑址数座。

1 、北京地区汉唐时期的城址

自上世纪 50 年代始，北京地区已发现两汉时期的县城城址 10 余处，这些城址分布较为密集，较重要的有 6 处，即朱房村古城、蓟城、良乡、广阳、西乡、阴乡县城城址，多为战国或西汉时期修筑，东汉时期继续沿用。[10] 1974 年，为配合白云观西的基建施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对《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做了发掘工作，经清理发现这是一座城墙的西北转角遗址，又发现两座东汉中、晚期的墓葬位于城墙残墙夯土层之下，为城墙所压，说明城墙的筑造要晚于东汉。由此确定该城墙建在东汉中晚期之后、北魏之前，当为东晋蓟城城址。1965 年在八宝山迤西约 500 米处，发现了西晋华芳墓[11]，墓中出土墓志记载华芳墓的埋葬地点在“燕国蓟城西二十里”，因此确定西晋蓟城的西城垣位置在今北京市石景山区会城门村稍东一带地方。

建国以来考古发现的唐代墓志，为唐代幽州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根据墓志并结合房山石经题记等文献资料，现基本可以复原唐幽州城的城址四至[12]。

2 、北京地区汉唐时期的墓葬

建国以来，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唐时期墓葬计有 80 余处，其中可以确定为两汉墓葬的约 40 多处，墓葬约 1540 多座。唐代的墓葬大部分已遭盗毁，约有数十座墓中仅存墓志。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少数民族首领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幽州地区的民族关系与羁縻府州制度提供了实证材料。考古发现的魏晋北朝墓葬较少，共清理 13 处 19 座。

在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两汉墓葬中，位于今丰台区郭公庄的大葆台汉墓和石景山区的老山汉墓，是迄今为止在北京地区发现的两汉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大葆台汉墓发现于 1974—1975 年，1 号墓是目前国内发现最大的西汉时期的“黄肠题凑”墓。年代应在西汉中晚期之间。墓中出土了针刻“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字样的纪年漆器，采用诸侯王在位纪年的方法。研究者认为大葆台 1、2 号墓主分别为元帝时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13] 石景山老山汉墓发现于 1999 年，规模、形制、棺椁层数与大葆台汉墓相同，但无殉葬车马，表明老山汉墓墓主的入葬年代当在汉成帝废除殉葬乘舆车马禽兽制度之后。关于墓主人，学者认为可能是燕剌王刘旦[14]。另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成、哀时期的广阳穆王刘舜的王后或广阳思王刘璜的王后[15]。

此外，北京地区还发现了大量两汉时期的墓葬群，较大的有怀柔县城北汉墓群，发掘两汉墓30座；昌平白浮村汉墓群，共发掘汉墓46座，均为中小型墓；大兴区亦庄开发区10号地鹿圈镇鹿圈村汉墓群，发掘汉墓59座；丰台区王佐镇银河星座居住小区汉墓群，发掘汉代墓葬37座等等。这些墓葬大都跨越两汉。[16]

考古发现的北京地区魏晋北朝时期墓葬较少，共13处，其中魏晋时期9处，北魏、北齐各2处。魏晋墓葬分布在海淀、顺义、石景山、房山、延庆等几个区。两处北魏墓葬为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北魏纪年墓和大兴黄村镇小营村北魏墓。两座北齐墓葬，其一为怀柔县韦里村傅隆显墓，其二在西城区王府仓。魏晋北朝时期较为典型的墓葬当数1965年发现的西晋华芳墓，该墓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迤西约500米，出土华芳墓志一方，对研究西晋时期的历史与官制，墓志演变及书法艺术具有很高价值。该墓出土一把长24.2厘米的骨尺，是一把标准晋尺，为研究西晋计量单位和经济提供了重要资料。

北京地区已发掘的唐代墓葬数量较多，最有历史意义、反映唐代幽州地区民族融合特点的当属史思明墓与归义王李诗夫妇的合葬墓。1966年在丰台区林家坟村西发现史思明墓葬后，1981年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随葬品除60年代搜集到的铜牛、嵌金铁马镫外，还出土40余枚玉册。[17]199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房山县医院发掘了一座唐代大墓，出土墓志中有“唐故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故贝国太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等字样。据研究，墓主应为唐归义王李诗夫妇。[18]史思明墓与李诗夫妇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唐代的藩镇与羁縻府州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

六、辽、金、元时期考古

1、辽金元城址考古

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对辽南京城的考古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据研究，辽南京城是在唐幽州城旧址上修建而成，大致位于今北京市西南部的宣武和丰台区，由大城和皇城组成。结合文献记载及出土墓志推断，辽南京的东城垣在法源寺以东。城北垣在复兴门南，即今会城门村一线，南城垣大致与右安门城墙相近，西城垣在今会城门东。

对于金中都的考古调查及清理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金中都都城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是以辽南京城为基础，向东、西、南三面扩建而成的。扩建后的金中都形成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相套，皇城位于大城的中央偏西部，宫城位于皇城中部。上世纪50年代在修建广安门火车站时，曾发现几百座辽墓，隔护城河与之相对的陶然亭正北也发现了金代建筑遗址，出土沟纹砖以及石球（金时的石炮弹）等，基本确定金中都的东城墙在直贯陶然亭南北一线不远。金中都的北垣与辽南京北垣重合，东北转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今白云观西1公里有会城门，是北垣西边的门。西垣的北端在会城门东约半公里处，南端在今万泉寺西南的凤凰嘴村，南北端之间有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夯土层厚5–10厘米不等。1992～1994年的北京西厢工程发现地下遗迹700余米。南垣的西南转角在今凤凰嘴村，东南转角在今永定火车站东南的四路通，两端之间一段由西向东的凉水河，曾作为金中都的南护城河，其岸可见断续土丘状城墙。1991年发现的金代水关遗址，基本确定了南垣出水口的具体位置。

金中都的皇城与宫城也是在辽南京皇城的基础上增建和扩建而成的。皇城四周城墙均在原辽南京皇城之外，宫城按照北宋开封都城设计，九重宫殿均配置在从应天门到拱辰门的中轴线上。1990～1991的西厢考古工程，发现夯土13处、路土9处、水井和墓葬10余处。从鸭子桥到椿树馆街之间发现连续的大片夯土区。由南而北应是应天门、大安门、大安殿遗址，仁政殿在其北。又据《金史》，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所记仁政殿是辽的旧殿，推测金宫城的中轴线很可能也是辽皇城的中轴线。[19]

建国以后对元大都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根据资料显示，元大都外郭城平面为长方形，经实际勘测，北城垣长6730米、东城垣长7590米、西城垣长7600米、南城垣长6680米，周长共约28600米[20]，这与《元史》中的记载大体相吻合。元大都北面的城墙和东西两面城墙的北段，至今地面上仍旧保存有遗迹，即今北京北三环外的所谓“土城”。元大都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与明清北京城的东西城墙一致；南城墙的位置在今东西长安街的南侧[21]。1969年发现的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中保留较为完整的铁“鹅台”（即承门轴的半圆形铁球）和《营造法式》的记载完全一致，为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例。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元大都北土城花园路段的西部清理了一处水关遗址，南北向穿通土城，用砖石垒砌而成[22]。2007年在玉河遗址的发掘中，又发现了一处元代的堤岸遗址，

下层为石结构，上层为夯筑而成[8]。这些都为了解和研究元大都排水系统工程提供了实物依据。

2、辽金元时期的墓葬考古发现

在对辽金元墓葬的考古发掘中，金代皇陵是近年来北京金代考古的最重要发现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金陵的主陵区内不断发现金代墓葬，并有零散文物出土。1986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陵进行了历时 3 年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的汉白玉、青石花岗岩等建筑构件。2001 年春，市文研所对金陵主陵区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并在 2002 年 6 月对主陵区进行考古勘查和试掘。此次清理和试掘，最重要的收获是清理了金太祖睿陵地宫和埋葬后妃的坤厚陵。

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辽金元时期墓葬约有 260 余座，形制主要有砖室墓、石椁墓、砖石混筑墓和土坑墓四类。其中砖室墓沿用时间较长，三个时代均有较多发现，所占墓葬比例较大，尤以辽代为最。所发掘的辽墓 90%以上为砖室墓，墓内多见壁画、仿木结构建筑、影作桌椅、斗拱等。墓葬平面形制分为长方形、正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其中圆形单室墓最多，数量达 100 余座，较为重要的有洪茂沟董匡信夫妇合葬墓、丰台镇王泽夫妇合葬墓、石景山区韩佚墓、李继成夫妇合葬墓等。此外，还有圆形前后两室墓、圆形多室墓等，如元代耶律铸夫妇合葬墓。2007 年 1 月至 5 月，市文物研究所在丰台区抢救性发掘了两座规模较大的辽代墓葬，其中 M1 为辽代家世显赫的刘六符及四位夫人合葬墓。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金代墓葬中石椁墓占主流地位，年代多为金代中晚期，墓主以女真贵族居多。金、元时期的砖石混筑墓也有发现，但墓例不多。辽、金、元三个时期的土坑墓均有少量发现，规模较小，形制较为简单。

3、辽金元时期其它遗迹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在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辽金元佛教遗迹中，塔基的发现是最多的一项。已发掘的辽代塔基最主要的有房山区云居寺南塔塔基、密云县冶仙塔塔基等共计 7 处。金代时期的塔基有丰台区瓦窑村塔基和房山县坨里乡上万村的“土寺”塔基。2008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大兴康庄发掘的 25 座塔基，是国内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塔基。[9]

近年来发现了一些辽金元时期的窑址。20 世纪 90 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门头沟区龙泉务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窑炉 13 座、作坊 2 处，出土窑具及各类可复原的器物 8000 余件。龙泉务窑是现存惟一一处从辽代早期到辽末金初最完整的制瓷手工业遗址，为民窑性质，部分精细产品及建筑构件专供辽代贵族及上层统治者享用。龙泉务窑的发掘证实了辽代陶瓷手工业的中心在燕京地区，进而说明辽南部地区（燕云十六州）是辽代经济的中心。[10]此外，辽金元时期较为重要的窑址还有密云县小水峪、房山区磁家务、密云庄窝及大兴县元代烧炭窑址、海淀白琉璃窑等等，以民用窑居多。

建国以来，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辽金元时期的窖藏遗迹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钱币窖藏、铁器窖藏和生活用具窖藏三大类。其中辽金时期的钱币窖藏数量多，计 15 处，发现的范围广泛，埋藏方法也比较一致。

七、明清时期考古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明代考古工作有了较大进展。而清代考古则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1、明代城垣考古

上世纪 60 年代，为配合大规模城墙拆除工程，考古工作者对明北京城的内城垣进行了局部的发掘清理；1998 年改建平安大道时在北海中学发现一段明皇城北墙基础；2001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明皇城遗址公园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大致明确了皇城东墙的走向及建筑结构，并发现了东安门、望恩桥燕翅等重要遗迹多处。通过对内城城垣的解剖，基本弄清了明北京城内城以及皇城城垣的结构和砌筑方法。

2、明代陵寝及嫔妃墓葬考古

1956 年，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明十三陵定陵进行发掘，发掘历时两年多，共出土文物 2648 件。定陵的发掘对研究明代帝后冠服制度、礼仪制度、陵制以及各类工艺技术水平等都有很高的价值。[11]此外，1989 年 12 月，为配合十三陵主神道复原工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古建研究所还联合对十三陵主神道进行了试掘[12]。

1951 年 8 月至 11 月，在董四墓村发掘出两座明代妃嫔墓，分别埋葬天启帝的三个妃子和万历帝的七个内嫔。通过发掘，初步摸清明代妃嫔墓葬结构形制。另外，也证实了明代妃嫔多人合葬一墓的相关记载。[13]1963 年，在镶红旗发现 7 座成化帝的妃子墓。[14]通过对董四墓村和镶红旗营妃嫔墓的发掘，证实了明代未从诸帝葬的妃嫔俱葬金山的文献记载，为研究明代妃嫔葬制和墓葬形制

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妃嫔圹志有16合，是明史研究难得的实物资料。

3、明代的贵族墓葬及太监墓

此外，还发现了其它一些大型的明代皇戚或贵族墓葬。如右安门外关厢的万贵夫妇合葬墓，南苑苇子坑正德皇帝的岳父、庆阳伯夏儒夫妇合葬墓[13]，海淀区香山路明宪宗长子墓，朝阳区奥运村地区的明代昌宁侯赵胜夫妇合葬墓[14]，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的德清公主夫妇墓[15]等墓葬的发现，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的外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皇子与公主的葬制以及明代官制、兵制及社会生活等，都有重要价值。另外2005～2007年在朝阳区王四营乡华能热电厂院内发掘的明怀柔伯施聚家族墓地[16]，为研究明代宗法制度和家族墓葬“昭穆制度”提供了资料。

自1950年以来，北京地区发现了大量明代中晚期的太监墓葬，计百余座。今广安门以北、西便门以南地带，曾发现许多塔墓，可能是明太监的丛葬区。一般都建有石制或砖制的长方形墓室，内置木棺，随葬品有陶瓷器具和小件玉佩饰，都有墓志出土[3]。较重要的还有香山饭店发现的太监刘忠墓、地质力学研究所太监墓、北京工商大学太监墓以及北京射击场太监墓地、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场内市政工程M1、门头沟区潭柘寺太监墓等。[5]

4、明代长城考古调查及其它考古发现

明长城历来为文物工作者所关注。自1952年郭沫若先生提出要维修长城主要遗址的意见后，国家文物局开始派专家对明长城各线进行初步普查。1981年，国家文物局派出4个小组，对明长城进行全线实地勘察。近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还对明代长城的一些遗址做了考古发掘工作，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经过几次大规模的调查、勘测，目前已对其分布、走向、结构和保存状况有了基本了解。

2005年7～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西城区文管所联合对西城区毛家湾1号院内的明代瓷器坑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6]，出土了大量瓷器残片，大部分属明代早、中期，也有少量元、辽金、唐代瓷器。窑口较多，汇集了元、明时期各主要窑场的产品，为研究元、明瓷器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另外，2007年4月中旬至2008年5月上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万宁桥至北河沿大街段的玉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对探讨古玉河的走向、建造年代及河道变迁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并能够为古代北京漕运和水源、供排水系统、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新资料。

5、北京地区清代考古发现

清代考古主要涉及到墓葬、园林水系、宫苑署邸和寺庙宫观等方面。

据资料统计，北京地区已发掘的清代墓葬有41处，近2000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清河永泰庄墓祖大寿之子祖泽润的家族墓地[7]、丰台地区刘秉权墓地[8]、朝阳区高碑店乡光辉桥东通惠河北40米左右的和硕和嘉公主园寝等，为了解清代北京地区的丧葬风俗和清宗室的丧葬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

2005年以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对清代园寝制度进行了研究。[9]清代园寝大多分布在北京地区，也有一部分分布在河北、辽宁等周边省市。这些园寝多数已被毁。2008年以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近三百个清代园寝进行了考古调查，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近年来对清代的园林水系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也是一项重要内容。1994～200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共勘探和发掘清代园林水系遗址12处，其中7处遗址位于圆明园遗址内，另外5处遗址分别是畅春园大宫门建筑遗址、西花园石桥遗址、金台夕照遗址、香山静宜园来清轩遗址和玉河遗址。遗址中清理出的不仅有宫殿、斋、堂、亭、轩、楼、馆、榭、寺庙等建筑基址，还有广场、假山、水池、水闸、桥、道路等遗迹。[4]

---

①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组：《近几年来的北京文物工作》，《文物》1959年9期。按当时平谷、密云、顺义等区县尚不属于北京行政区划管辖。

②郁金城、李超荣：《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新收获》，《北京文博》1998年3期。

③周国兴、尤玉柱：《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72年6期。

④赵朝洪等：《北京东胡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获得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9日第1版；东胡林考古队：《北京新石器早期考古的重要突破》，《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第1版；东胡林考古队：《北京东胡林发掘再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30日第1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7期。

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1月；《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

1989 年 3 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 年 1 期；《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 年 11 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⑥陈光：《北京市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年 9 月。

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1973—1997》，文物出版社，1995 年 7 月。

⑧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 年 8 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 年 5 期；《北京昌平半截塔东周和两汉墓》，《考古》1963 年 3 期；苏天钧：《北京昌平区松园村战国墓葬发掘记略》，《文物》1959 年 9 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市考古发掘报告第一号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8 年 4 月。

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文物出版社，2007 年。

⑩㉑㉙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

⑪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 年 12 期。

⑫鲁琪：《唐幽州城考》，《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1982 年。

⑬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⑭王鑫：《北京老山汉墓》，《2000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 年。

⑮高崇文：《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北京文博》2008 年 2 期。

⑯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 年 5 期。《北京昌平半截塔东周和西汉墓》，《考古》1963 年 3 期；张治强：《近两年北京地区汉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汉代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年；张智勇：《北京丰台王佐遗迹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北京文博》2008 年 4 期；苏天钧：《北京昌平白浮村汉、唐、元墓葬发掘》，《考古》1963 年 3 期；喻震：《北京昌平史家桥汉墓发掘》，《考古》1963 年 3 期。

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 年第 9 期。

⑱王策：《＜唐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墓志＞考》，《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第 167 页，民族出版社，2004 年 10 月。

⑲陈光：《北京考古五十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

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 年 1 期。

㉒李华：《元大都北土城花园路段城墙勘探及水关遗址清理简报》，《北京考古（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年。

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玉河 2007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 年。

㉔于璞等：《北京辽金时代塔林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9 年 3 月 20 日。

㉕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㉗赵福生：《十三陵主神道发掘简记》，《北京考古信息》1990 年 2 期。

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 2 期。

㉚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 年 11 期。

㉛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朝阳区明赵胜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 9 期。

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08 年工作简报。

㉞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华能热电厂明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6 年 6 期。

㉟北京市文物考古队：《北京香山明太监刘忠墓》，《文物》1986 年第 9 期；程利：《地质力学所出土明太监墓》，《北京文博》2000 年 1 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年；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 年；宋霞：《门头沟区文物所清理明代太监墓》，《北京文物报》1998 年 9 期。

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 年 12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西城区文物管理所：《北京毛家湾瓷器坑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 4 期。

㊲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1994 年。

㊳朱志刚、李华：《丰台区刘秉权墓地调查与发掘报告》，《北京考古（第一辑）》。

㊴宋大川、夏连保：《清代园寝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玉河 2007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 年。

（执笔：夏连保）

博物馆『大社教』构想初探

杨丹丹

社会教育作为博物馆的一项基本职能，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走过了萌生、壮大、提高和发展实践的过程，以其特殊有效的教育形式，在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实施爱国主义等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门和机构都无法比拟、无法取代的。

所谓“大社教”构想，意在博物馆原有社教功能基础上，更新社教服务理念，拓展社教服务领域，创新和丰富社教服务手段，扩大社会影响；将社教工作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让社教工作真正成为博物馆连接社会和公众的桥梁和纽带。本文提出“大社教”构想，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进一步加以探讨：

一、博物馆社教阵地社会化

教育是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时代的发展带动了博物馆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活动的创新。随着博物馆社会化热潮的兴起，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也有了全新的拓展，致使更多的博物馆介入教育市场、旅游市场和文化市场的竞争中，社会公众对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使其从被动反映社会变为主动参与社会，关注社会和公众的变化与需求，工作重点已不局限在展厅和本馆藏品，而是放眼于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大目标，博物馆社教服务深度和广度将全面超越以往。

教育信息的传播与推广是博物馆联系社会、扩大社教宣传、组织观众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凡是人能感觉到的地方均可视作博物馆进行自我宣传和传播文化知识的阵地。使公众能够在其日常的工作生活环境中较容易地、随时获取有关博物馆的相关信息，成为其选择参观和参与展览活动的来源和依据。以纪念品为例，它随着持有人的移动从博物馆可以走遍五湖四海，进入千家万户，而且往往一件纪念品由于持有人的携带、炫耀、摆设、转赠等，会无限次地作用于人们的感觉器官，就提高博物馆知名度和博物馆传播文化信息而言，确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例如：今年 8 月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博物馆博览会，走在农业展览馆的广场和展览大厅里，拥挤的观众群中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提着印有“上海博物馆”标识的手袋，瞬间的视觉冲击在不经意间被公众留在了视觉记忆中。博物馆要拥有自己的宣传网络和宣传品，在人流密集、流动量大的地点如机场、车站、交通枢纽、旅行社、旅店、餐饮休闲购物娱乐场所以及相关机构、单位和基地等，建立独立的宣传投放网点，直接面向作为宣传最终目标的全体社会公众，利用自身的专业资源和内容优势将宣传效果发挥到最大。例如：首都博物馆社教部为扩大社教活动宣传，向社会公众预告活动资讯而制作的社教宣传季刊《牵手》每季度发放 5 万册，除了放在礼仪大厅由观众自由领取，还将季刊邮递给相关的学校、社区、本市及外省各博物馆同行，即扩大了宣传又增进了交流。为了得到这种便利，可以与对口单位合作建立对等的宣传站点，为其提供馆内宣传空间和便利，在建立维护独立宣传网的同时扩大与各行各业的直接交流沟通。再如，中华世纪坛利用首都博物馆举办大英特展期间，将本馆正在宣传展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展览海报贴到首都博物馆的开放区并将折页放在礼仪大厅的资料索取处，可谓一举两得。

创新教育手段，推出特色教育活动。观众、藏品、展览构成现代博物馆的三大基本要素，在明确新的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的前提下，树立开放式社教服务理念，注重探究本馆展览内容和藏品资源的内涵，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尝试通过策划主题鲜明、集趣味性和参与性为一体的特色活动，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例如：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结合展览内容，让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出演历史短剧《东方朔与汉武帝》，以其独特的视角为学生观众提供一个很好地展示舞台。通过

参观、参与活动感悟历史文化、激活沉睡的文物，让公众懂得如何利用博物馆。

二、博物馆社教资源社会化

博物馆教育资源主要包括两部分：馆内可利用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以及延伸于本馆以外的有形和无形资源，有形的可称作硬件教育资源，无形的可称作软件教育资源。其中，硬件资源并非单纯指本馆的建筑空间和展厅，特殊可利用空间（多功能厅、多媒体放映厅、教育活动室等）、教育设施资源（触摸屏、语音导览、电脑、大屏幕显示屏、幻灯和投影机等）、教学资源（本馆所收藏的文物及历史资料、业务书籍和研究材料及成果、电脑教学软件、影音资料等）均属硬件资源。而软件资源泛指所有从事博物馆教育服务的参与者（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馆内及馆外人员）。在博物馆众多资源中，文物资源和人才资源构成了博物馆自身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这两部分资源决定着博物馆的品质，为博物馆全面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提供了鲜明的直观性、形象性、可比性和强烈的说服力及震撼力的支持。目前，欧美、香港等地博物馆在充分利用资源方面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他们不但很好地利用了博物馆的内部资源，而且也很好地利用博物馆的外部资源。比如：文化遗产彩票、会员、义工（志愿者）等，通过教育和服务功能与社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和沟通渠道，使博物馆的工作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近年来，国内博物馆充分整合利用本馆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尝试着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例如：巡回展览、阵地讲解、举办知识讲座及主题冬、夏令营等，这些施教服务已被社会和公众所认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与社会接轨，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潜能方面，大多数博物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人力资源上，以往大多只着眼于社教部门甚至只在讲解人员方面“挖潜”，我们主张全馆所有职工以及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相关人员都可以纳入教育资源。本着人尽其才的精神，博物馆的每一个人，或在宣传博物馆自身，或在传播文化上均有用武之地，关键是大家要转变观念，具有这种宣传、教育的意识。例如首博就成立了专家组，安排副研以上专家担任重要来宾的讲解，开办专题讲座；安排业务人员参与对讲解人员的考评等；其实，作为博物馆的一分子，哪怕是门卫（收发室）的一名普通员工在其工作中也同样可以发挥宣传作用。因此，社会人力资源就更不容忽视，首先是各种传播媒体，他们具有覆盖面大、传播快、社会关注程度高等优势。可以透过媒体来提升公众对博物馆教育推广的普遍认知，或与电视台、广播电台共同制作节目，或是通过业务期刊、报纸杂志等吸引公众的眼球，刺激其参观或参与活动的欲望。

再者，社会上有许多热爱博物馆事业并甘心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士，其中有的可成为博物馆的义工，在讲解、网络、组织观众等方面发挥作用，有的可以专家身份在专项活动中起作用，如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科技馆、首都博物馆等志愿者，不仅为各博物馆提供了人力，其本身又作为博物馆社会人力资源通过参与博物馆的活动服务于社会。又如，首都博物馆推出的周末户外参观，就是以北京的城市历史发展为脉络，依托本馆通史——城建篇陈列，选定活动主题——《魅力的中轴线》，聘请资深专家做全程活动主讲，活动从通史展厅出发并随车与公众前往中轴线起始点永定门到钟鼓楼，一路上专家精彩的讲述让公众体验着不断变化着的城市历史，活动对主题的精心策划安排，巧妙地将博物馆教育阵地延伸于馆外，在挖掘、整合利用本馆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阵地上做了初步的探索，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

三、博物馆社教受众社会化

国际博物馆协会认为，当代博物馆应当成为“既反映社会又服务于社会”，“为当代和未来的公众服务”，“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社会变革的工具”。博物馆属社会性文化教育机构，其功能与正规教育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并相得益彰。博物馆的教育对象具有广泛性，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成员。大家可以自由地进出各个展厅，通过参与各种教育活动来汲取文化知识。

博物馆的教育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提高文化素养服务，为学生的校外教育服务，为成人的终生教育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旅游观光和文化休闲服务。博物馆作为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其服务范围是以整个社会为背景，在一切以人为本的今天，博物馆社会教育所关注的是社会群体中最广大、最普通的百姓，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观众群，从知识和生活两方面提供服务，深入百姓日常生活，了解其所想，提供其所需，改变以往高高在上的姿态，提供细致、周到的人性化服务，双方构建平等、和谐、

无障碍的交流，满足观众获取信息、学习、愉悦、休闲等多种需求，提升全社会的文化品格和全民素质。

所谓博物馆社教受众社会化就是根据本馆的资源特点和资源优势，在对现有观众和潜在观众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确立施教规划，引导公众进入博物馆为其探索学习等创造良好的教育空间，博物馆对教育资源的使用者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唤起他们的兴趣和渴望并给予支持和信心，运用创新的手段激发其参与意识，努力实现教育资源适用范围的最大化。公众是动态的群体，其来源构成、地域特征、文化积淀、兴趣爱好等也均是动态的，同时有着相当差异，随着社会大环境发展和日常小环境变动，公众的各种需求和倾向在随时变化，为此，博物馆有必要对服务对象——观众（包括潜在观众）进行深入细致的分类研究，切实了解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性，在实施社教活动时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年龄、生理、心理和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形式和特点的教育活动和娱乐活动，使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不同爱好的参观者都能有一种美的享受，特别是一些新建成的博物馆从整体建筑到展示空间设计上充分考虑到教育功能的应用，开辟专门的教育活动区、电化培训教室、多功能报告厅等，为公众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为开展丰富多彩、行之有效的宣传活动，组织策划各类参与性活动和广泛开展基地建设等多功能教育创造了有效空间。

首先，公众调查和宣传推广要从本馆的观众开始。来博物馆参观的观众自然成为社教受众，也是博物馆最直接的服务对象，观众来博物馆的目的不仅要实现和满足自己的个人愿望和期望，也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接受博物馆所传播的有关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及发展的相关知识和信息，这正是博物馆施教的极好机会；通过对现场观众参观全过程的追踪研究，在清楚地掌握观众的构成、参观动机、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创新服务项目，满足观众参观学习和休闲娱乐等多层次需求；依靠观众了解社会需求，依靠观众改进博物馆工作，依靠观众实现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依靠观众扩大博物馆的社会影响。

然而，博物馆社教受众面不单纯以来馆参观人数的多少来衡量。若希望博物馆实现社会集体记忆的固有功能，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无论是展陈主题的确定及上展文物的选定，还是博物馆社教活动的开展，都应以传递学习资讯和受众为考虑。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繁荣，不同地区、不同国籍的人们都将加入到此行列中，随之而来的自娱自乐、自我教育、兴趣各异的观众将会越来越多，想要拥有更高的控制权，若不提前调查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方案，只用单一手法来对待不同服务对象，那么成功的机率就可能是零。因此社教受众社会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社会公众进行分类研究。只有充分了解公众的需求、分析公众需求，社教服务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做到有的放矢。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社教活动，有目的的培养教育资源的使用者，受众就可以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分享和体验博物馆的教育资源。例如，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公民道德展”不仅深入到学校、社区，还将展览送进监狱和劳教所，与这些单位合作辅导受刑人员的感化教育。再如，首都博物馆社教服务另辟蹊径，用本馆专用大客车免费接送远郊区县和来京务工人员的孩子们来博物馆参观，关心弱势群体，帮助有需求且有困难的人群实现参观的夙愿。

另外，参观之前在明确本馆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引导公众进入馆方提供的教育空间，并提供协作让他们能够完整地学会探索博物馆的资源，唤起他们的兴趣，激发参与其中的兴致。要尽可能考虑到不同社教受众群体的需求。例如许多博物馆推出了在公众来馆参观前由博物馆派出讲解员或专家到社区或学校为即将去博物馆参观的公众做前置讲解，并针对参观内容提出问题和思考，让公众带着探究某一问题的兴趣走进博物馆，该项服务深受组织单位和受众的欢迎。可以注重开发家庭观众，开辟这些博物馆的陌生领域，通过大手牵小手或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开展活动，探索开展新活动的机会。博物馆通过举办各类活动服务社会的方式还有很多，有待于从事博物馆社教工作的同仁们不断的探寻和延展。

四、结束语

进入 21 世纪，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密。博物馆一系列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社会教育作为博物馆的灵魂，是博物馆融入社会、赢得市场的重要手段，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是博物馆寻求社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将为博物馆社教工作的延伸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社会教育部馆员）



资料室如何适应博物馆的现代化进程

——以首都博物馆为例

王晓侠

一、首都博物馆资料室在博物馆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

就传统博物馆资料室的一般状态而言，其存在如下特点：其一，从图书种类来看，专业性极强。主要是涉及历史、考古、文物、古籍、古建、博物馆文物藏品的介绍、研究资料和各种类型的档案资料等。其二，从利用者看，读者稳定性强，基本都是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那么在博物馆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料室就需要改变传统的状况，走出传统做法的困境。

（一）服务功能的转换

1、扩大藏书数量，加强基础藏书的建设，逐步走出新书更新慢的困境。文献资料是资料室存在的基础，所以文献资料的多与少、新与旧足以制约资料室在博物馆的影响力。截至 2008 年，首都博物馆资料室藏书达 6 万余册，其中平装书近 3 万册，线装书 1.5 万册，杂志 1.5 万本，报纸若干。而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文献因为经费的制约，都是 2005 年以后购进的。为了适应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资料室从 2003 年至今购书经费从不足 4 万元增加到 70 万元，一些大部头的图书开始购进，例如现代版《分类中国美术全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古今图书集成画册》、《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线装画册》、《永乐大典》、《丛书集成》二编、三编（台湾出版）等；考古类书如《北京考古集成》、《中国考古集成》等。

2、规范资料室的日常工作，提高工作的科学性。首都博物馆资料室在新馆建设中不断完善工作规范条例，引进现代化管理模式，图书系统采用的是北京清大新洋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中科新洋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 GLIS8.0 通用图书馆集成系统。自动化管理系统的使用包括图书的采购、编目、流通，读者管理；期刊的订购、记到、装订和过刊管理；图书、期刊的远程检索、预约、征订、征询以及馆务管理等图书馆的整个工作流程的内容。资料人员分批次去首图培训，并由软件公司职员进行专业指导，对于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严格遵循图书管理软件的程序；数字首博的综合信息平台的综合资料库，直接链接图书信息系统，馆员通过其远程服务查找所需图书；首博的“一卡通”（智能卡）在图书室由系统注册后就可启动读者的管理及使用程序。科学的管理规范的实施使资料

室的工作规范化、流程化、责任化，避免了日常工作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浮于表面的状况。

3、扩大藏书范围和种类，实现资料室资料的多样性与对外的主动性。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以来，专业工程方面的人员大量进入，由过去的博物馆文物考古专业已经扩展到计算机、多媒体、工程管理、建筑结构、城市规划、材料分析、文物修复、化学实验、金属测试、舞台灯光、世界史、专业翻译、法律、财会、自动化系统、物业管理等诸多领域，专业的多样化使资料室图书范围和种类的扩大与升级势在必行。

4、改变观念，主动服务。在博物馆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料室要主动地服务博物馆的各项工作。这就要了解博物馆的科研状况与其他部门所需资料的状况，而不是简单的由各个部门提出书目，然后资料室采购就完事了。资料室要放下架子，主动提供服务，这一方面对资料室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掌握更多的图书、版本、目录信息与知识，这样可以提升资料室的整体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也为馆内职员节省了搜寻书籍、查找资料的时间，为他们做好工作提供更多的具体服务，这也是新时代对博物馆工作更加专业化的要求。

以上所述，都是从完善资料室的基础性工作的角度出发而言的，唯有基础性工作做好，才谈得上为博物馆的现代化服务。

（二）增强服务的意识

首都博物馆资料室自 2006 年起，即制定了图书数字化的目标和计划，强调计算机化管理，力争提供学术资料数字版本书籍。资料室花大力气，聘用专门的录入公司，把首都博物馆几十年的检索资料电子化。凭借互联网平台，直接服务于每位阅读者，大大提高了检索的速度，也提高了服务质量。目前首都博物馆资料室图书信息化录入工作已在北京地区博物馆中处于技术比较领先的地位。如：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中日韩三国首都博物馆论坛”，首尔历史博物馆和江户东京博物馆都对首博的网上博物馆和开放的资料检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目前首都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位居全国博物馆系统的前沿。首都博物馆的现代化相应的带动了资料室的现代化，这使得以往的资料查询乃至保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学者写论文要一本书一本书地翻阅查找，以求从汗牛充栋的图书中找到可利用的资料，先将搜集到的一条条资料抄到卡片上，再整理归纳；文物保管员查找藏品要翻账本、翻登记卡片，领导决策依据的是抄写或打印的报表、书面汇报等等，现在利用计算机网络平台，可以随时搜索、调阅数据库中存储的数字版本的图书资料、藏品档案，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速度快、准确度高。

二、首都博物馆资料室未来工作展望

21 世纪图书馆，由搜索信息向信息组织、整理发展；图书馆界将专注于信息资源建设，包括各种信息资源，传统的和数字化的信息资源的收集、长期保存和组织等。信息资源的保存和组织将成为图书馆的首要功能。图书馆 2.0 模式是借助 web2.0 技术使图书馆用户在图书馆服务和利用服务的方式上能够更好地与人分享，其核心价值：“合作、共享、共同参与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资料室在未来怎样做才能与博物馆的现代化进程同步？

前面以首博为例谈到的是资料室的过去与现状，那么就未来的设想我个人认为应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资料室业务工作的拓展与完善需围绕着为博物馆研究工作服务为中心来展开。

1、拓展图书、信息资料的采集范围，提升收藏品质及完善信息资源的保存和组织功能。

（1）采集品种的多元化。如补充多语种文字资料、文化史、音乐类等。资料部门应扩大采集范围，为本馆专业技术人员提升业务研究水平提前做好边缘学科资料的储备。

（2）传统数字化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首博开放后各类展览的策划和大纲的写作是博物馆面临的最迫切的工作。不仅是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媒体宣传的常规运作，物业流程、安保方案、文物保险、文物运输、开幕式效果设计、学术会议、专题讲座、媒体访谈等都是作为展览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料室应增加与展览活动相关的一切纸本资料及电子文本资料的收集、整理，既达到保存展览资料的目的，又能为文博界展览活动提供借鉴与学习交流的第一手实操资料。

（3）图书资料工作的发展应以科学化、规范化为本，而国家图书馆始终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聘请该馆的专家做指导，可使资料室的工作更加规范和完善，以达到向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最佳服务的目的。

（4）非物质遗产及工业遗产课题研究的数字化采集和分类整理，建立专业资料库。像首博近几年对工业遗产的调研就很有成效，如通过对京

西地区工业遗产资源以及工业遗产周边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实地调查，从而获得该地区工业遗产资源现状的第一手资料。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进行整体分析和评估。对京西地区工业遗产资源现状进行分析，规划京西地区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再利用的方式，实现京西地区资源和谐，促进该地区的整体发展。目前首博已对京西工业遗产（包括京张铁路、首钢工业遗址等）、北京火柴厂、北京焦化厂等进行了调研。对于上述非遗和工业遗产的保护、传承作为博物馆有责无旁贷的责任，资料室建立相应的专项资料库，进行分类、编辑整理，既达到保护、传承北京地区文化遗产的目的，又能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纸本和电子文本等资料，最终通过展览的形式向社会宣传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2、寻找合作、共享、共同参与的新途径，尝试新型服务模式特别是增加搜索引擎信息服务及整合汇总使之成一个新的信息服务产业。

(1) 增加搜索引擎信息服务的整合汇总并及时反馈给研究人员。

a. 设专人进行信息资料的搜集、整合。如提供图书馆、博物馆系列网址以及最新学术动态简介预告等。

b. 将整合后的信息资料上传馆信息平台并定期编印信息资料快讯，组织专门人员（包括志愿者）将馆藏外文资料（图书、光盘）进行提要翻译、编辑。

（2）合作、共享、共同参与探索。

a. 与文博系统的资料部门合作，采集信息数据然后实行资源共享。

b. 与图书馆系统在信息平台上链接实现馆际互借，使本馆研究人员（对部分馆外读者可进行授权，或适当收取费用）足不出户即可得到所需资料。

c. 每年将博物馆的信息中心的资源整合、归纳编辑。对外举办博物馆数字化管理系统和媒体创新论坛和培训班，邀请西方各博物馆相关方面的专家作 MBA 案例分析。目前学习班面对中国各级博物馆，已创办 5 年，形成业内品牌，后续应该结合 21 世纪博物馆的需求在办班范围和培训目标方向上有所调整。

（二）提升图书资料人员的综合素质，逐步朝着咨询、研究方向努力。

1、引进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网络条件下资料室服务的新模式。资料室应招收一些既有图书资料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外语和计算机能力的年轻人。

2、对现有资料人员进行再培训。派青年业务骨干去国内外最先进的馆学习，写出有研究价值并与我馆资料工作相联系的文章；同时邀请馆内外的专家学者讲课，使资料人员能够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

3、增加图书资料书刊、电子产品的购买、订阅范围。使资料人员能够及时掌握图书资料方面最前沿的信息。

（三）服务功能的延伸。

1、“读书会”的延续与发展。以往首博资料信息研究中心每周四中午举办的一个小时的读书会，形式多种多样、内容涵盖广泛，受到推崇。这里提出两点建议：(1) 增加预告宣传范围，能使更多的人参与；(2) 扩大研讨专题的范围、可适当增加国内外文博界学术动态的介绍等。

2、建立一支有外语专长的志愿者队伍（馆内外人员均可），组织翻译一些馆藏或捐献的外文资料，以改变西文资料乏人利用的现状。

3、充分利用本馆视听室，资料室可定期组织观片会。将翻译、整理过的光盘资料提供给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观摩，使信息资料能够最大化的服务于馆员。

三、结论与反思

现代化的博物馆要求我们必须把服务作为第一要义，唯有这样才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对于从事资料室工作的每一个员工，其提供的服务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首都博物馆资料室在短短几年之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观念的转换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资料室也有更多的扩展空间等待我们发掘。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资料室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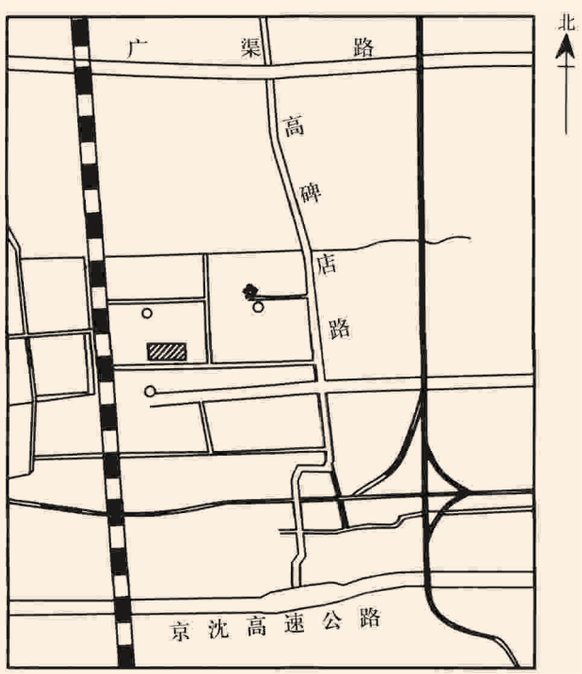
北京华能热电厂墓地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华能热电厂墓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墓地东邻东五环路，西距北京华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车间 60 米，北起绿化队办公楼，南至热电厂大院南围墙（图一）。继 2005 年首次发掘后[①]，2007 年 9 ～ 10 月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再次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 21 座（M1 ～ M21，图二）。现将此次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此次清理的 21 座墓葬，以清代墓葬为主，金代、明代墓葬数量较少，另有少量搬迁墓。现按时代分别举例介绍。



图一　华能热电厂墓地位置示意图

（一）金墓

仅发现 1 座，编号 M6。圆形砖室墓，顶部坍塌，残毁严重。墓口距地表深 0.7 米，墓底距地表 2 米。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棺床等部分组成。斜坡状墓道位于墓门的南端，南北长 2.5 米，东西宽 0.98 米。甬道残高 0.5 米，长 0.64 米。墓门残高 0.5 米，宽 0.98 米。圆形墓室直径 2.26 米，墓壁残高 0.94 米，采用一层平砖加一层竖砖叠砌而成。墓室东北部砌有方形棺床，南北长 1、东西宽 1.1、高 0.22 米。墓底不见铺地砖。该墓为火葬墓，烧骨及随葬品凌乱分布于墓底和棺床上。推测烧骨及随葬品原置于棺床上，后因进水漂浮而失去原位。出土随葬品有 1 面铜镜、2 只瓷碟、60 余枚铜钱、2 块鹅卵石，另有一些碎蛋壳和鸡骨。铜钱相互串联呈椭圆状分布，部分铜钱上粘附有丝织物朽痕。铜镜的西侧见有两块长方形木条残痕（图三 ；彩版 1）。

（二）明墓

共清理 4 座，编号分别为 M10、M12、M17、M18，分为单人葬、双人合葬和三人合葬。均为竖穴土圹墓，有木棺，葬式均为仰身直肢。

M10　墓向 10 度，墓口距地表 0.5 米，南北长 2.88、东西宽 2.2 米，墓底距地表深 2.82 米。M10 为夫妻合葬墓。内葬双棺，棺木保存较好。西棺内葬一男性，随葬有铜钱 10 余枚。东棺内葬一女性，随葬有 1 件绿釉陶罐。

M12　墓向 0 度，墓口距地表深 1 米，南北长 2.1、东西宽 1.04 米，墓底距地表深 3.6 米。内葬单棺，棺木保存较好。墓主为男性。出土随葬品有 1 副玉带、1 件金耳勺。另在脚厢外的填土里发现 1 面铜镜。

M17　墓向 2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4 米，南北长 4、东西宽 2.4 米，墓底距地表深 3.6 米。

M17 为夫妻合葬墓。西棺内葬一男性，随葬有 1 副玉带、2 枚银质冥币、1 只金耳环。东棺内葬一女性，随葬有 1 只金耳钉、1 件金耳勺、10 余枚银质冥币、10 枚铜钱。另在高出墓室南侧的二层台上出土墓志一合（图四；彩版 2）。

M18　墓向 15 度，墓口距地表深 1 米，南北宽 2.4、东西长 3.1 米，墓底距地表深 2.85 米。内葬三棺，棺木和骨架保存较差，均随葬有数枚铜钱。

（三）清墓

共计 12 座，编号为 M2、M3、M4、M5、M7、M11、M13、M14、M15、M16、M19、M20。均为竖穴土圹墓，有单人葬和双人合葬之分别。

M2　墓向 35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南北长 2.36、东西宽 1.2 ～ 1.4 米，墓底距地表深 1.8 米。单棺内葬一男性，随葬 1 件黑釉瓷罐和 1 件红陶灯盘（图五）。

M3　墓向 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南北长 2.5、东西宽 2.8 米，墓底距地表深 1.6 米。双棺合葬，东棺为男性，仰身直肢，西棺为女性，曲肢侧身朝向男性。出土 1 件瓷罐和 6 枚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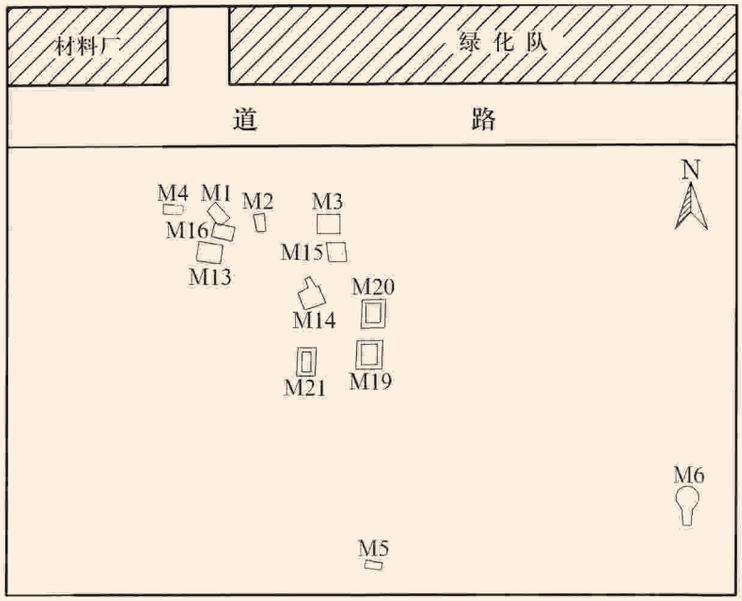
M4　墓向 31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南北宽 0.70、东西长 2.3 米，墓底距地表深 2 米。单棺葬，棺木已朽，骨架保存较差。出土 1 件银簪、2 枚铜钱。

M5　墓向 27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9 米，南北宽 1.20 ～ 1.26、东西长 2.36 米，墓底距地表深 2.4 米。单棺葬，棺木已朽，骨架保存较差。出土 1 副银耳环、3 枚铜钱。

M7　墓向 7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9 米，南北长 2.4、东西宽 0.9 ～ 1.2 米，墓底距地表深 1.9 米。单棺葬，棺木及骨架保存较好。无随葬品。

M11　墓向 15 度，墓口距地表深 0.5 米，南北长 2.84、东西宽 2.2 米，墓底距地表深 2.3 米。双棺合葬，西棺棺木及骨架保存较好，东棺较差。出土 3 枚铜钱。

M13　墓向 2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9 米，南北长 2.6、东西宽 2.45 ～ 2.6 米，墓底距地表深 2.5 米。双棺合葬，棺木及骨架保存较差。出土 3 件银簪、1 副银耳环、1 件陶罐和数枚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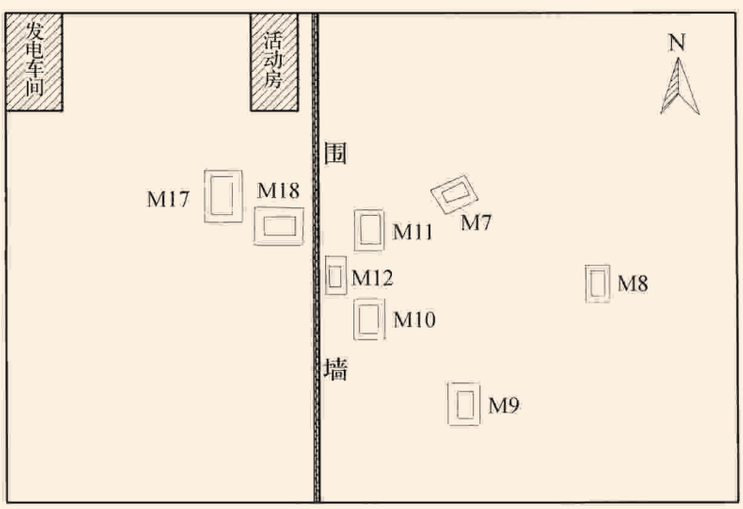
图二-1　北京华能热电厂墓地 I 区墓葬分布图　0 2 6 米

M14　墓向 70 度，墓口距地表深 1.1 米，南北宽 1.82 ～ 2.08、东西长 2.6 ～ 2.68 米，墓底距地表深 1.7 米。双棺合葬，棺木及骨架保存较差。出土有铜簪、灰陶罐以及数枚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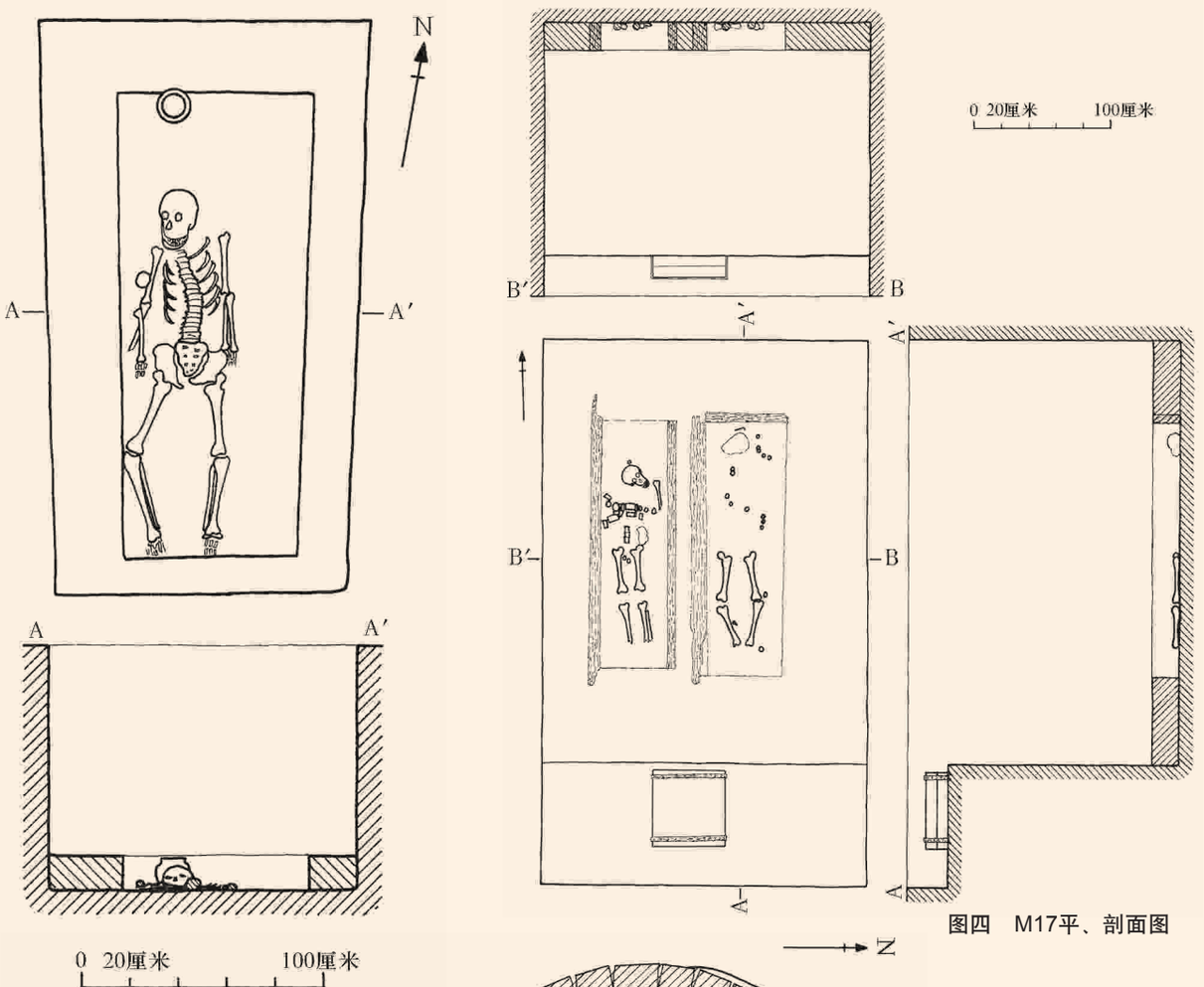
M15　墓向 355 度，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南北长 2.74、东西宽 2.45 米，墓底距地表深 1.9 米。双棺合葬，棺木及骨架保存较差。出土有银簪和数枚铜钱。

M16　墓向 30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南北宽 1.72 ～ 1.8、东西长 2.48 米，墓底距地表深 1.95 米。M16 为夫妻合葬墓。北棺内葬一男性，随葬 1 枚铜钱。南棺内葬一女性，随葬有银簪 1 件、银耳环 1 只。

M19　墓向 3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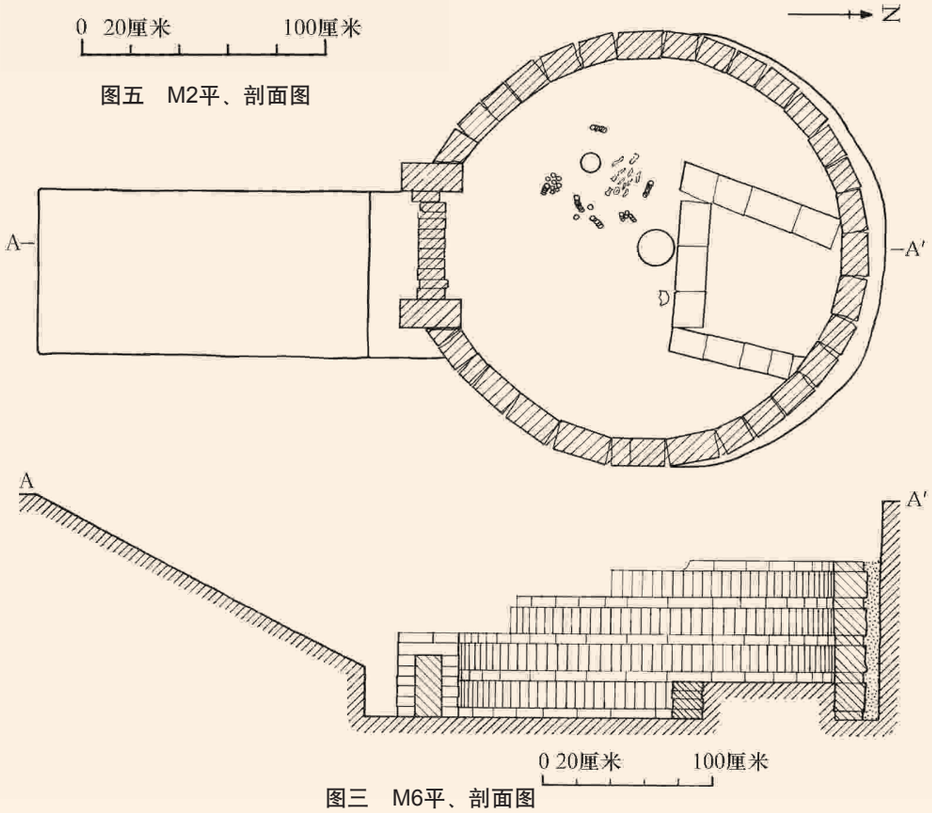


图二-2　北京华能热电厂墓地II区墓葬分布图　0 2 6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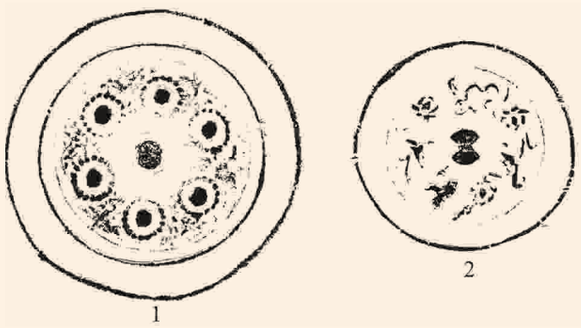


图四　M17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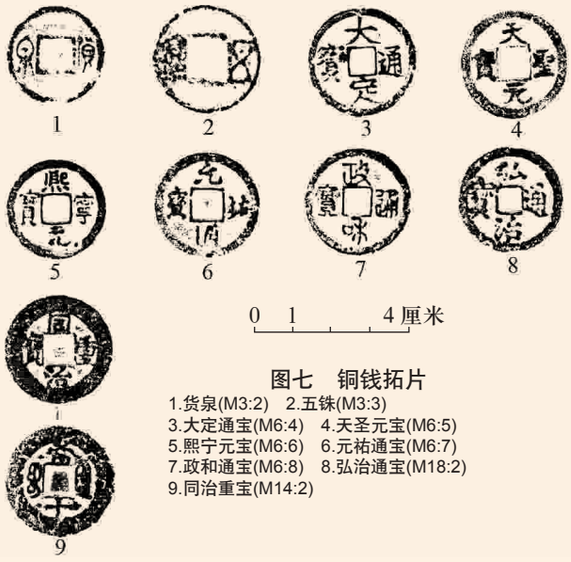
图五　M2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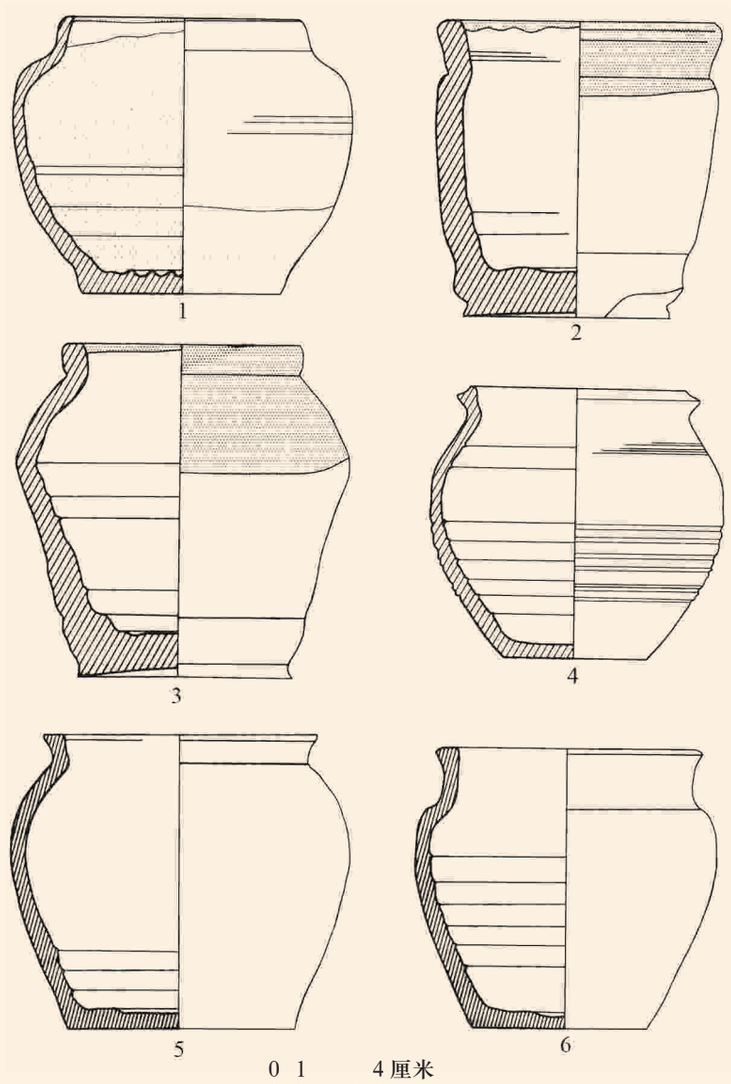
图三　M6平、剖面图



图六　铜镜拓片
1.M17:2　2.M12:1



图七　铜钱拓片
1.货泉(M3:2)　2.五铢(M3:3)
3.大定通宝(M6:4)　4.天圣元宝(M6:5)
5.熙宁元宝(M6:6)　6.元祐通宝(M6:7)
7.政和通宝(M6:8)　8.弘治通宝(M18:2)
9.同治重宝(M14:2)



图八　墓葬出土陶罐
1.M2:1　2.M3:1　3.M10:1　4.M14:1　5.M13:4　6.M20:1

北长 2.60、东西宽 1.90 ～ 2.10 米，墓底距地表深 1.80 米。双棺合葬，棺木已朽，骨架保存较差。西棺随葬有 1 件铜簪（已残破）、1 枚铜钱，东棺随葬有 1 枚铜钱。

M20　墓向 40 度，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南北长 1.78、东西宽 0.50 ～ 0.52 米，墓底距地表深 2.04 米。单棺葬，棺木已朽，骨架保存较差。随葬有灰陶罐 1 件。

（四）搬迁墓

共清理四座，编号为 M1、M8、M9、M21。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向无规律，一般长 2.5 ～ 2.8、宽 1.1 ～ 1.9、深 1.7 ～ 3.4 米。不见葬具、骨架和随葬品，推测为迁出葬。

二、随葬器物

此次发掘出土的随葬器物，按质地分为玉、瓷、铜、金、银、陶器，另有 1 合汉白玉墓志。

玉器，为两副玉带，分别出自 M12 和 M17。

M12：3，共计 20 块。玛瑙质，浅粉红色，有层状纹理，透明度较好。素面，正面抛光，背面钻有穿鼻。可分为长方形、桃形、圆角圭形、长条形四种。玉带宽 3.1、厚 0.49 厘米。个别玉带板还粘附有绿色铜锈（彩版 3）；M17：1，共计 20 块。均为白玉质，素面，正面抛光，



彩版1　M6



彩版2　M17

背面钻有穿鼻。也分为长方形、桃形、圆角圭形、长条形四种。出土时保持原有连缀顺序，三台部位还有一件镏金铜带扣。玉带宽 3.5、厚 0.6 厘米（彩版 4）。

瓷器，两只瓷碟，均出自 M6。

M6：2，白胎，白色釉面局部有浅褐色斑，口沿一周涩胎无釉。浅弧腹，平底圈足，足脊满釉。口径 9.3、足径 3.2、高 1.7 厘米（彩版 5）；M6：3，灰白胎，器里施酱黑色釉，底心一周涩圈，外壁仅口沿施釉，其余部位涩胎。厚唇，浅弧腹，平底圈足，口沿部位残。口径 9.3、足径 4.3、高 2.5 厘米（彩版 6）。

铜器，包括铜镜和铜钱。

铜镜共三面。M6：1，光素无纹，无镜钮，宽平缘，直径 20.3、厚 0.7 厘米；M17：2，形制较小，窄缘略卷，半球形镜钮，钮外饰一周花叶纹，直径 7.9、厚 0.5 厘米（图六，1；彩版 7）；M12：1，形制小，窄缘略卷，银锭形钮，钮外饰一周花卉纹，直径 5.6、厚 0.6 厘米（图六，2；彩版 8）。

铜钱数量较多，仅 M6 就出土 60 余枚。此次出土的铜钱年代最早的有王莽时期的“货泉”，最晚的为清代晚期的“同治重宝”。钱文有“五铢”、“货泉”、“大定通宝”、“天圣元宝”、“熙宁元宝”、“元祐通宝”、“政和通宝”、“弘治通宝”、“同治重宝”等。

“货泉”M3：2，残缺，圆郭方穿，穿正面两侧篆书“货泉”，钱径 2.3 厘米，穿径 0.7 厘米，厚 0.1 厘米（图七，1）。

“五铢”M3：3 ，残缺，圆郭方穿，穿正面两侧篆书“五铢”，钱径 2.5 厘米，穿径 1.0 厘米，厚 0.1 厘米（图七，2）。

“大定通宝”M6：4，完整，正面真书“大定通宝”，瘦金体，对读，钱径 2.5 厘米，穿径 0.6 厘米，厚 0.2 厘米（图七，3）。

“天圣元宝”M6：5，完好，正面真书“天圣元宝”，环读，钱径 2.5 厘米，穿径 0.7 厘米，厚 0.2 厘米（图七，4）。

“熙宁元宝”M6：6，完好，正面真书“熙宁元宝”，环读，钱径 2.3 厘米，穿径 0.7 厘米，厚 0.2 厘米（图七，5）。

“元祐通宝”M6：7，完好，正面行书“元祐通宝”，环读，钱径 2.9 厘米，穿径 0.8 厘米，厚 0.2 厘米（图七，6）。

“政和通宝”M6：8，完好，正面隶书“政和通宝”，对读，钱径 2.5 厘米，穿径 0.7 厘米，厚 0.1 厘米（图七，7）。

“弘治通宝”M18：2，完好，正面楷书“弘治通宝”，对读，钱径 2.5 厘米，穿径 0.7 厘米，厚 0.2 厘米。（图七，8）。

“同治重宝”M14：2，完好，正面楷书“同治重宝”，对读，背面穿上下楷书汉文“当十”，左右为满文“宝泉”，钱径 2.6 厘米，穿径 0.8 厘米，厚 0.4 厘米（图七，9）。

金器，包括金勺、耳环、耳钉等。

金勺 M12：2，柄分两截，一端为长六棱锥形，粗端连串珠状短颈，短颈另一端连半球形勺。长 10.5 厘米。也可做发簪用（彩版 9）。

金耳环 M17：3，金质，圆形，手工打造，通体素面，直径 1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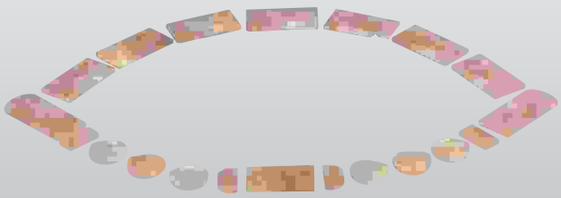
金耳钉 M17：4，金质，圆柱体，顶部帽形，尾尖，长 0.8 厘米。

金勺 M17：5，耳挖形首，体细长，尾圆尖，长 7.9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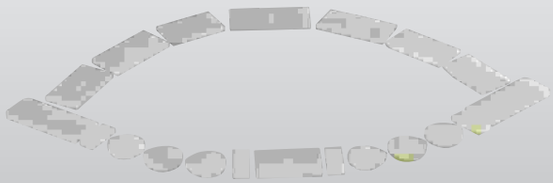
银器，包括银簪、银质冥币、银耳环等。

银质冥币 M17：6，M17 东棺所出。较薄，系用银箔剪成，呈不甚规则的圆形，直径 2.3 厘米，穿亦为不规则方形，径 0.4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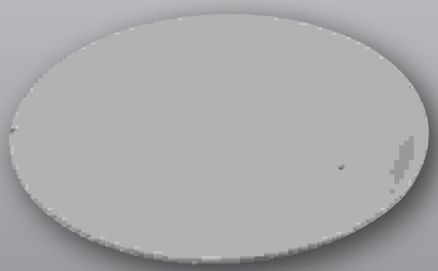
银簪 M13：1，簪头为圆形，可分两层。上层直径 1.3 厘米，用银丝在圆环内掐成“寿”字，下层直径 2.3 厘米，正面錾刻月华锦纹，背面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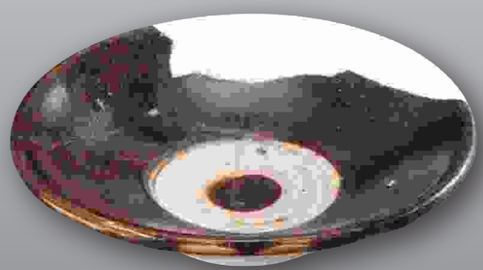
彩版3　玉带（M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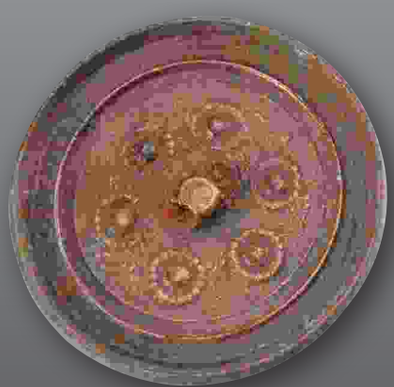
彩版4　玉带（M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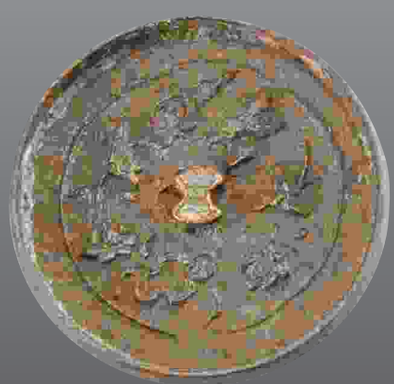
彩版5　瓷碟（M6:2）



彩版6　瓷碟（M6:3）



彩版7　铜镜（M17:2）



彩版8　铜镜（M12:1）



彩版9　金勺（M12:2）



彩版10　银簪（M13:1）

刻“振元”二字。簪体为圆锥形，长 12.7 厘米（彩版 10）。

银耳环 M13:3，一端为蘑菇首状，一端尖细，弯曲呈“S”形，长 2.5 厘米。

陶器，包括陶罐、灯盘等。

陶罐 M2：1，灰白胎，胎质硬，肩部及上腹施黑釉，釉色均匀光亮，下腹及底足露胎。口径 7.8、底径 7.3、高 9.9 厘米（图八，1）。

M3:1，灰白胎，口沿施黄褐色釉，其余部位涩胎。圆唇，弧腹，平底。口径 10.4、底径 7.5、高 10.7 厘米（图八，2）。

M10：1，灰白胎，口沿及肩部施黄褐色釉，其余部位涩胎。圆唇，斜折肩，平底。口径 8.7、底径 7.5、高 12 厘米（图八，3）。

M13:4，泥质灰陶，斜方唇，溜肩，平底。光素无纹。口径 9.9、底径 8.2、高 10.6 厘米(图八,5)。

M14：1，泥质灰陶，斜方唇，溜肩，平底。光素无纹。口径 9.3、底径 6.5、高 10.1 厘米（图八，4）。

M20:1，泥质灰陶，斜方唇，竖颈，溜肩，平底。光素无纹。口径 9.6、底径 5.7、高 10.2 厘米（图八，6）。

灯盘 M2：2，浅黄褐色，陶质疏松，敛口，腹部斜收。形制较小，口径 6.3、底径 4.1、高 3 厘米。

墓志，出土于 M17 东棺南侧的二层台上。汉白玉质，50.7 厘米见方，盖、志厚度分别为 8 和 7.5 厘米，带字面相对扣合，外施铁箍两道。见下图：



三、结　语

此次发掘的 21 座墓葬，年代上起金代，下迄明、清，墓地沿用时间长。除 4 座搬迁墓外，其余大部分墓葬均随葬有铜钱或墓志等纪年材料，年代较为清楚，可作为判明该地区金、明、清时期墓葬形制和葬俗的可靠标志。

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出土的三座明代墓葬（M17、M18、M12）。M17 出土的墓志明确表明东棺的墓主为怀柔伯施荣的夫人萧氏，则 M17 西棺的墓主为第二代怀柔伯施荣无疑。M12 随葬玉带和铜镜的风格，与 M17 一致，其墓主也必袭怀柔伯爵位。

结合 2005 年发掘的施聚、施鉴墓[②]，表明这 5 座墓葬同属明代怀柔伯家族墓地。萧氏墓志中“葬朝阳关六里屯祖茔之原”一语，说明施氏家族有族葬地。各墓葬排列有序，第一代怀柔伯施聚葬在北端正中，以施聚为中心，其子、孙中袭怀柔伯爵位者呈“人”字形葬在他左、右。左列（即东边）第一排，葬施聚之子、第二代怀柔伯施荣及其夫人萧氏。右列（即西边）第一排，葬施聚之孙、第三代怀柔伯施鉴。这种聚族而葬且长幼排列有序的葬式，与史书记载的“昭穆制度”相吻合。如此典型且等级又高的明代家族墓地，在北京明代考古发现中尚属首见。



M12、M17 出土的铜镜镶嵌于棺木外，且形状小，镜面铸、磨质量均较差，不具有实用价值，应是随葬用的冥镜，用以镇邪驱恶。明人所撰《五杂俎》中有关于随葬冥镜的记载，正好与考古发掘相印证。这两面冥镜的出土，为确定此类传世品的年代及用途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①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华能热电厂明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6 年 6 期。

发　掘：李永强　刘风亮
绘　图：张济发　刘晓贺
整　理：古艳兵　刘晓贺
照　相：李永强　韩宜林
执　笔：李永强　刘风亮　孙　勐

朝阳区北顶娘娘庙东侧清代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07年11月14日至11月18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朝阳区北顶娘娘庙东侧的清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工作。此次考古发掘地点位于朝阳区西北部的洼里地区，东邻国家体育场，西邻北顶娘娘庙，南邻南一路，北邻水立方（图一）。地理位置为东经116°23′5.50″、北纬39°59′20.58″，海拔高度49米。本次发掘清理的16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圹墓，可分为单棺墓、双棺墓、三棺墓、瓮棺墓和搬迁墓（图二）。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棺墓

单棺墓共2座，编号为M12、M14，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

M12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105°。墓口距地表1.50米，墓底距墓口0.45米。墓圹长2.70米，宽1.06米。内填花土，土质湿软。内置单棺，棺木已朽。棺长1.65米，宽0.43米～0.50米，残高0.1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东脚西，面向上，仰身直肢葬（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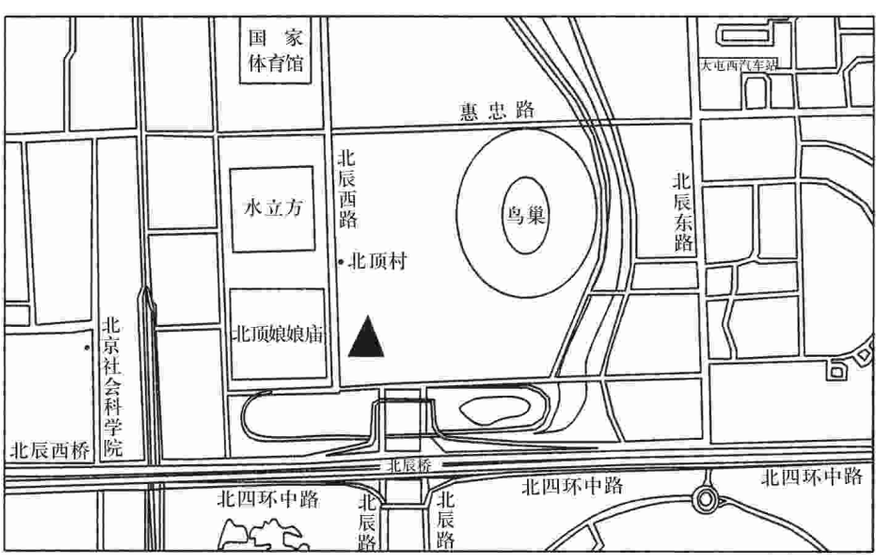
随葬品　珠子43颗、圆料饰5件、鼓形玉器1件、银镯3件、骨牌1套、铜指套1件、陶罐1件、铜钱5枚。

珠子　43颗。标本M12∶1—1，2粒，玻璃质，粉红色，球形体，珠体中间通体钻小圆孔。直径1.2厘米、圆孔直径0.4厘米（照片一；图四，7）。标本M12∶1—2，41粒，铜质，灰色，圆球形，顶部作环状，球体通体素面。直径0.3厘米、圆孔直径0.01厘米（图四，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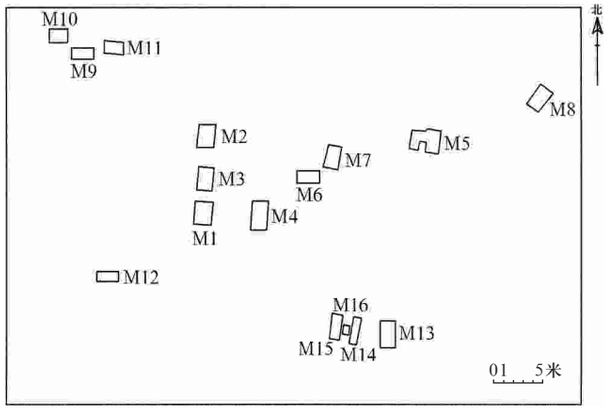
圆料饰　5件。标本M12∶3—1，残，石质，乳白色，呈圆形，器边有人工打磨的痕迹。直径2.5厘米（图四，6）。标本M12∶3—2，同上，直径2.9厘米（图四，3）。

鼓形玉器　1件。标本M12∶4，白玉质，乳白色，呈鼓状，上下端各饰凹弦纹及鼓钉纹各两周，腹部钻刻两圆孔，孔径0.3～0.4厘米，最大腹径1.9、高2.4厘米（照片二；图四，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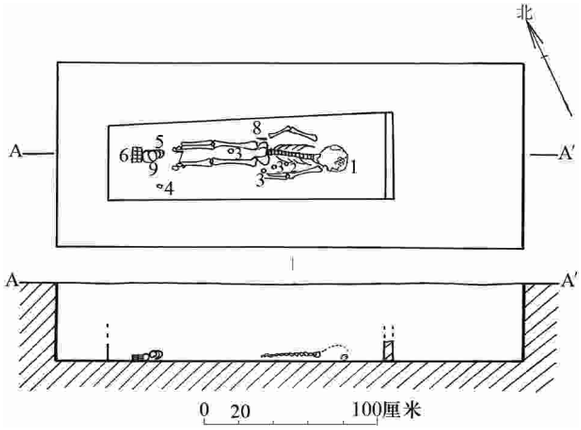
银镯　3件（套）。标本M12∶5，其中1件扁圆环状，外体饰竹节纹、回字纹、菱形纹，内阳刻“元吉”、“足纹”四字。直径5厘米。另2件形制相同，圆柱体环状，器体上饰竹节纹，直径4.7厘米。3件银镯由3个素面银质小圆环相连，直径



图一　发掘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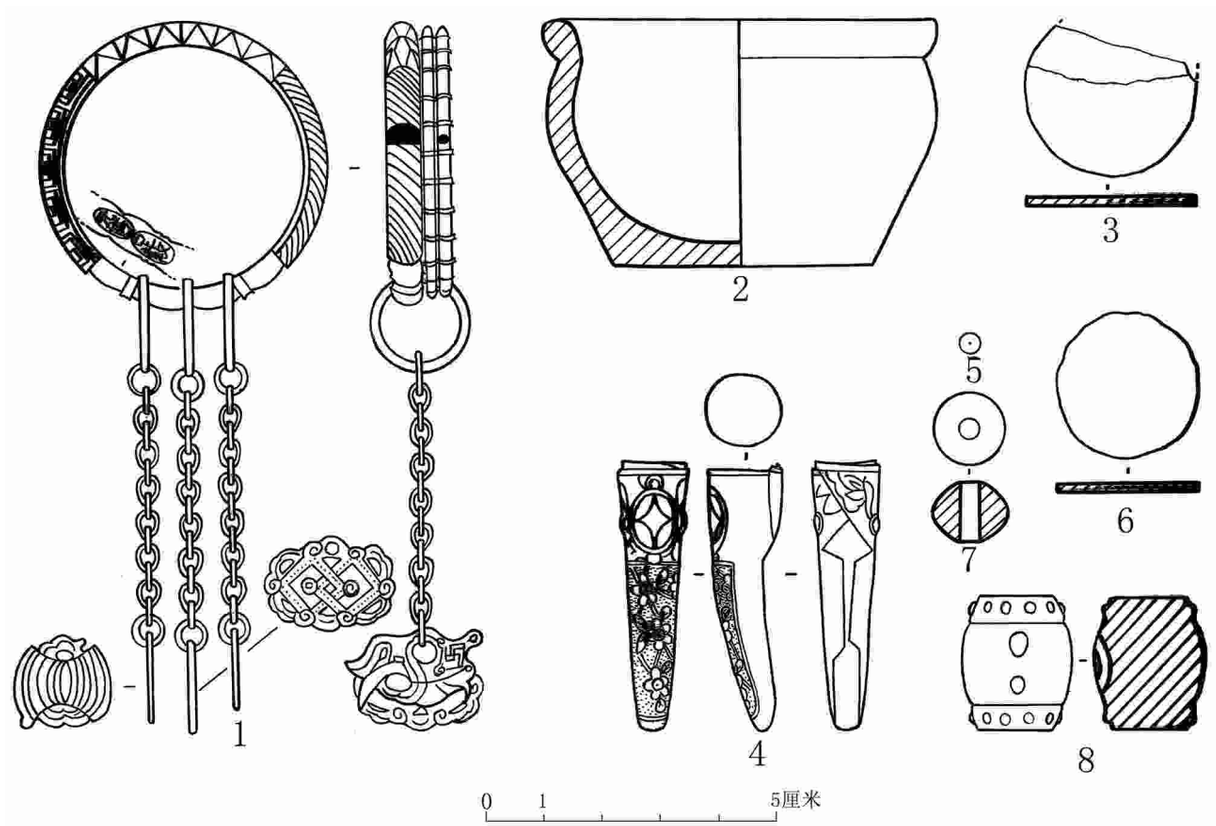


图二　墓葬分布图



图三　M12平、剖面图

1.珠子　2、7.铜钱　3.圆料饰　4.鼓形器
5.银镯　6.骨牌　8.银指套　9.陶罐



图四　M12墓葬出土器物

1.银镯（M12:5）　2.陶罐（M12:9）　3、6.圆料饰（M12:3-2、M12:3-1）
4.银指套（M12:8）5、7.珠子（M12:1-2、M12:1-1）　8.鼓形玉器（M12:4）

1.7 厘米，与小连环相连有三条银链，长 4.9 厘米，三条银链分别连接银质银锭、方胜、法螺牌饰各一件（照片三；图四，1）。

银指套　2 件，形制相同。标本 M12:8，银灰色，呈手指状，中间有孔隙，器体上刻有几何、梅花纹，长 4.7 厘米（照片四；图四，4）。

骨牌　1 套。标本 M12:6，32 块，骨质，长方体，正面钻刻圆点子，以不同方式排列的由 2 到 12 的点子。长 3、宽 2、厚 0.7 厘米（照片五；图五）。

陶罐　1 件。标本 M12:9，轮制，泥制红陶，直口，圆唇，束颈，腹微鼓，下腹弧收，平底，通体素面。口径 6.9、底径 4.5、通高 4.2 厘米（图四，2）。

铜钱　5 枚。有“乾隆通宝”、“康熙通宝”、“咸丰重宝”三种。

“乾隆通宝”2 枚。标本 M12:2−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2.2、穿径 0.6、郭宽 0.3 厘米（图六，8）。

“康熙通宝”　1 枚。标本 M12：2−2，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康熙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2.5、穿径 0.6、郭宽 0.4 厘米（图六，7）。

“咸丰重宝”2 枚。标本 M12:7，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咸丰重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3.8、穿径 0.9、郭宽 0.2 厘米（图六，5）。

M14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5°。墓口距地表深 1.50 米，墓底距地表深 0.70 米，墓室长 2.40 米，宽 0.96 米～ 1.16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软，含有大量料礓石。内置单棺，棺木已朽。长 1.80 米，宽 0.60 ～ 0.70 米；人骨头北足南，仰身直肢，骨架保存较完整。

随葬品　陶罐 1 件、铜钱 4 枚。

陶罐　1 件。标本 M14:1，轮制，泥质红褐陶，直口，圆唇，束颈，直筒形腹，平底，红褐色粗胎，见修坯旋痕，仅口、颈部施浅绿色釉。口径 9.8、底径 8、通高 10 厘米（图七，6）。

“乾隆通宝”4 枚。标本 M14:2−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2.2、穿径 0.6、郭宽 0.3 厘米。

二、双棺墓

9 座。编号为 M1 ～ M4、M7 ～ M8、M13 ～ M15。

M1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190°。墓口距地表深 1.50 米，墓底距墓口 1.20 米。墓圹长 3.25 米，宽 2.04 ～ 2.16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硬。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1.88 米，宽 0.62 ～ 0.70 米，残高 0.2 米；棺内骨架零乱，头南脚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西棺长 1.74 米，宽 0.60 ～ 0.70 米，残高 0.20 米；棺内骨架保存稍好，头南脚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图八）。

随葬品　骨簪 1 件、铜钱 3 枚。

骨簪　1 件。西棺出土。标本 M1:2，骨质坚硬，黄褐色。簪体扁平状，尾尖，簪上錾刻有三角纹和圆圈纹。通长 15.9、宽 0.1 ～ 1 厘米（照片六；图七，2）。

铜钱　3 枚。仅“乾隆通宝”一种。

“乾隆通宝”1 枚。西棺出土。标本 M1: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2、穿径 0.6、郭宽 0.13 厘米。

另外 2 枚磨损较甚，字迹不清。

M2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170°。墓口距地表深 1.50 米，墓底距墓口 0.80 米。墓圹长 2.56 ～ 2.68 米，宽 1.90 ～ 2.10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1.85 米，宽 0.58 ～ 0.65 米，残高 0.10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好，头南脚北，面向东，仰身直肢葬。西棺长 1.85 米，宽 0.60 ～ 0.65 米，残高 0.20 米；骨架保存较差，头南脚北，面向上，仰身曲肢葬。

随葬品　铜簪 1 件、银耳环 5 件、铜钱 7 枚。

铜簪　1 件。东棺出土。标本 M2:1，残，锈蚀严重。簪体扁平，略弧，通体素面。通长 6.4、宽 0.3 ～ 0.9 厘米（图七，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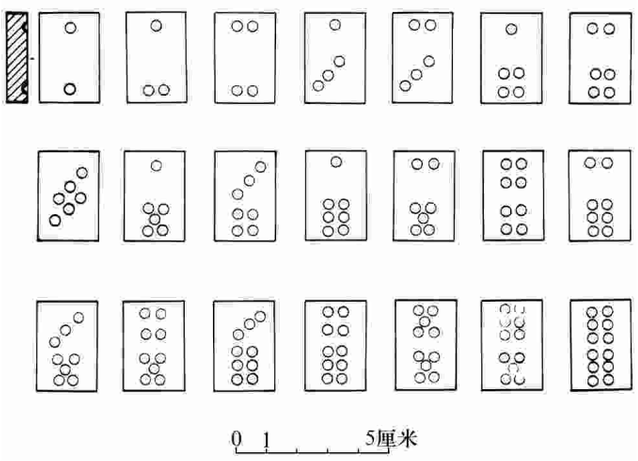
银耳环　5 件。东棺出土。标本 M2:2，5 件形制相同，圆柱体环形对接，素面。直径 1.7 厘米（图七，11）。

铜钱　7 枚。仅“乾隆通宝”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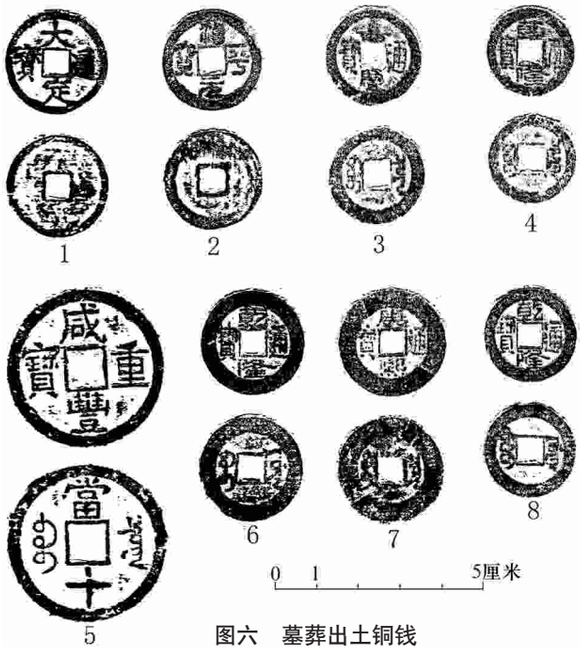
“乾隆通宝”1 枚。东棺出土。标本 M2:3，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2、穿径 0.6、郭宽 0.13 厘米。

另外 6 枚磨损较甚，字迹不清。

M3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195°。墓口距地表深 1.50 米，墓底距墓口 0.70 米。墓圹长 2.80 ～ 3.00 米，宽 1.80 ～ 1.90 米，深 0.70 米。内填花杂土，土质较硬。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1.95 米，宽 0.60 米；棺内骨架凌乱，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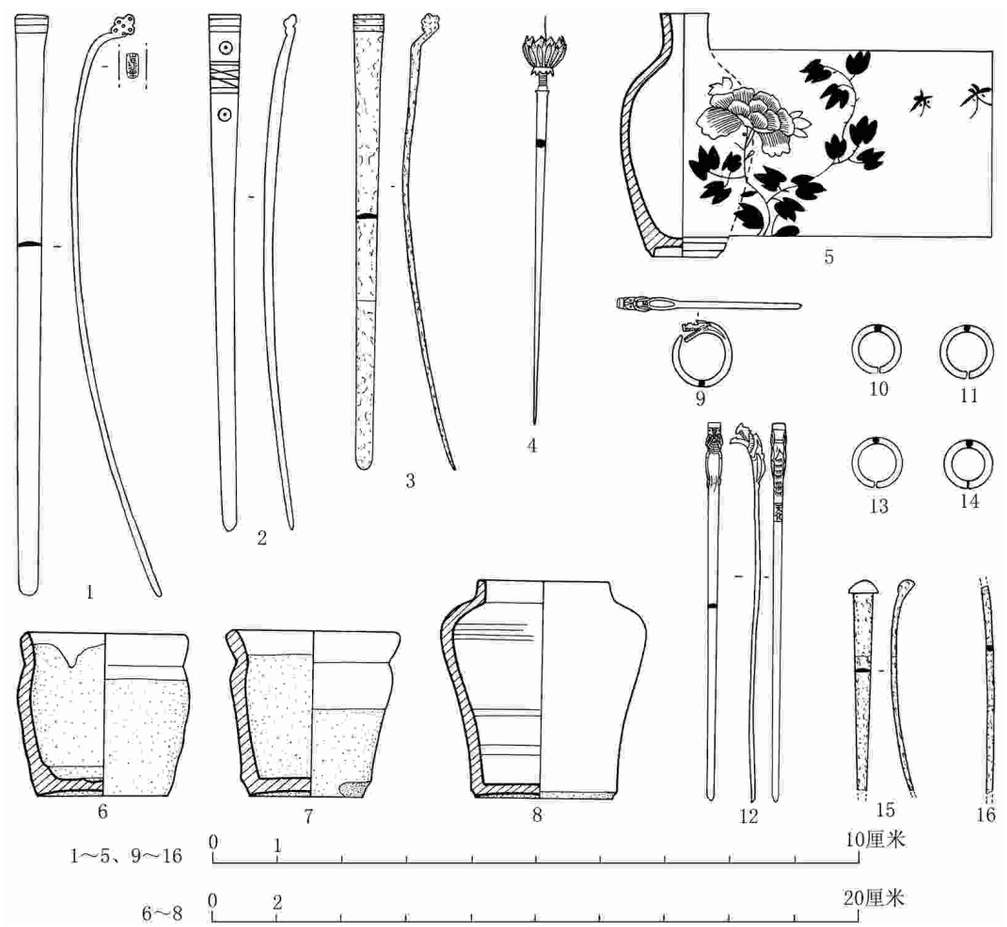


图五　骨牌（M12:6）



图六　墓葬出土铜钱

1～4、6（M8:3-1、M8:3-2、M8:5-2、M8:5-1、M8:3-3）
5、7、8（M12:7、M12:2-2、M12:2-1）



图七　墓葬出土器物

1、3.银扁方（M8:2、M5:2）　2.骨簪（M1:2）　4.银簪（M8:1）　5.鼻烟壶（M8:4）　6、7.陶罐（M14:1、M15:5）
8.青白釉瓷罐（M13:2）　9.银耳环（M8:3）　10、11.银耳环（M3:2、M2:2）
12.鎏金银簪（M15:2）　13.金耳环（M5:1）　14.鎏金耳环（M15:3）　15、16.铜簪（M2:1、M15:4）

存较差，头南脚北，面向不清，仰身直肢葬。西棺长 1.94 米，宽 0.58 ～ 0.64 米；棺内骨架凌乱，头南脚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两棺底部均铺垫有草木灰。

随葬品　银耳环 2 件、铜钱 1 枚。

银耳环　2 件。西棺出土。2 件形制相同，标本 M3∶2，银灰色，圆柱体环形对接，素面。直径 1.5 厘米（图七，10）。

铜钱　1 枚，为“康熙通宝”一种。

“康熙通宝”　1 枚。西棺出土。标本 M3∶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康熙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3、穿径 0.6、郭宽 0.12 厘米。

M4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180°。墓口距地表 1.50 米，墓底距墓口 1.10 米。墓圹南北长 2.95 米，宽 2.00 米～ 2.18 米，深 1.10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硬。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1.87 米，宽 0.60 ～ 0.64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好，头南脚北，面向西，仰身直肢葬，身下垫开条青砖一块，铺垫草木灰。西棺长 2.04 米，宽 0.48 ～ 0.50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好，头南脚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铺垫白灰。

随葬品　仅铜钱 2 枚。

“乾隆通宝”1 枚。西棺出土。标本 M4∶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2、穿径 0.6、郭宽 0.13 厘米。另一枚残碎锈蚀。

M7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345°。墓口距地表深 1.50 米，墓底距墓口 1.00 米。墓圹长 2.70 米，宽 1.70 ～ 1.90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硬。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1.95 米，宽 0.62 ～ 0.64 米，残高 0.20 米；西棺长 1.56 米，宽 0.46 ～ 0.60 米，残高 0.20 米。两棺内骨架皆保存较完整，头向北，面向上，葬式为仰身直肢。

随葬品　铜钱 3 枚。

“乾隆通宝”1 枚。东棺出土。标本 M7∶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2、穿径 0.6、郭宽 0.13 厘米。另两枚残碎锈蚀。

M8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175°。墓口距地表 1.50 米，墓底距墓口 0.80 米。墓圹长 2.50 ～ 2.60 米，宽 1.74 ～ 1.94 米。内填花土，土质湿粘。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1.94 米，宽 0.58 ～ 0.78 米，残高 0.20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好，头南脚北，面向西，仰身直肢葬。西棺长 1.80 米，宽 0.62 ～ 0.64 米，残棺存厚 0.03 ～ 0.08 米，残高 0.15 米；棺内骨架堆积在北部，较散乱，葬式不明。

随葬品　银簪 2 件、银耳环 2 件、鼻烟壶 1 件、铜钱 8 枚。

银簪　2 件。西棺出土。标本 M8∶1，银灰色，莲瓣形簪首，簪体细长锥体，尾尖。通长 12.6 厘米（图七，4）。

银扁方　标本 M8∶2，银灰色，扁首卷成梅花形，扁体扁平略弧。簪首内侧刻有二字，不辨。通体素面。通长 17.9、宽 0.2 ～ 1 厘米（照片七；图七，1）。

银耳环　2 件。西棺出土。2 件形制相同，标本 M8∶3，银灰色，圆柱体环形对接，环首为龙首形，尾端圆钝，衔于龙口。直径 2、宽 0.2 ～ 0.4 厘米（照片八；图七，9）。

鼻烟壶　1 件。东棺出土。标本 M8∶4，残，侈口，束径，折肩，腹微鼓，下腹弧收，平底。器身饰青花牡丹纹。高 7.5、底径 2、口径 1.5 厘米（照片九；图七，5）。

铜钱　11 枚。

乾隆通宝　5 枚。东棺出土。标本 M8∶5－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2.1、穿径 0.6、郭宽 0.2 厘米（图六，4）。标本 M8∶3－3，东棺出土，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2.5、穿径 0.6、郭宽 0.3 厘米（图六，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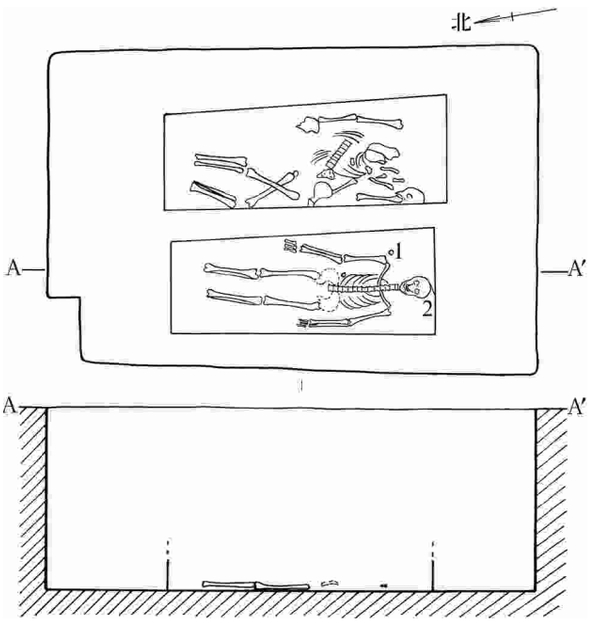
嘉庆通宝　1 枚。东棺出土。标本 M8∶5－2，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嘉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2.3、穿径 0.6、郭宽 0.2 厘米（图六，3）。

大定通宝　1 枚　标本 M8∶3－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大定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2.4、穿径 0.6、郭宽 0.1 厘米（图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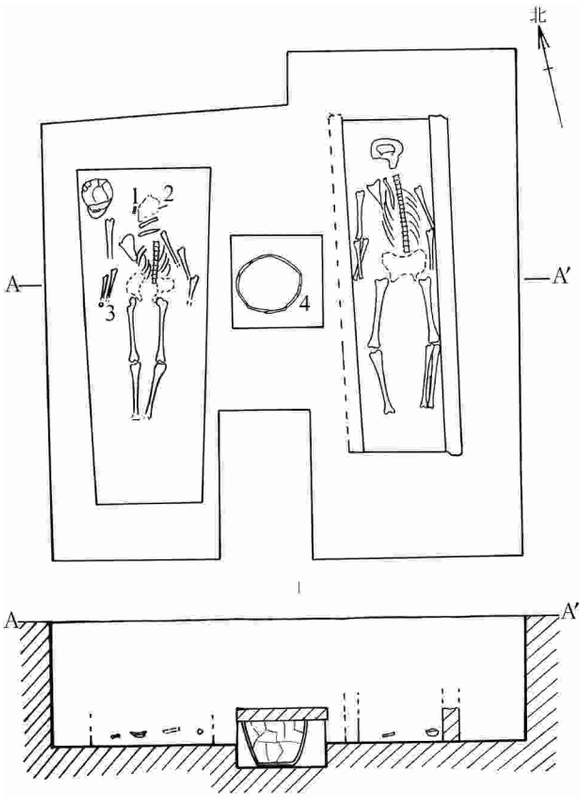
至平元宝　1 枚　标本 M8∶3－2，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至平元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2.4、穿径 0.6、郭宽 0.2 厘米（图六，2）。

另外 3 枚磨损较甚，字迹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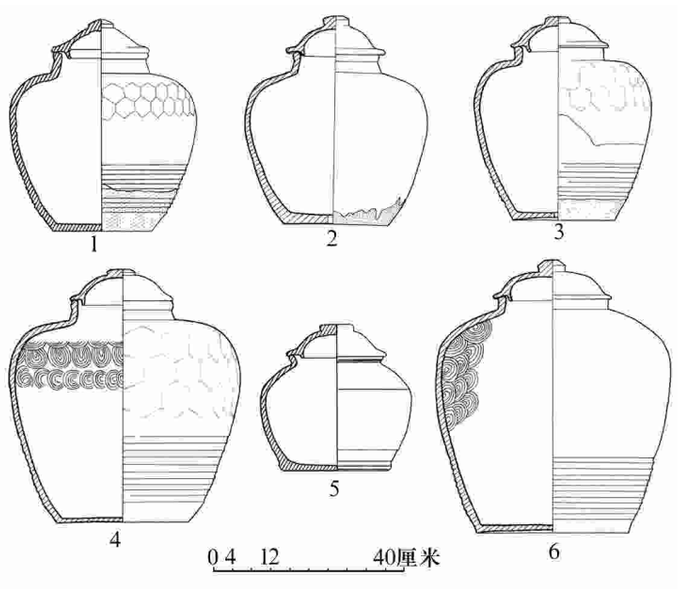
M13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355°。墓口距地表 1.50 米，墓底距墓口 0.90 米。墓圹长 2.60 米，宽 1.70 ～ 1.80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湿软。内置双棺。东棺长 1.70 米，宽 0.46 ～ 0.52 米，残高 0.30 米；西棺长 1.70 米，宽 0.50 ～ 0.58 米，残高 0.10 米。两棺内骨架较零乱，头北脚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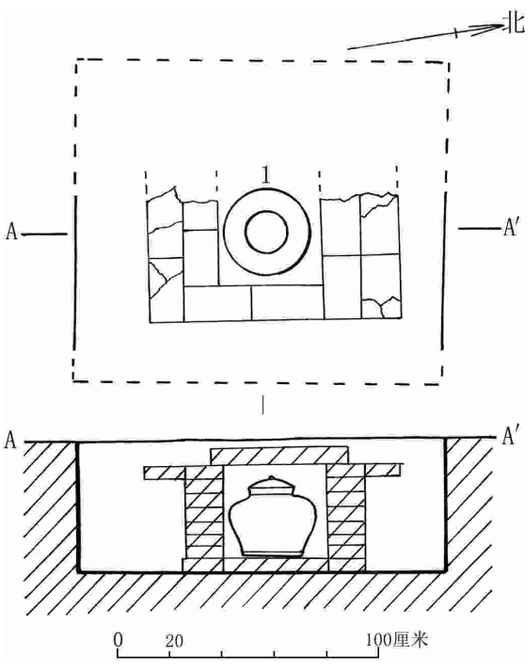
图八　M1平、剖面图
1.铜钱　2.骨簪



图九　M5平、剖面图
1.鎏金耳环　2.银扁方
3.铜钱　4.瓮棺



图十　墓葬出土器物
1～6.瓮罐（M5:4、M10:2、M10:1、M11:1、M16:1、M11:2）
1、2、5.酱釉瓮罐（M5:4、M10:2、M16:1）
3、4、6.（M10:1、M11:1、M11:2）



图十一　M16平、剖面图
1.酱釉罐

向西，葬式为仰身曲肢。

随葬品　青白釉瓷罐 1 件、铜钱 17 枚。

青白釉瓷罐　1 件。东棺出土。M13:2，轮制，方唇，直口，圆鼓肩，最大径在肩部，腹部缓收，细砂平底。器内外施青白色釉仅口部施酱釉，通体素面。口径 8、通高 13.4、底径 8.4 厘米（照片十；图七，8）。

铜钱　17 枚。东棺出土。M13:1，磨损较甚，字迹不清。

M15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打破 M16，方向 6°。墓口距地表 1.50 米，墓底距墓口 0.20 ～ 0.50 米，墓圹长 2.70 米，宽 1.80 米。内填花土，土质湿软。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2.10 米，宽 0.56 ～ 0.60 米，残高 0.30 ～ 0.50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西棺长 1.84 米，宽 0.50 ～ 0.70 米，残高 0.10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

随葬品　鎏金银簪 2 件、鎏金耳环 2 件、铜簪 1 件、陶罐 1 件。

鎏金银簪　2 件。东棺出土。M15:1，残，鎏金，局部脱落，龙首形簪首，簪体扁平略弧，尾残。簪体上錾刻有“天化”二字。通长 10.6 厘米。M15:2，形制与 M15:1 相同。通长 11.6 厘米（照片十一；图七，12）。

鎏金耳环　2 件。东棺出土。2 件形制相同。M15:3，鎏金，呈圆柱体环形对接，素面。直径 1.5 厘米（图七，14）。

铜簪　1 件（残）。M15:4，灰色，簪体细长为锥形，簪尾圆尖。残长 6.5 厘米（图七，16）。

陶罐　1 件。东棺出土。M15:5，轮制，泥质红褐陶，敞口，方圆唇，束颈，溜肩，直筒形腹，平底，略内凹。红褐色粗胎，器外施浅绿色半釉，外壁腹部以下无釉。通体素面。口径 10.2、底径 9、高 10.2 厘米（图七，7）。

三、三棺墓

1 座。编号为 M5。

M5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12°。墓口距地表 1.50 米，墓底距墓口 0.70 米，南北长 1.70 ～ 2.86 米，宽 2.68 ～ 2.70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内置三棺，二木棺一瓮棺。东棺长 1.87 米，宽 0.46 ～ 0.50 米，棺板厚 0.10 米，残高 0.19 米；棺内骨架保存稍差，葬式为仰身直肢。西棺长 1.88 米，宽 0.60 ～ 0.76 米，残高 0.05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葬式为仰身直肢。中棺为瓮棺，瓮棺（M5:4）上盖方砖，边长 0.52 米，厚 0.07 米；瓮棺已残，底径 20.8 米，口径 0.12 米，通高 0.50 米，最大腹径 0.43 米，内装灰色骨渣（图九）。

随葬品　金耳环 6 件、银扁方 1 件、铜钱 5 枚、酱釉瓷罐 1 件。

金耳环　6 件。西棺出土。6 件形制相同。M5:1，呈圆柱体环形对接，素面。直径 1.5 厘米（照片十二；图七，13）。

银扁方　1 件。西棺出土。标本 M5:2，残，银灰色，扁首卷成圆柱形，扁体扁平略弧。通体素面。通长 14、宽 0.5 ～ 0.9 厘米（图七，3）。

铜钱　5 枚。西棺出土 1 枚，东棺出土 4 枚。皆为“乾隆通宝”，形制大小近似。标本 M5:3，残，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钱径 2.2、穿径 0.6、郭宽 0.2 厘米。

酱釉瓮罐　1 件（带盖）。标本 M5:4，已复原，直口，方圆唇，短束颈，平折肩，弧腹，下腹渐收，平底，露黄褐色粗胎，通体施酱釉，外壁施釉不及底，肩腹部饰六棱形纹两周，下腹饰凹弦纹十周。圆帽形盖，盖沿平直，敛口，盖钮微凸，顶平，盖与瓮罐以子母口形式扣合。瓮罐口径 20、最大腹径 39.2、底径 20.8、高 37.6、通高 42.8 厘米（图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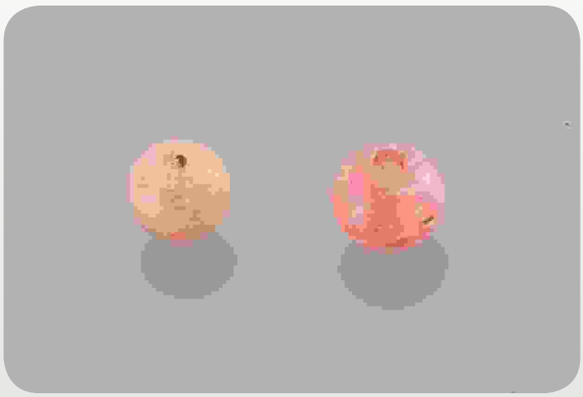
四、瓮棺墓

2 座。编号为 M10 ～ M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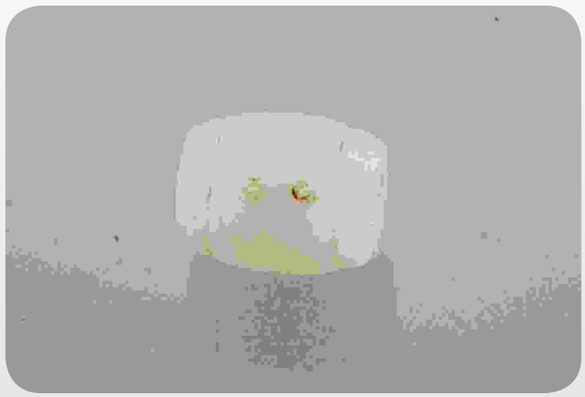
M16　竖穴砖室瓮棺墓，被 M15 打破，方向 280°。墓口距地表 0.04 米，墓底距地表 0.50 米，墓圹长约 1.42 米，宽约 1.22 米。砖室已残，底面平砖铺砌；周壁平砖顺砌而成，最顶层外侧加有顺砌砖边一排；顶部为大青砖封砌。残余砖室外长约 0.96 米，内长约 0.40 米，外高 0.48 米，内高 0.36 米。砖室内平置瓮棺，粗瓷带盖。内有青白色烧骨和四节木碳，木炭分别长 0.10、0.06、0.05、0.04 米，直径 0.04 米（图十一）。

出土酱釉瓮罐　1 件（带盖）。标本 M16：1，敞口，方圆唇，短束颈，鼓腹，下腹弧收，平底，露黄褐色粗胎。通体施酱釉，外壁施釉不及底，上腹饰一周凸弦纹。圆帽形盖，盖沿平直，敛口，盖钮微凸，顶平，盖与瓮罐以子母口形式扣合。瓮罐口径 23.6、最大腹径 31.6、底径 23.6、高 24.4、通高 30.8 厘米（图十，5）。

M10　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15°。墓口距地



照片一　玻璃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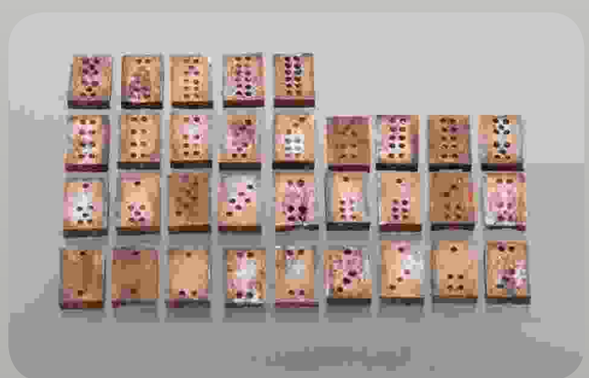
照片二　鼓形玉器



照片三　银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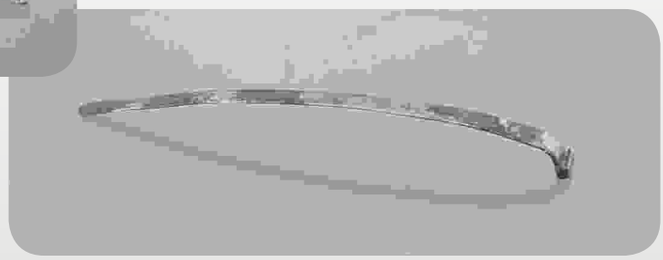
照片四　银指套



照片五　骨牌



照片六　骨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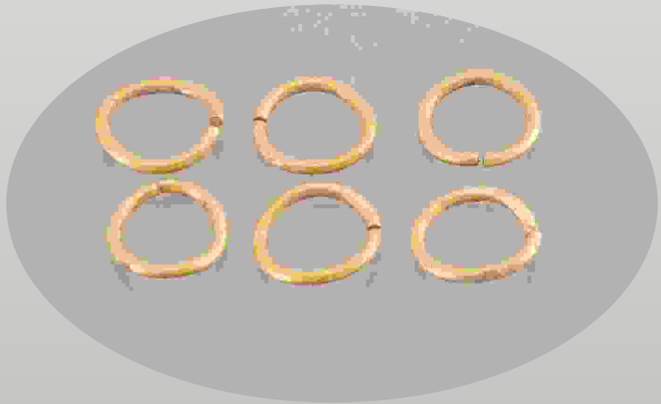
照片七　银扁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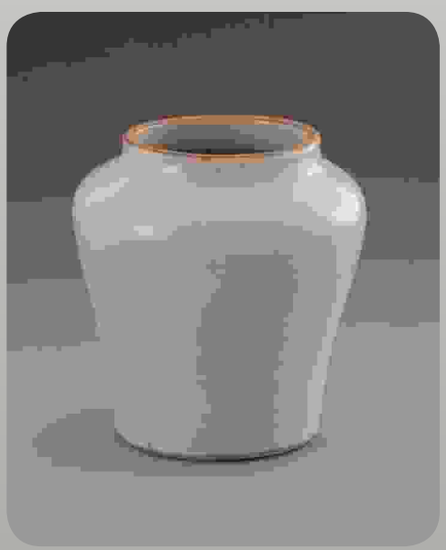
照片十一　鎏金银簪



照片八　银耳环



照片九　鼻烟壶



照片十二　金耳环



照片十　青白釉瓷罐

表 1.50 米，墓底距墓口 1.10 米，东西长 1.70 米，宽 1.65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在距墓口深 0.48 米处有一长方形坑，东西长 1.05 米，宽 0.54 米，深 0.52 米。坑口盖有方砖两块，东侧方砖边长 0.52 米，厚 0.07 米；西侧方砖边长 0.53 米，厚 0.08 米。两砖平面距墓口深 0.42 米。坑内放置有 2 个瓮棺，东西向。东侧方砖下盖一酱釉瓮棺，标本：M10∶2，已残碎，残口径 0.18 米，通高 0.44 米，底径 0.22 米，西侧方砖下盖一黑釉瓮棺，标本 M10∶1，口径 0.22 米，通高 0.42 米，底径 0.22 米。两瓮棺内装有白色烧骨。

出土瓮罐 2 件。西棺为黑釉瓮罐，东棺为酱釉瓮罐。均带盖。

黑釉瓮罐 1 件。标本 M10∶1，轮制。直口，短束颈，平折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露黄褐色粗胎。通体施黑釉，釉色莹润光亮。外腹施釉不及底，肩腹部饰六棱形纹两周，底饰凹弦纹九周。圆帽形盖，盖沿平直，敛口，盖钮微凸，顶平，盖与瓮罐以子母口形式扣合。瓮罐口径 22.4、最大腹径 41.6、底径 21.6、高 36.4、通高 42.4 厘米（图十，3）。

酱釉瓮罐 1 件。标本：M10∶2，已复原，直口外侈，短束颈，平折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露黄褐色粗胎。通体施酱釉，外壁施釉不及底，有滴釉现象。圆帽形盖，盖沿平直，敛口，盖钮微凸，顶平，盖与瓮罐以子母口形式扣合。瓮罐口径 18、最大腹径 38.4、底径 22.8、高 36、通高 44 厘米（图十，2）。

M11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70°。墓口距地表 1.50 米，墓底距墓口 1.10 米，东西长 1.80 米，宽 1.40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在距墓口深 0.54 米处有一长方形坑，南北长 1.02 米，宽 0.52 米，深 0.56 米。坑口盖有方砖两块，南侧方砖边长 0.52 米，厚 0.07 米；北侧方砖边长 0.50 米，厚 0.06 米。两砖平面与坑口齐平。坑内放置有 2 个瓷瓮棺，南北向。南侧瓮棺，标本 M11∶1，口径 0.21 米，通高 0.53 米，底径 0.28 米；北侧瓮棺，标本 M11∶2，口径 0.27 米，通高 0.57 米，底径 0.32 米。两瓮棺内均装有烧骨。

出土黑釉瓮罐 2 件（均带盖）。标本 M11∶1，南侧瓮罐。轮制。直口，短束颈，平折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露黄褐色粗胎。通体施黑釉，釉色莹润光亮。内腹饰圆涡纹两周半，外上腹饰六棱形纹三周，下腹饰凹弦纹十一周。圆帽形盖，盖沿平直，直口，盖钮微凸，顶平，盖与瓮罐以子母口形式扣合。瓮罐口径 21.2、最大腹径 48.8、底径 28、高 46.8、通高 52.8 厘米（图十，4）；标本 M11∶2，北侧瓮罐。轮制。直口，短束颈，丰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露黄褐色粗胎。通体施黑釉，釉色莹润光亮。内腹饰圆涡纹四周，外下腹近底处饰凹弦纹十二周。圆帽形盖，盖沿平直，敛口，盖钮微凸，呈荸荠状。盖与瓮罐以子母口形式扣合。瓮罐口径 27.2、最大腹径 49.2、底径 32、高 50、通高 57.6 厘米（图十，6）。

五、搬迁墓

2 座。编号为 M6、M9。

M6　梯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270°。墓口距地表 1.50 米，墓底距墓口 0.50 米，东西长 2.40 米，宽 1.20 米～1.34 米，深 1.10 米。内填花土，土质松软。该墓棺具及骨架早期搬迁。未发现随葬品。

M9　梯形竖穴土圹墓，方向 270°。墓口距地表 1.50 米，墓底距墓口 0.25 米，东西长 2.00 米，宽 1.30 米～1.40 米，深约 0.25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该墓棺具及骨架早期搬迁。未发现随葬品。

六、结　语

在这批墓中出土随葬品主要有玉饰、金饰、银饰、铜饰、骨器、瓷器、陶器等，具有一定的考古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M12 的墓主人随葬有骨九，这在北京地区的明清墓中十分少见，这可能代表了墓主人生前的一种嗜好。本次发掘清理清代墓葬 16 座，虽然数量较少，但是墓葬种类较为全面，有单棺墓、双棺墓、三棺墓、瓮棺墓和搬迁墓，其中瓮棺墓为火葬。这批墓葬均为小型墓，随葬品种类不丰富，规格等级较低，应为平民墓。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判断，年代应为清代中期。通过对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娘娘庙东侧清代墓葬的发掘，使我们对该地区清代墓葬的形状、结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该地区的古代丧葬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领队：郁金城
发掘：于　璞　朱志刚
拓片：古艳兵　刘晓贺
绘图：杨科民
摄影：韩宜林
执笔：于　璞　朱志刚



北京市区县地上文物的分布及其自然人文特点

——近、远郊区县部分

陈晓苏

谈到北京城市的地上文物资源，不能仅局限在城区和城厢地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古代北京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人口的增加，城区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北京周围的乡村、乡镇构成了城市社会的背景环境，是城市经济生活的补充，文化生活的外延，也是城市面貌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城市溯源最早也是由乡镇聚落逐步发展而来的，城市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北京城郊地上文物的分布和特点的梳理分析，也丰富了北京城市发展史的内容。本文以现在的北京区划为范围，从东到北、到西、再到南为顺序，检视和梳理一下北京 10 个区县的地上文物分布，并试图加以分析和思考……

1. 通州区

通州区位于北京市辖域的东南部，地处永定河、潮白河洪冲积平原，京杭大运河的北端。通州区的历史文化悠久，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有人类从事生产活动。西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建县，始称路县。东汉建武元年（25）县依潞水名，为潞县。东汉至隋，渔阳郡治三置潞县。辽太平年间（1021 ～ 1031）析潞县、泉州（今武清）地置漷阴县。金代天德三年（1151）在潞县设刺史州，以“漕运通济”之意，称通州。金元明清四朝都北京，官民所需，建筑用材以及漕粮，均仰赖东南水运，通州遂成为朝廷命脉之地。历代整治河道，增建国仓。自元代以来，在通州设置漕运衙署，元末编篱寨为城。明初始筑旧城，明清两代重兵屯田守卫。通州成为漕运、仓储和京东行政中心，因而有了“一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誉。

通州区位于北京通往东北、东南水陆交通的枢纽位置：陆路有秦朝的驰道、各代的官马驿路、高丽的“贡道”、清代东谒皇陵的御道；水路在秦汉时即为交通要冲，隋代修通连接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自金迄清，通州即为江南塞北客商物资交流的重要商埠。

通州区的这种区位特点和优势，使得文物特点就是围绕着运河文化而展开的。从古至今，交通沿线既是经济的通道，也必然是文化交流发展繁荣的走廊，陆路、海上的丝绸之路如此，京杭大运河同样如此。在这样的经济文化通道和走廊上的各个站点城市，就成为经济文化的聚散地，而通州正是位于大运河的北端，更何况其北边连接的是元明清三代的全国首都。通州其名也隐含着南通北往，四通八达之意。因为地名的语词意义，往往包含着该地方在命名时期的历史地理特征，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从下表反映的人文景观就可以看出，通州区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京段。由于京杭大运河承载着太丰富厚重的汉民族历史文化，所以国家正在为它申请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通州区的地上文物国家级的 1 项、北京市级的 6 项，涵盖了从隋唐到近代的历史时间跨度，围绕着大运河的市级文物就有 2 处，反映了通州在北京地理位置中所处的独特性，水陆交通枢纽的要津。建于辽代、重修于清代的燃灯佛舍利塔，高耸在通州北城的通惠河畔，千百年来，目睹了运河的繁盛和衰落；通运桥及张家湾镇城墙遗迹位于张家湾镇张湾村南口，是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经辽、金、元三代，成为京东重镇。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为了护卫漕运、拱卫京城，修筑张家湾镇城池。城依河而建，南临萧太后河。墙体为夯土外甃城砖，城墙周长约 3015 米。

在通州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还有大量的运河文物及遗址遗迹。如：潞河驿码头遗址、萧太后运粮河、通惠河通州段、漕运司署、同知漕运司事赵公去思碑、大运中仓、皇木厂遗址、通济桥遗址、石坝、下盐厂石权、广利桥和碑、司空分署等，它们既是大运河历史文化的载体，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又是通州文物特点的最好佐证。

通州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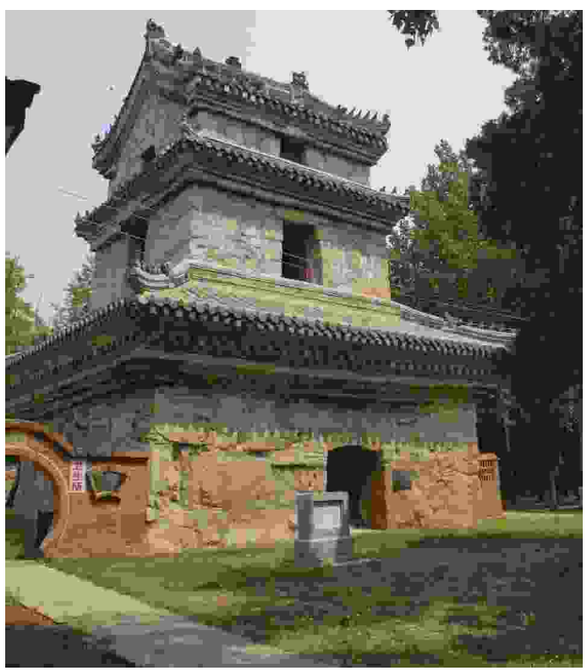
序号	名　称	年 代	级别	公布时间
1	京杭大运河	元	国家级	2006.6.1（六）
2–1	燃灯塔	辽	市级	1979.8.21（2）
3–2	李卓吾墓	明	市级	1984.5.24（3）
4–3	潞河中学原教学楼	清、民国	市级	1990.2.23（4）
5–4	通州清真寺	清	市级	1995（5）
6–5	通运桥及张家湾镇城墙遗迹	明	市级	1995（5）
7–6	富育女校教士楼、百友楼旧址	1904 年 1929 年	市级	2001（6）

2. 顺义区

顺义区位于北京城区的东北部，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端，属潮白河冲积扇下段。平原占全区面积的 95.7%，历史上就是农业区。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在木林镇、龙湾屯镇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石镰、石斧。汉高祖五年（前 202）始置狐奴、安乐两县，有狐奴县遗址、古城遗址。境内潮白河水纵贯南北，它的上游密云县和北部山区，谷深河窄，自牛栏山进入平原，河床落差加大，河谷开阔，自古就极易泛滥成灾，形成一个个水泊、湿地。这种平原的地形以及河湖港汊的纵横，是良好的农作物种植业发展环境。东汉的渔阳郡太守张堪第一个将水稻种植技术引入区内，使当地人民丰衣足食。史载张堪“于狐奴山下开稻田八千顷，劝民耕种，以至殷富”。后代为纪念他，建立了张堪庙进行供奉。位于潮白河西的临河汉墓群，出土了汉代的陶仓、陶臼、陶舂等稻米加工工具。1999 年春，在顺义田各庄村南的坡地上，发掘了 45 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罐、陶灶、陶仓、陶井、陶猪圈等农业生产生活用具，说明汉代顺义区的农业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

从下表我们可以了解，顺义区的地上文物存世不多，除了抗战时期的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外，就是两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元圣宫和无梁阁了。元圣宫位于牛栏山中学内，始建年代不详，现存碑文记载曾重修于明万历年间，遗存建筑为清式。整组庙宇格局为坐北朝南，四进院落。前立木质牌楼一座，后面是仪门、前殿、正殿、后殿、东西配殿的布局。前殿月台上有古柏两株，无声的诉说着寺院悠远的历史。后殿五间，黄琉璃瓦绿剪边，金龙和玺彩画，月台高大，东西各有耳房并东西配殿。整个建筑群布局严谨，彩画装饰古朴，规格等级较高。据县志记载，清康熙十七年（1678），果毅亲王允礼来此，曾赠庙中匾额一块，题对联一幅，现已不存。结合这些信息推测，该庙可能得到过皇室的封赐，在当地应是影响较大的寺院。

无梁阁位于顺义大孙各庄村东的长山脚下，



顺义无梁阁

是一座方形的楼阁式石砌建筑。顶调大脊，砖仿木檐，外观三层，内部实为两层。内部为无梁结构，顶及 1、2 层均为砖石拱券，结构独特，造型美观。顶及四壁绘有彩云、人物壁画，内容为皇帝的传说。阁后 30 米还有一座石质无梁殿，三间，门额从左至右依次为：女娲皇帝宫、玉皇圣母宫、西王祖母宫，内亦有壁画。从无梁阁的壁画和无梁殿的门额内容看，这应是一处道教殿宇。

总之，顺义区自古就是产粮的农业区，汉族文化传统与中原一脉相承，存留的地上文物遗存虽然不多，结合考古资料，仍然反映出该区的汉族农耕文化的特点。

顺义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级别	公布时间
1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	1943–1948 年	市级	1979.8.21（2）
2	元圣宫	清	市级	1995（5）
3	无梁阁	清	市级	2001（6）

3. 平谷区

平谷位于北京市的东北部，因东、南、北三面为燕山南麓余脉环绕，中间是平原谷地，故名。平谷为独立的山间盆地水文地质单元区，境域植被丰厚，是动植物理想的生活家园，所以在距今 1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平谷地区已有古人类活动，在马家坟、海子、洙水等地，有十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平谷的先民们已从事农业生产，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这时期留下的上宅文化遗址和北埝头遗址，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发展史的空白。商代遗址有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其出土的金、铜、玉器，是北京地区迄今出土年代最早的商代中期文物。铁刃铜钺的发现，将中国使用铁的时间提前了 1000 年，而夹砂黑陶盂则为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陶器。

平谷县建于西汉汉高帝十二年（前 195），属渔阳郡，今北城子村东汉城遗址，为霍光的封城——博路城（汉武帝遗诏封其为博路侯）。唐代在丫髻山建碧霞元君祠，是华北地区道教的圣地，与京西妙峰山齐名。明代在平谷辖区内修筑的镇罗营、北水峪、南水峪、熊儿寨长城，是北京北部长城的一部分。

平谷区的地上文物遗存反映的地域历史悠久绵远。既有距今 1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活动遗存，也有商代文物出土，还有自汉至清绵延不断的建制沿革，以及自商代经战国、汉唐、辽金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墓葬出土，都说明平谷区人类文明的悠长传承。现代抗战遗址，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记载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平谷人民为民族解放所做出的历史功绩。根据下表，归纳平谷区地上文物集中在三个点上，即：围绕着长城平谷段所展示的长城文物，是万里长城北京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上宅文化遗址，兼及区内的北埝头居住遗址、刘家河居住遗址等一批新石器时期、商周至战国的人类文化遗址，集中揭示了平谷区远古时期人类生产生活面貌；围绕丫髻山碧霞元君祠及其石刻文物，反映了清代平谷区人民的宗教文化生活。这些重点构成了平谷区文物特点，我们透过其特点就可以基本把握该区文物的全貌。

平谷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级别	公布时间
1	万里长城北京段 · 平谷②	明	市级	1984.5.24（3）
2	上宅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	市级	2001（6）
3	丫髻山碧霞元君祠遗址	清	市级	2001（6）
4	鱼子山抗战遗址	1938 年	市级	2001（6）

4. 怀柔区

怀柔区为北京市郊区县之一，地处市区东北部，是北京湾由平原向山地过渡的阶梯地带。自然环境为多山和半山区，山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 88.7%。连绵起伏的群山是北京天然的绿色屏障。而且河泉众多，有属于潮白河、北运河两个水系的 4 级以上河流 17 条，涌量稳定的山泉 260 多处，与京郊其它水系一起形成北京湾广袤无垠的洪积冲积扇平原。

怀柔区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甚多。1949 年以后出土的古犀牛牙和大象门牙化石，说明远古时代的怀柔，栖息着适于在茂密森林和河流地带生活的古代巨型动物。优良的自然条件也使怀柔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期有同房山周口店山顶洞人同期的古人类遗存：帽山、西府营等地出土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为证；有宝山寺乡转年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是与东胡林人同期的古人类遗存；有与雪山文化大体同期的碾子乡四道河、黄花城乡杏树台出土的新石器遗物等等，新石器遗址遍及全区，这些都说明人类文明的曙光曾照耀在怀柔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由于怀柔地处北京的北部山区，所以屏障北京的长城怀柔段，是怀柔文物的一大特色。它蜿

蜒在燕山山脉的峰峦之间，西起与延庆交界的旺泉沟山顶，东至与密云接壤的半截边，依山就势，以险制胜。途经黄花城、沙峪等 6 个乡镇，22 个行政村，全长 61549 米，有空心敌台 215 座，实心敌台 59 座，墙台 7 座。另外，境内长城的关隘均建有城堡，共 20 座。怀柔长城的建筑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北齐天保六年(555)，现存的为明代长城，因位于明十三陵的北方，故明廷对这段长城的修筑十分重视。曾在明隆庆三年（1569）派著名将领戚继光督修慕田峪长城、黄花城长城和“北京结”长城等，它是北京段长城中最有特色、敌台林立的坚固防线。

怀柔县庙宇很多，过去民间流传“山山有道，村村有庙”。但至今保存完好，并享誉北京的是红螺寺。它始建于盛唐，是京北著名的古刹。寺院占地百余亩，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的 5 个院落有：中路的天王殿、大雄宝殿、禅堂，以及东西配殿、诵经房；西路的方丈室、十方堂，再西的塔院；东路为贵宾客厅、厨房，还有延寿堂、老僧退居所。它三面环山，古树、泉水构成优美的环境。历代皇室多有拨款修葺，清康熙帝也曾到寺拜佛。

所以，怀柔区的重点文物可以概括为“一（长）城一庙”，以及围绕着长城和寺庙的附属文物。

怀柔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级别	公布时间
1	万里长城北京段 · 怀柔	明	市级	1984.5.24(3)
2	红螺寺	金元明清	市级	1990.2.23(4)

5. 密云县

密云县位于北京市城区的东北部，山区面积占全县的 79.5%，三面环山，森林茂密，溪潭众多，自然生态良好。据燕落寨雪山二期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考证，早在 6000 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已聚居形成村落。人类活动范围广布密云县北部的车道峪、董各庄，西部的石城、王庄子，西南部的燕落寨，东部的转山会、陡岭子、上峪村，东南部的东邵渠村等地。幽陵为密云最古老的名称，传说舜流共工于幽陵，所居之处“共工城”即位于现密云县燕落村南。西周至春秋战国为燕地，秦汉置渔阳郡、渔阳县，东魏始有密云之名，后几经并废。清代至民国，单一县的建制延续到今天。

密云地上文物主要分为长城等军事防御设施遗址、古城遗址以及古建筑等其他类文物。

密云由于地处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山谷沟壑，成为中原地区通往内蒙和东北的交通要道，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所以自古中原政权就在这里修筑军事防御工事，明长城密云段全长 207 千米，是北京境内明长城所在区县最长的，占总长度的 1/3。密云段长城拥有城台 568 座，其中保存较好的有 195 座，建有古北口、墙子路、白马关、鹿皮关等重要关隘 61 处。因此，密云的地上文物也是以长城文物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著名的遗址有万里长城的密云段，其中的司马台段、古北口长城、杨令公庙、戚继光镇边功绩碑（十面碑）、石塘路营城遗址、遥桥峪古堡、金山岭长城、曹家路营城遗址等，都是密云独特的长城文化遗产。

古城址包括燕落古城址、石匣城垣遗址（现被密云水库淹没）、密云城、古北口镇城垣遗址等。其他地上文物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番字牌石刻、文庙大成殿等。总结密云县的文物资源特点，突出的就是军事防御设施占密云地上文物的重要位置，这也是与密云所处的南北交通走廊的地理位置和屏蔽拱卫元明清首都城市的地形特点密不可分的。

密云县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序号	名　称	年代	级别	公布时间
1	长城 · 司马台段	明	国家级	2001.6.25(五)
2–1	万里长城北京段 · 密云	明	市级	1984.5.24（3）
3–2	番字牌石刻	元	市级	1990.2.23（4）
4–3	白乙化烈士陵园	1984	市级	1995（5）
5–4	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墓	民国	市级	1995（5）
6–5	白龙潭 龙泉寺	清 民国	市级	1995（5）

6. 昌平区

昌平区位于北京市城区的西北部，是北京市的郊区县之一。昌平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处于温榆河冲积平原和燕山、太行山支脉的结合地带，山区、半山区占全区总面积的 2/3，是北京的北大门，素有“京师之枕”之誉，是北京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

昌平区很早就有人类居住，1958 年的考古发掘材料证实，在今南口镇雪山村就有 6000 多年前人类聚居的文化遗存；后来在南邵乡张营村发现夏、商时期的居住房址，出土了生产生活用的铜器和大量陶片。正式的建制始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区内设昌平、军都二县。三国、西晋、南北朝时属幽州的燕国、燕郡。隋唐五代、辽宋金，归属几经变化。元属大都路总管府，明洪武属北平府、永乐属顺天府至清。昌平县的行政区划自

明代始见于文字记载，县域村庄在元代见于记载。

昌平区的文物特点围绕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总结有三：首先是扼守交通要道的长城，军事防御系统的文物遗存。有国保级的居庸关、云台，春秋战国时称居庸塞，在《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就有记载，说“山有九塞”，居庸为其一，可见其历史久远。除了关城要塞之外，万里长城昌平段全长也有2566.7米，共有14座敌楼、1座墙台和14段城墙。其中有1座敌楼，海拔1439米，是昌平的最高点，也是昌平区与河北怀来的分界处。另外，由于长城的修筑、屯守，在长城沿线和关隘，还修筑和形成了一些兼有军事防卫、军屯性质的关城遗址，如：南口古城、上关城、白羊城、长峪城以及燕长城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拱卫京师和皇陵的屏障。

其次，是明代的皇家陵寝区，与居庸关长城齐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十三陵，以及围绕着明陵的文化遗存。明十三陵驰名中外，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总面积80平方公里，其中陵区面积40平方公里，埋葬了明代13个皇帝、23个皇后、1个贵妃。另外，与明皇陵有关的两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朝宗桥和巩华城，都位于城区通往陵区的路上，即出德胜门北行必经的沙河镇附近。朝宗桥又名沙河北大桥，横跨北沙河，辽金时就建有木桥，明正统十三年（1448）拆木桥建石桥。桥边立有明万历四年（1576）的汉白玉石碑1座。它是明代帝后、大臣谒陵北巡的必经之路，也是京北的交通要道。巩华城也位于沙河镇，始建于永乐十九年（1421）。城以行宫为中心，东西南北各一门，是皇帝巡猎和谒陵的停留之所。

第三，银山延寿寺僧人墓塔群，简称银山塔林。



昌平和平寺

山因冬季积雪得名银山，又因山崖色黑如铁，形如铁壁，合称“铁壁银山”，明清时为“燕平八景”之一。银山寺院始建于唐代，辽金元明清历代相沿，不断增修、改建。至解放初，寺院不存，唯有墓塔、碑刻等文物留存，与铁壁银山相伴，形成一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画卷，以及弥漫在画卷之内的信仰的坚守。

昌平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级别	公布时间
1	居庸关、云台	元	国家级	1961.3.4（一）
2	十三陵	明	国家级	1961.3.4（一）
3	银山塔林	金至元	国家级	1988.1.13(三)
4–1	朝宗桥	明	市级	1984.5.24（3）
5–2	白浮泉遗址——九龙池、都龙王庙	元	市级	1990.2.23（4）
6–3	巩华城	明	市级	1995（5）
7–4	和平寺	清	市级	1995（5）

7. 延庆县

延庆县位于北京市的西北部，是首都北京的北大门。其北、东、南三面环山，中间为延怀盆地的一部分，呈口袋状向西南开口。延庆的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72.8%，群山连绵，高峰竞举，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80余座。山间河谷众多，植被丰茂。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位于千家店镇辛栅子村东北山中和花盆乡四道洼一带的木化石群，粗者直径达到2.7米，长4～5米，可见那里的植被繁茂。全县四级以上的河流18条，位于潮白河、永定河及北运河3条水系的上游。

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得延庆地区人类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大约在五、六万年前的旧石器中晚期，就有原始人类在延庆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此后，炎黄战于阪泉之野，山戎族驰骋于燕北群山。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地属燕国。秦、汉、唐等朝代分别在延庆地区设上谷郡、夷舆县和儒州；后晋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于契丹，此地遂归辽；辽设儒州缙山县属南京道。金代改儒州为缙山县。元代因仁宗诞生于缙山县香水园，故升缙山县为龙庆州；明初为隆庆州，屯兵民修长城捍卫京畿，隆庆元年（1567）为避穆宗年号讳，改为延庆州；民国改称延庆县至今。

延庆县有世界著名的人类文化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万里长城八达

岭。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燕国就在八达岭一带构筑城墙防御工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各诸侯国原有长城为基础，连接建成了雄伟的万里长城。现今的八达岭长城是明代在秦长城的基础上修缮和改扩建而成的。延庆县南与昌平毗邻，它拥有的国家级文物长城与昌平段长城在古代属于一个纵深防御体系，所以延庆境内的长城以及附属于长城的文物，也构成了延庆文物的突出特点。除了八达岭长城城墙之外，还有长城文物：关城、敌楼和铺舍敌楼（92 座）、烽火台（白河堡烽火台、香营烽火台、康庄烽火台、西王化营烽火台）、碑刻（明隆庆年的修筑长城题名碑 4 块，以及其它长城分修碑）、石刻、古炮等，以及长城砖窑、石灰窑、采石场遗址。并且，沿长城历代由军屯、卫所、军城发展起来的村镇，在延庆很多，著名的有岔道城、永宁城，还有四海城、营城遗址、靖安堡城遗址、周四沟城、双营城、马营土城等等。

延庆县山戎墓葬群是又一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文物，是春秋战国之际北方民族的文化遗存。在延庆玉皇庙、古城村、葫芦沟发掘墓葬 500 余座，出土各类富有特色的地域民族文物 8000 余件。这些遗迹和遗物，不仅揭示了我国青铜时代北方民族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面貌，而且还生动反映了山戎土著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燕地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历史画面。

综上所述，延庆县的文物特点是基于其所处区位优势，不论是长城还是长城外山戎墓葬，都是延庆地处的扼守西北进京通道和长城关外的地理环境——自然屏障和人为阻隔的结果。使得延庆成为北方民族南下入京，进而攻略中原的前哨和落脚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崖居，是唐代的一处北方民族的居住生活遗址，它凿山为穴的建筑方式，反映了游牧民族生活习俗，同时也印证了延庆自古以来民族杂处的历史环境，在文化遗存上的多民族面貌，这是否可以成为立足于延庆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遗存的特点。

延庆县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级别	公布时间
1	万里长城、八达岭	明	国家级	1961.3.4（一）
2–1	詹天佑铜像及墓	1919	市级	1984.5.24（3）
3–2	古崖居遗址	唐	市级	1990.2.23（4）
4–3	玉皇庙山戎墓遗址	春秋	市级	1995（5）
5–4	岔道城遗址	明	市级	2001（6）
6–5	永宁天主教堂	1902	市级	2001（6）
7–6	木化石群	侏罗纪晚期	市级	2001（6）

8. 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市西南，面积 1455 平方公里，全区以山地为主，占全区面积的 98．5%，属太行山余脉，永定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境内的清水河、清水涧河等为永定河支流，平行分布在山脉之间，从而形成了门头沟、大台沟、斋堂川三个较大沟谷，也是早期人类的繁育生息的地方。

门头沟区历史悠久，在王平村、西胡林、齐家庄等处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石器制品，以及在军响乡桑峪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股骨化石，表明早在 11 万年以前，人类已经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北京史上著名的“东胡林人”墓葬也发现在区内；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长城遗迹在区内也有发现；汉代，门头沟地区属于蓟县；唐末至辽代的 200 年间属玉河县；金代以后至明清，其辖境全部或大部归入宛平县。

悠久的人类繁衍生息历史，绵延不断的文化传承，独特的山地地理条件，使门头沟的文物数量多、品位高、种类全，呈现多样性，是北京市的文物大区。境内有北京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寺庙——潭柘寺，以及国家级的文保单位——戒台寺；有北京仅存的元代木结构建筑——灵严寺大殿、双林寺配殿；尤其是具有鲜明区域地方特色的窑神庙、铁锚寺等煤业文物和著名的龙泉务辽金瓷窑遗址，以及原始风貌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村落——爨底下，为区内众多文化遗存的“点睛之笔”。民俗学发祥地妙峰山及沿山的寺庙、碑刻等，为我们留下了清末民国时期，民间信仰和民俗生活的具像资料。革命遗址有抗战时期的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同时成立的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军政委员会，是八年抗战中敌后抗日的坚强堡垒。

门头沟区也是北京 6 个拥有明长城遗迹的区县之一，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沿河城与敌台是坐落在永定河畔扼守北京西大门的山口、水口而建立的，隶属于明长城内长城三关之一的紫荆关，是塞外通过北京的要塞之一。《沿河城守备府碑》载：“沿河口守备设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沿河以山为城，以河为池，乃京师咽喉之地。”境内长城蜿蜒约 40 公里，共有空心敌台 15 座，实心敌台 2 座，烽火台 6 座，形成坚固的京西防线。

总结门头沟区的文物特点，一是文化遗存数量众多、涵盖的时间跨度长。有遗址类、古建筑类、墓葬类、石刻类、摩崖类、古村落类、近现

代文物类等，计 7 类，380 项，几乎包含了大部分的文化遗存的类别；时间从远古绵延至今。二是地域特色鲜明，像开采千年的门头沟煤业，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煤业文物，有窑神庙和窑神、煤厂、煤矿、碑刻、契约文书等，是今天我们研究地域史志、行业兴衰的宝贵资料。横贯区内的永定河和历史上的“京西古道”，使相对封闭的多山的门头沟，在民俗文物中表现出灵动而丰富的多样性，乡间众多的龙王庙建筑以及“京西古道”上的古村落、客栈，就是民间信仰和商旅文化的固化形式。这些是门头沟区有别于其它区县的特色之所在。

门头沟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级别	公布时间
1	戒台寺	辽至清	国家级	1996.11.20（四）
2	潭柘寺	清	国家级	2001.6.25（五）
3	爨底下村古建筑群	清	国家级	2006.6.1（六）
4–1	沿河城与敌台	明	市级	1984.5.24（3）
5–2	万里长城北京段 · 门头沟	明	市级	1984.5.24（3）
6–3	三官阁过街楼	清	市级	1990.2.23（4）
7–4	宛平县人民抗日战争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	1946年	市级	1995（5）
8–5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	1939	市级	1995（5）
9–6	灵严寺大殿	元	市级	1995（5）
10–7	天利煤厂旧址	清	市级	2001（6）
11–8	双林寺	元、明	市级	2001（6）
12–9	灵岳寺	清	市级	2003（7）
13–10	白瀑寺	金	市级	2003（7）

9. 房山区

房山区位于北京市的西南，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交界地带。全区总面积 2019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占 1/3。

房山区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是首都北京的文物大区之一。全区登记在册的文物 302 项，列入区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 68 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1 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6 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48 项，是十个郊区县中国保、市保单位数量最多的。最早的有 50 万年前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房山的山水环境十分适合古代人类的生存发展，适宜的温度，充沛的水源，繁茂的植被，多样的动植物成为人类起源的理想温床，也繁育了最早的人类文明。接着是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夏商、西周的镇江营遗址，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战国至汉代的蔡庄土城遗址，汉代的窦店土城遗址、长沟土城遗址、广阳城遗址等，反映了房山区从人类的起源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绵延不断的文化传承。其中的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展示了 3000 多年前北京灿烂的城市文明。隋唐以后，佛教文化在此广布，1300 多年前开始镌刻、被誉为“国之瑰宝、石经长城”的云居寺石经，历隋唐以至辽金，共留存 14278 块大藏经石经版，举世无双。还有堪称北京唐代浮雕艺术珍品的巨幅汉白玉雕——“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以宏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丰富的画面，烘托出佛教世界的神圣、欢愉的气氛。有着 1400 多年佛教文化历史的上方山诸寺及云水洞，更是寺塔棋布，繁盛时的明代有 120 座禅院，清代史称 72 禅院，俨然一派佛国世界。金代皇家陵寝的残碑碎石、玉雕栏杆，无声地诉说着大金国曾经的辉煌。十字寺的景教寺院，更说明了区内宽松的宗教氛围。元明清三代遗存的地上文物，也是各具深厚的文化价值。总之，房山区地上文物在 10 个区县中，不仅数量、级别排列第一，而且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琉璃河燕都遗址、云居寺石经、金陵等在北京的地上文物中都是出类拔萃，可以说是处处珠玑。反映出房山区在北京辽金及以前城市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北京古代城市文化的重点区域。

房山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级别	公布时间
1	云居寺塔及石经	隋唐辽金	国家级	1961.3.4（一）
2	周口店遗址	旧石器时代	国家级	1961.3.4（一）
3	琉璃河遗址	西周	国家级	1988.1.13(三)
4	万佛堂、孔水洞石刻及塔	隋唐至明	国家级	2001.6.25(五)
5	十字寺	元	国家级	2006.6.1（六）
6	金陵	金	国家级	2006.6.1(六)
7–1	窦店土城	战国至西汉	市级	1979.8.21（2）
8–2	良乡塔	辽	市级	1979.8.21(2)
9–3	琉璃河大桥	明	市级	1984.5.24（3）
10–4	白水寺石佛	元、明	市级	1984.5.24
11–5	姚广孝墓塔	明	市级	1984.5.24
12–6	上方山诸寺及云水洞	隋唐	市级	1984.5.24
13–7	应公长老寿塔	元	市级	1995(5)
14–8	周吉祥塔	明	市级	1995(5)
15–9	照塔	辽	市级	1995(5)
16–10	玉皇塔	辽	市级	1995(5)
17–11	郊劳台	清	市级	1995(5)
18–12	蔡庄土城遗址	战国	市级	2001(6)
19–13	伊桑阿墓石刻	清	市级	2001(6)
20–14	铁瓦寺	明	市级	2001(6)
21–15	岫云观	明	市级	2003(7)

10. 大兴区

大兴区位于北京南郊，全境属永定河洪积——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大兴区最早为先秦的蓟县，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份之一。蓟县治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为燕国之国都。秦始皇二十三年（前 224 年），秦灭燕，置广阳郡，蓟县属之，郡、县同治蓟城。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蓟县一直相延不废，蓟城先后为魏晋之幽州燕国、北朝之幽州燕郡、隋之涿郡、唐之幽州范阳郡等州郡治所，逐步发展成为华北平原北端的一处重要地方行政中心。唐建中二年（781），析蓟县西置幽都县，与蓟县分理蓟城。辽升蓟城为陪都，号南京，蓟县改名蓟北县，后又改名析津县。金迁都燕京，改称中都。金贞元二年（1154），析津县改名大兴县，自此大兴成为都城的附郭和举足轻重的京县。1928 年北京改为北平，大兴划归河北省，30 年后的 1958 年，大兴县又由河北划回北京市至今。

大兴区是北京的南大门，素有“京南门户”之称。明清时即有从京城通往南方的陆路驿道、御道，县城黄村在明清时就是古驿道上的驿站。明清帝王多次出正阳门、永定门经此南巡，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清南苑御道和南巡御道。在明清驿道、御道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官马大道，并形成古城镇村落。区境有汉代阎城遗址、唐回城遗址、广阳城遗址和辽金村落遗址等。古官署遗址有明蕃育署遗址、清南路厅衙署遗址。古寺庙遗址有双塔寺遗址、寿峰寺遗址、灵言寺遗址、旧宫关帝庙遗址、石佛寺遗址、黄村火神庙遗址、德寿寺遗址、宁佑庙遗址、永定河河神祠，以及古清真寺包括礼贤清真寺、东白塔清真寺、西红门清真寺、薛营清真寺等。

区内的南海子地区元明清时期为皇家园囿，是皇帝临憩、行围、大阅的重要场所，其南部的晾鹰台建于元代。德寿寺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也在行宫南，顺治、乾隆帝曾分别在此接见西藏的五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有碑文记其事。清末成为京师驻军重地。

大兴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5 处。由于大兴历史上处于京城的南郊，又处于永定河的下游，境内尚有凤河、新凤河、龙河、天堂河、凉水河等 10 余条河流，河湖港岔纵横，自然天成的景色，自元代就成为帝王郊游行猎的理想场所，明清帝王南出永定门，面对野趣横生的郊外景色，修建了郊游驻跸的处所，团河行宫就是这种历史沿袭的遗迹。至今仍留下一些地名，像大红门、小红门、西红门镇、旧宫、鹿圈乡、庑殿村、鹅房村、狼垡村、南大红门村、南宫、东红门村、饮鹿池桥等等，似乎就是当年团河行宫历史遗迹的反映。

总之，大兴区留存至今的地上文物虽然不多，但其特点鲜明，郊野风光的自然宜人与宫廷环境的巨大反差，使帝王贵戚把闲暇娱乐的场所建在这里，从而遗存下这片宫廷行宫，成为了该区地上文物的突出特色和中心内容。

大兴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③]

序号	名　称	年 代	级　别	公布时间
1	团河行宫遗址	清	市级	2001（6）
2	无碍禅师塔	金	市级	2003（7）

结　语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古代人类是在有限的、区域性不同的舞台上，适应环境进行生产和生活，进而创造发展人类文明。在古代社会，不同区域的、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的社会环境或称人文环境，比如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恒河之于印度，长江黄河之于古代中国等等。在不同背景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特征，其差异无疑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北京由于地处华北平原北部与东北平原、蒙古草原的交界处，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像臂膀一样从西面、北面和东北面，把北京小平原围合起来，东面是渤海湾，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古代北京既相对独立，又受到周围文化圈的影响，呈现着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这种多元性、多样性源于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源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碰撞、融合。

1. 自然环境与人类早期文明

总结北京城郊区县的自然人文特点，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沿山区和平原区，（即单一农业区和复合农业区）：

首先，北京城郊的十个区县位于都城周边，即“北京湾”的边沿，沿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的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这 7 个区县，位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的半环形山地间，是山地向“北京小平原”的过渡带，我

称其为“沿山区”，故在地形地貌以及动植物分布上，都有着与城八区以及大兴、通州、顺义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特点，从而留下了不同的人类活动印迹及文化遗存。例如：迄今为止发现的北京人类的发祥地——周口店北京猿人，和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夏商、西周的镇江营遗址，是在房山区；在门头沟区的前桑峪村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还有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北京史上著名的“东胡林人”墓葬；在昌平区有6000年前人类活动的雪山遗址；在怀柔区有与房山周口店山顶洞人同期的古人类遗存：帽山、西府营等地出土的旧石器时代遗物，有宝山寺乡转年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是与东胡林人同期的古人类遗存；有密云的燕落寨遗址、平谷的上宅遗址及北埝头遗址等等，这些重要的文化遗址都证明了最早的山地环境，森林、溪水、丰富的动植物，提供了人类最初的基本生存条件，孕育了北京古人类的生长繁衍，是北京先民生产生息的摇篮。

其次，3个平原区的大兴、通州、顺义，是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大清河、蓟运河5大水系，自西北向东南流注，冲刷出的北京小平原的东、南部，是华北大平原的东北部，暖温带的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宜的降水和利于作物生长的平原沃土，使得这里很早就是发达的农耕区。在顺义的木林镇、龙湾屯镇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石镰、石斧，汉代的水稻种植已很普遍。单一的农耕经济产生的农业文明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

2．地理环境与北京民俗文物的关系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道出了环境与人类物质生产、文化生活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功能及内在的因果关系。人以自然环境为生存条件，以自然资源为依托进行文明的创造，促进文化的演进；环境通过文化创造满足人的欲求，影响文化形貌和文化性格的形成，使不同民族的心态具有不同的民俗文化特征。④还有一句俗语“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都说明了民俗的地域差异。正是由于城郊10个区县所处的不同的地理单元环境，直接导致了各区域人们对环境的不同生存适应和文化适应，产生了多种多样独特的民俗文化，呈现了城郊乡村的民风民俗文物。门头沟爨底下村的居住民俗、天利煤场的煤业文物、民俗学发祥地妙峰山及沿山的寺庙、碑刻、通州区的运河文化等等，无不留下深刻的地理环境烙印。

3．区县环绕都城的区位形势、资源优势与功能性服务与地上文物的分布

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城郊区县，作为封建王朝都城的外围环境，在功能上，是集合了首都城市的补充、供给、服务、拱卫等多项功能。比如在昌平的明陵以及沿线的朝宗桥、巩华城，承载着明代皇家的祭祀服务功能；门头沟的煤矿几百年来为首都人们提供生产生活能源；通州的大运河码头，更是皇朝不可或缺的物资供给线；沿山的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境内长城，以及附属的关城、敌楼和铺舍敌楼、烽火台、碑刻、石刻、古炮等文物，是军事上拱卫北京的物质文化遗存；大兴的郊野风光则是宫禁中王公贵族最好的休闲场所，团河行宫就是这样建起的。因为北京周边不同的资源、环境、区位特点，从多种方面满足城市生活的需要，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具有区域特点的文化遗产。

总之，北京湾的区域环境，沿山区和平原区的分布、格局，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枢纽位置，形成了北京的基本地理环境，由此决定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和人类对其利用的基础。北京的地上文物分布，就是人类利用自然、发展文明留下的具像的证明，归根结底反映了人类在地球上创造的文明历史。

---

①统计列表说明：截止日期为2007年底；表格先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公布的时间先后排序；序号栏“–”前为总排序，“–”后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排序；公布时间栏括号内的汉字数字如(一)(二)等表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的批次，括号内阿拉伯数字如（1）（2）等表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的批次。

②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县归属以及名称，按照公布时文件而定；已列入或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再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跨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各区县可重复列入，如：万里长城北京段在6个区县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中都要列入。

③本文所列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的部分资料来源为《文物工作实用手册》，华龄出版社2005年版。

④孙天胜、沈正平：《地理环境与民俗起源初探》，《科学发展观与人文地理学研究新进展》第7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任）

关于元青花生产状况的几点思考

陈　扬

元青花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大抵是因为它存世量少，而且烧造精美又相当成熟，不同于唐宋青花的质朴，也不比明清青花的富丽堂皇。明清以后，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烧造主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汉文化代言品种之一，这不禁就引起我们对于青花瓷发展过程的追溯，包括它的生产地点、制作工艺、钴料成分、纹饰题材等等。而作为青花瓷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元代，则是青花瓷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文旨对元青花的生产状况做一系列分析。

一、元青花的生产时间

近年来，各地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元青花的出土数量逐步增多，我们对于元青花时代序列的划分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目前所知最早的元青花应为 1978 年杭州文山路至元丙子（1276 年）墓出土的三件观音像，根据冯先铭先生的考证，该墓年号“至元”应为前至元[①]，笔者认同此观点，因此，可以认定，该件器物是元青花的雏形。从器物本身的制作工艺来看，观音坐像的发、眼、眉及服饰的突出部位，用青花及褐彩描绘，釉下青花只是寥寥数笔勾画涂染，结合褐彩装饰，带有一定原始性；釉面略带乳浊且闪青，釉层厚薄不均匀，背面施釉不到底，带有明显的南宋湖田窑青白瓷风格（图一）。另外一件较早且有纪年的元青花是延祐六年（1319 年）墓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②]，该瓶很明显是随葬明器，这类明器又称作皈依瓶，皈依瓶是南宋以来南方墓葬中很常见的器物，从青花的绘画方法可以明显看出工艺的进步，即如意纹、牡丹纹和莲瓣纹的写实性画法，青花的颜色仍然是蓝中发灰，浓重处略泛褐色，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元青花从原始性发展到成熟的“至正型”青花的一个过渡阶段。



图一

因此，可以推断元青花的生产时间大约是从元代中期甚至更早开始，早期的元青花秉承南宋江西地区湖田窑、吉州窑的传统，无论从器形和工艺上都一脉相承。但是，元青花生产的黄金时期则是元延祐以后，即所谓“至正型”元青花的出现。笔者根据目前所见元青花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萌芽期：以杭州出土的三座观音像和九江出土的塔式盖瓶为代表，除此以外，目前国内外还未见有明确纪年的早期元青花。应该说元青花萌芽期的器物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承继关系，无论是长沙窑的釉下蓝彩的出现还是巩县窑白瓷钴料的使用，这与我们后世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都有很大的差距，只能说唐宋时期陶瓷生产的发展为元代青花瓷的成熟和日后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工艺基础。因此元青花可以视为一种新的瓷器品种，在其萌芽期产量较少也就不难解释。

发展期：这段时期可以持续到 14 世纪 40 年代左右，元青花的数量大大增多，并有了粗、精之分。最典型的是江西丰城发现的后至元四年（1338 年）青花釉里红堆塑四灵塔式盖罐[③]，此罐的绘画和装饰风格与延祐六年墓的塔式盖瓶一脉相承。

类似的纪年器物还见于“戊子年”铭（至正八年，1348 年）青花缠枝灵芝纹罐[4]，同时出土的还有青花缠枝菊纹带座蒜头瓶、青花缠枝菊纹狮纽盖三足炉、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同类器物在北京元大都遗址也有出土，如青花出戟觚、青花鸟食罐等。这一时期的元青花以小件器物为主，器型仍大多沿袭宋代。

值得注意的是，1988 年景德镇珠山北麓风景路出土的一批元青花瓷片，经过复原，器型包括鼓形十字杵龙纹盖罐、龙纹盖盒、龙纹筒形盖罐、凤纹盖罐等[5]，这批器物的龙纹均为五爪龙，刘新园先生通过文献、传世器物以及出土物的比对，认为这批青花碎片就是元文宗（1328−1332 年）时期的官窑产品[6]，这批器物的出土填补了元青花研究的空白，即所谓官窑元青花的生产情况。



图二

成熟期：元末是元青花的腾飞阶段，纹饰精美，造型别致。从出土情况看，大盘、梅瓶、大罐、高足碗、扁壶较多，而且出土数量明显增多，区域也开始扩大。北京元大都遗址、江西高安窖藏、江西萍乡窖藏、内蒙古集宁路窖藏、河北保定窖藏、江苏金坛窖藏以及安徽一带都是此时期元青花出土的集中地区。元末频繁的战乱是窖藏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至正十一年（1351 年），红巾军起义爆发，自此揭开了元末战争的序幕。而且此时元青花开始大量销往国外，从目前土耳其、伊朗等西亚地区，甚至北非、印度等地收藏的元青花就可窥见一斑。纪年器物有九江发现的至正十一年（1351 年）墓出土青花菊花纹连座三足炉[7]，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图二），明初沐英墓出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元末的青花绘画开始变得丰富，而且出现了明显的三种趋势，一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器物，如人物故事题材、缠枝花卉、云龙纹等；二是具有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器物，如云肩形开光，与 15 世纪土耳其清真寺壁龛上的纹饰类似；三是具有藏传佛教文化因素的器物，如藏传佛教中的八宝。元末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这三种纹饰经常表现在同一器物上，布局繁密，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定式。

二、元青花的生产模式

《元史 · 百官四 · 将作院》：“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8]浮梁磁局的建立是景德镇瓷都发展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浮梁磁局在元代建立之初应该只是烧造元政府要求的质地纯白的祭器，即所谓的“枢府瓷”，到了元代中晚期以后才开始烧造青花瓷器[9]，至正十二年（1352 年），该局毁于元末的战乱之中。从浮梁磁局存在的时间来看，似乎与元青花的发展擦身而过，但仍然给青花瓷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元青花的生产模式总结为两种：一是民窑生产，二是官府订烧。

从元青花的产生初期来看，无论从绘画风格和制作工艺乃至用途都带有较强的民窑风格，根据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这一类器物大多出土于墓葬中，而且青花绘画简单，以花卉和文字为主，有的只是点涂突出部位，青料发色灰暗，釉色泛青，釉层厚且不均匀，釉面乳浊感强，这类器物应该是景德镇湖田窑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然而蒙人尚白的习俗给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契机，元王朝用景德镇创烧的卵白釉瓷器作为祭器，现藏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白釉“太禧”盘即为祭祀用品[10]，“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著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11]由此可见，元王朝确实在景德镇烧造宫廷用器，可以推测官府督陶机构就是元初所设立的浮梁磁局。而且生产这种白釉器物的地点就在景德镇湖田窑刘家坞一带，这里曾发现元代卵白釉枢府器，纹饰有五爪龙纹等[12]，90 年代以后又陆续发现“玉”、“枢府”、“太禧”铭等印五爪龙纹器和元代釉里红凤、龙纹滴水、瓦当等标本[13]。可以证明，刘家坞窑场就是浮梁磁局监督，元王朝订烧宫廷用器的窑址。无独有偶，前文所提的 1988 年在珠山北麓风景路出土的一批元青花瓷片上也有五爪龙纹样的使用，“仁宗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定服色等第……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龙谓五爪二角者。”[14]可见元延祐以后，对民间使用五爪龙有一定的限制。除了景德镇出土有五爪龙纹以外，其余各地窖藏出土或传世品中龙

纹图案均不见五爪。2003—2004 年，在明御厂北侧发掘中，陆续发现元代青花、青白釉、卵白釉残片，标本均具有官窑特征，同时发现有刻“局用”铭的明初官窑残器[18]。

此外，深具影响的外销元青花，我们大体也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具有“官样”特点的大器，多数流传在中西亚阿拉伯地区；二是纹饰简单的小件器物，主要发现在东南亚地区。前者一般器型规整，纹饰精美，有可能是元王朝官府订烧后转送给附属汗国[19]或者通过贸易传入西亚诸国，后者一般青花发色灰暗，绘画简单，以缠枝、折枝花卉纹居多，是景德镇民窑产品。

综上所述，元青花作为宫廷或者官府用器是在元中期以后，也是在白釉官窑器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此时元青花在民间的生产已经稍具规模，元王朝并未设立专门的官窑机构，只是向较为成熟的民窑订烧，设置管理瓷务的机构监督，因此这种官窑性质器物在景德镇的出土地点比较分散。元青花作为一种瓷器品种开始接受官府的订烧也促进了民间青花的发展，官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丰富了元青花的纹饰题材。与此同时，元末明初，云南的玉溪窑、建水窑也开始生产青花瓷器[20]，至此青花瓷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瓷器品种流行于全国各地。



图三

三、元青花的生产目的

通过前文所述元青花之生产模式，对于官府订烧的器物，目前考古发掘出土数量相当少，占据目前所见元青花绝大多数的主要来自于国内窖藏出土和国外相关机构所藏。国内窖藏出土的元代瓷器一般都在几十件到数百件不等，品种也不光涉及青花瓷，亦见青白瓷、龙泉青瓷等等，多数瓷器都没有使用的痕迹[21]，应该是为躲避战乱而将珍贵物品匆忙入藏。从器型来看，以罐、瓶、高足杯、香炉、扁壶为主，已经没有元青花初期较为明显的明器性质，应该作为一般的日用器皿使用及流通。

国外所藏元青花，主要集中在北非、西亚地区，日本、印度及东南亚等国也有不少收藏。尤其是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国立考古博物馆两家所藏元青花瓷器最为精美，造型硕大规整，绘画精良，青花发色浓艳，纹饰布局繁缛，多区间分割视线，各区间纹饰不同，大器生动、丰满而不单调笨拙。西亚所藏元青花上大叶、大花的植物纹、奔腾活泼的动物纹、精巧活跃的几何纹丰富多样（图三）。伊斯兰世界拥有这一批制作考究的元青花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元帝国自建立之初就东征西伐，中西陆路交通并不畅通，虽然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都是元王朝的宗藩国，但实际上仍是战事不断，直到 1318—1334 年中亚窝阔台汗国与伊利汗国和元朝修好，中西传统的丝绸之路商旅贸易重新变得通畅而兴旺。元顺帝至元以后，汗国瓦解，贵族纷纷自立为王，相互攻占，可见这批元青花应该就是 14 世纪上半叶通过陆路交通贸易传入西亚。另外，从国外考古出土的情况看，元青花的足迹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在埃及的福斯塔斯特遗址（开罗的前身，毁于 12 世纪的兵乱中），三上次男先生从废土中拣出 12000 多片中国瓷片[22]，有数百件元青花瓷器残片，包括有元青花常见的云龙、牡丹、凤、莲瓣纹等。出土元青花最多的是印度德里图格拉克宫，1960 年出土 72 件元瓷，其中青花 67 件（盘 44 件、碗 23 件）、青瓷 5 件。这些瓷器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只有个别的基本完整[23]。东非及阿拉伯半岛沿岸巴林、黎巴嫩、肯尼亚等地也都有零星的元青花瓷片出土，这些地区在 14 世纪都是伊斯兰城邦。反观国内出土元青花概况，可以总结出几个较为集中的区域，元大都及河北地区、江西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也有部分出土，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元青花的输出路线，从生产地景德镇运至京城，再经由新疆、内蒙古边境通过陆路行销到中亚以及以西的广大地区。由此可见，元青花的外销与伊斯兰世界的需求密不可分，首先，蓝白相间的纹饰迎合伊斯兰文化的审美情趣，繁复而蓝白相间的植物纹和几何纹在伊斯兰世界自古就特别发达，无论西亚的地毯，阿拉伯书法的边饰，还是清真寺墙壁装饰，到处都能见到精致的蓝白相衬的植物纹和几何纹。其次，大器符合伊斯兰世界的生活习惯，大盘盛物，众人围坐而食是阿拉伯等西亚民族的就餐习俗。清真寺在盛大的宗教节日里还用大盘盛满食物或传统糕点招待穷人或赠送教众。而精美的青花大瓶不少是喜爱青花艺术的伊斯兰教徒在家中、清真寺甚至宫廷的高档陈设器。

成书于明天顺年间的《新增格古要论》中提到："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㉑]由此可见，青花瓷在汉族文人的眼里并不是高雅之物，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可以推论出，"至正型"元青花崛起于海外市场，尤其是西亚的伊斯兰世界，外销是推动青花瓷在元代晚期发展起来的决定性因素。

四、结　语

从青花瓷发展的过程来看，唐青花的萎缩和元青花的崛起与西亚伊斯兰文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会昌六年(845 年)唐武宗的"灭佛禁教"和唐末黄巢在"均平"口号下屠杀富裕的阿拉伯商人，致使在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剧减，西亚至广州、扬州的通航中断，而元中期以后，元王朝统治者有着明显的伊斯兰化趋势。而且从元晚期的青花瓷来看，很多纹饰题材吸纳了伊斯兰因素，如伊斯兰彩绘陶上的莲瓣纹与元青花上作辅纹的变形莲瓣纹、伊斯兰的壁窗造型与元青花上的菱形开光、伊斯兰金属器上的小联珠纹与元青花上的缀珠纹等。

然而，纵观整个元代青花瓷的发展，我们不能割断其内在的联系，元青花产生初期是在宋代陶瓷手工业形成辉煌的背景下，宋代名窑林立，由南到北形成了八大窑系，窑工的迁移带动了烧窑技术的相互交流和进步，以至于一种产品的流行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模仿的窑口，而且窑工已经可以灵活的掌握各项烧瓷技术，创烧各种新品种，元青花就在这种环境下再次应运而生，器型和纹饰沿袭南宋陶瓷的传统。随着蒙古人在中原统治的稳固，蒙人贵族开始接受汉族文化，国内的经济文化发展，蒙族上层社会与西藏和伊斯兰世界的密切联系给汉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这同样反映在元青花的生产过程中。元朝统治者遵循了汉文化发展的规则，入主中原以后遵照《周礼》的描述祭祀祖先宗庙，因此在王朝建立之初就设立陶瓷祭器的生产监督机构，国俗尚白的传统也给青花瓷作为官方用器提供了基础，由于目前考古发掘资料较少，这一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元青花是青花瓷器发展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时期，元代也是景德镇成为中国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它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整个青花瓷器乃至中国传统瓷业的发展过程。

①冯先铭：《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问题》，《文物》1980 年第 4 期。

②九江市博物馆：《元代青花牡丹塔盖瓷瓶》，《文物》1981 年第 1 期。

③杨厚礼：《丰城县发现元代纪年青花和釉里红瓷器》，《南方文物》1980 年第 4 期。

④黄云鹏：《馆藏和窑址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瓷》，《江西历史文物》1983 年第 4 期。

⑤《景德镇发现一批元代官窑瓷器》，《光明日报》1990 年 9 月 14 日第 1 版。

⑥刘新园：《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文物》2001 年第 11 期。

⑦吴水存：《江西九江又发现元代纪年青花瓷》，《文物》1992 年第 6 期。

⑧[明]宋濂：《元史·百官四》卷八十八，第 2227 页，中华书局。

⑨江建新、江建民：《浮梁磁局及其窑场与产品探》，《南方文物》2008 年第 1 期。

⑩李民举：《浮梁磁局与御土窑器》，《南方文物》1994 年第 3 期。

⑪[元]孔齐：《至正直记》卷 2《饶州御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80 页。

⑫刘新园、白焜：《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 年第 11 期。

⑬徐长青、余江安：《湖田窑考古新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 年第 2 期。

⑭[明]宋濂：《元史·舆服一》卷七十八，第 1942 页，中华书局。

⑮刘新园、权奎山、樊昌生：《发掘景德镇官窑》，《文物天地》2004 年第 4 期。

⑯同注⑥，刘新园先生认为以"满池娇"为题材的器物应该都是元文宗时期赠送到西亚诸国。

⑰葛季芳：《云南烧造元青花瓷概说》，《收藏界》2006 年第 2 期。

⑱刘裕黑、熊琳：《江西高安县发现元青花、釉里红等瓷器窖藏》，《文物》1982 年第 4 期。

⑲[日]山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1—22 页。

⑳马文宽：《中国青花瓷与伊斯兰青花陶》，《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

㉑[明]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下卷，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 年，第 25 页。

（作者为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助理馆员）

清代雍正官窑单色釉的成就

唐小萍

雍正朝单色釉色彩极为丰富，呈色稳定纯正、工艺精良，从历史记载和传世瓷器均可以看出当时取得的巨大成就。唐英曾在《陶成纪事》总结当时景德镇官窑所使用的釉彩达 57 种之多，其中单色釉种类近 40 种，由此可见单色釉在雍正时期官窑瓷器中的比重。当时釉色齐备，种类繁多，大部分釉色都可与传世器物相对应。在《景德镇陶录》卷三“陶务”条目中，提到过红釉、黄釉、酱釉、蓝釉、绿釉、松石釉、黑釉、乌金釉、天蓝釉等等，各种釉料的配方也有记载：

紫金釉——用罐水、炼灰、紫金石合成。

翠色釉——用炼成古铜水、硝石合成。

黄金釉——用黑铅沫粘赭石合成。

矾红釉——用青矾炼红，加铅粉、石沫合成。

紫色釉——用黑铅沫、加石子青、石沫合成。

浇青釉——用釉水、炼灰、石子青合成。

浇绿釉——用炼过的黑铅沫加铜沫、石沫合成。

豆油釉——用豆青、油水、炼灰、黄土合成。

纯白釉——用釉水、炼灰合成。

浇黄釉——用牙硝、赭石合成。

霁红釉——用红铜条、紫英石合成，兼配碎器、宝石、玛瑙。

霁青釉——用青料配釉合成。

冬青釉、龙泉釉——用紫金釉微掺青料合成。

炉钧釉——用牙硝、晶料配釉合成。

碎器釉——用碎器不出三棚者，细淘则成碎器，粗淘则成大纹片。

以上釉色品种包括了高温釉和低温釉两种，其使用的原料包括了氧化铜（红铜条）、氧化铁（赭石）、氧化钴（青料、石子青）、氧化矽（玛瑙、宝石等）、硝酸钾（硝石）、硫酸钠（石硝）等矿物原料。由经验丰富的陶工取用各种原料加以配合，就产生了色彩斑斓的各种单色釉。

一、雍正时期达到顶峰之单色釉

1、霁红釉——红釉是比较难控制的颜色，理论上说，以氧化铜做发色剂，在还原火焰中烧制就能得到鲜艳的红色。但是自古以来，这种鲜艳的红色能够烧成的极其稀少，因为铜元素在高温下非常不稳定，且容易挥发，在最小粒子时呈黄色，稍大就呈红色，更大时就呈青色。用通常的还原火焰烧造，可以得到比较美丽的红色，但是略有偏差，还原不完全或部分氧化，都可能造成釉色发灰、发绿或发黑，甚至没有颜色也就是呈白色等现象。红釉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但真正纯正、稳定的红釉是明初创烧的鲜红，雍正朝



图 1　霁红釉梅瓶[①]

红釉的釉色不像宣德宝石红那样浓艳，也没有康熙豇豆红的色彩变化，而是一种沉稳不透明的红色，属于使用还原法烧制的红釉，其釉色在烧制难度较高的前提下掌控的十分娴熟。此时的釉质与色调较康熙朝更为润泽和艳丽，釉面普遍呈现两种现象，即釉面很平滑或布满桔皮纹，而不同器物上的釉色深浅浓淡不等，可分为深褐、正红、粉红，绝大部分釉面没有开片情况。

2、胭脂红釉——胭脂红釉又称“蔷薇红”、“洋金釉”、“玫瑰红”，是清代康熙年间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粉红色低温釉。它是在烧成的薄胎白瓷上，施以含金万分之一、二的釉料，于彩炉中烘烤而成，属于清代康熙朝的创新品种，至雍正时期烧制则更为成熟。雍正时期的胭脂红釉，特点是施釉较薄，釉面光滑并且色调鲜艳，釉中带有紫色斑点，远距离观察有红中泛紫的现象，流传至今，釉面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出有细密的开片。一般此釉常施于器物的外表，内里白釉或加饰粉彩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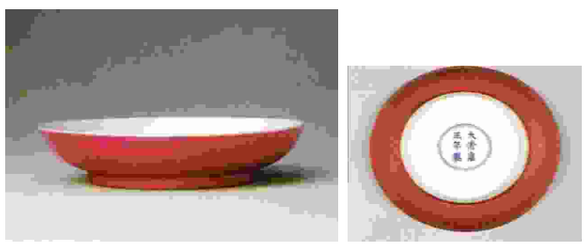


图2　胭脂红釉盘②

3、黄釉——是皇家控制最严格的一种釉色，因“黄”与“皇”同音，固而黄色也成为皇家至尊之色，明清两代黄釉器只有皇家才能使用。黄釉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安徽淮南寿州窑、河南密县窑等都烧黄釉。明代的黄釉有新的发展，始于宣德的浇黄，更是明代杰出的黄釉；嘉靖以后，又有鱼子黄、鸡油黄等。清代烧制黄釉改以锑为呈色剂，是随着其它各种釉料被外国传教士传入我国的一种低温釉，康熙时期烧制的黄釉因颜色淡雅似鸡蛋黄，被称之为蛋黄釉。到了雍正时期，黄釉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始创出一种更美丽的黄釉，因釉色中带绿，既具备明代黄釉的娇艳，又不失康熙时期的淡雅，被称之为柠檬黄釉。此品种施釉较薄，釉面滋润，釉色均匀又富于变化，受到后人追捧。



图 3　雍正黄釉瓶③

4、蓝釉——深沉美丽的蓝釉是以氧化钴为着色剂，钴在唐朝传入我国，最早见于唐三彩中。在开始用于烧造瓷器以来，深受陶工的喜爱，但这时还是低温蓝釉，只有绮丽之感，缺乏沉着色调。高温蓝釉的出现是在元代。入明以后，特别是在宣德时，蓝釉器物多而质美，被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清代氧化钴在炉火中较强的还原下，发色能力比其它金属元素强，因此烧造出来的霁蓝釉往往色调匀净，呈色光亮柔和，比较容易控制。清代康熙时期蓝釉品种极少烧制官窑，偶见大盘、碗等常用器物。而雍正时期的霁蓝釉器，多数是仿造明代宣德的品种，器型、釉面以及款识，均与宣德宝石蓝釉器类似。此时的蓝釉与红釉的特征相同，具有釉面光滑平整或布满桔皮纹两种特点，釉面色调均匀洁净，蓝中带紫，发色纯正深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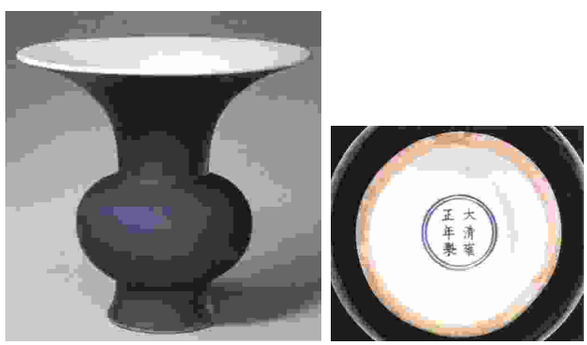


图 4　雍正霁蓝釉大渣斗④

5、青釉——青釉是以铁为呈色剂，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的一种高温釉，依据釉色的深浅又划分为：豆青、冬青、粉青等几个品种。中国瓷器最早的颜色釉，是出现于南方的青釉。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而是具有黄、绿、青等几种颜色，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故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中记载：“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刘子芬著《竹园陶说》中也说：“青色一种，常与蓝色相混。雨过天晴，钧窑、元窑之青，皆近蓝色。惟千峰翠色、梅子青、豆青乃为纯青耳。天色本蓝，有时为青”。清代烧制的青釉主要继承了龙泉青瓷的特点，而最成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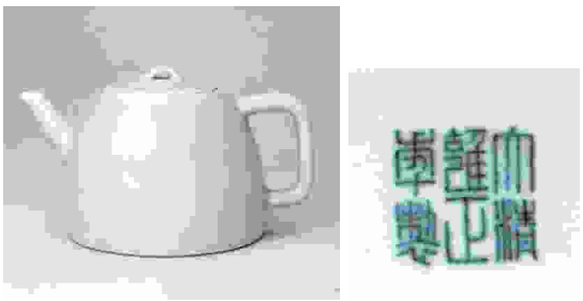


图 5　雍正青釉茶壶[5]

青釉产品是清代雍正时所烧，并且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康熙时期的官窑产品，天青釉略带蓝色，釉薄而坚，莹润光洁，无开片，到雍正时，釉色幽淡隽永，更是引人入胜，再加上追摩仿古，仿制景德镇湖田窑的作品亦堪独树一帜。

6、绿釉——是一种含氧化铜的石灰釉，在还原气氛中呈红色，在氧化气氛中则呈绿色。我国传统的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作着色剂，属于铜绿釉。清代雍正年间创烧出一种低温淡绿釉，釉色略泛黄，色泽比柠檬黄釉浅，类似秋葵叶色，故而得名，又称“湖水绿”或“葱青绿”。清代雍正以前无烧造记录，至乾隆时期偶有制作，但比雍正时期釉色深，乾隆朝之后烧造技法失传，无此品种。此绿釉施釉较薄，釉质滋润，釉色均匀鲜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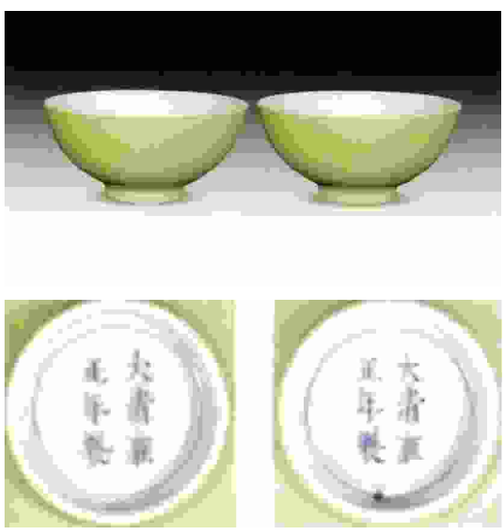


图6　雍正秋葵绿釉小碗[6]

7、松石绿釉——清代雍正年间所创烧，是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的一种低温釉，因釉色与松石相似而得名。釉色青绿，比乾隆时期所烧造的松石绿釉柔和悦目，乾隆时期烧制的松石绿釉普遍较绿，无雍正时期的淡雅。至乾隆朝以后，此种釉色多用于粉彩器上搭配使用，极少单独出现，釉质也大大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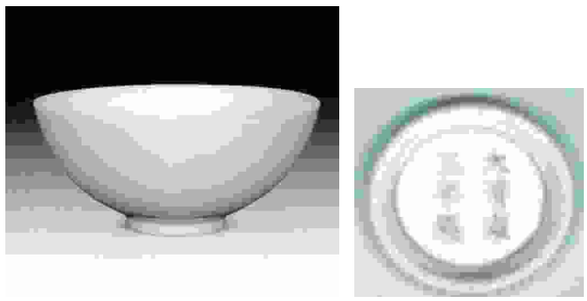


图 7　雍正松石绿釉小碗[7]

8、孔雀绿釉——孔雀绿釉是以铜为呈色剂的一种低温釉，釉色呈透明的蓝绿色，因其碧翠亮丽，恰似孔雀的羽毛而得名，又称“法绿釉”、“翡翠釉”、“吉翠釉”。是宋代的民窑所创烧，最早见于宋代磁州窑。明成化时，景德镇开始在瓷器上烧制单一的孔雀绿釉。其烧造方法有两种：一是以素胎直接挂釉烧制，釉面易开片剥落；一是在白釉器上罩釉烧成，釉面剥落者少。但是，在明代孔雀绿釉烧成熟以前，所有的绿釉都呈深暗青绿色，没有达到亮翠的程度。雍正时期的孔雀绿釉是以碳酸铜加入钠的成分所呈现，烧制出的器物釉层薄厚不一，施釉不匀，多有流动的情况出现，较前朝康熙时期孔雀绿釉器蓝中泛黑，较明代孔雀绿釉器釉面光亮平滑，釉内有细碎片纹，釉色鲜艳夺目，自雍正朝以后，罕有官窑器物烧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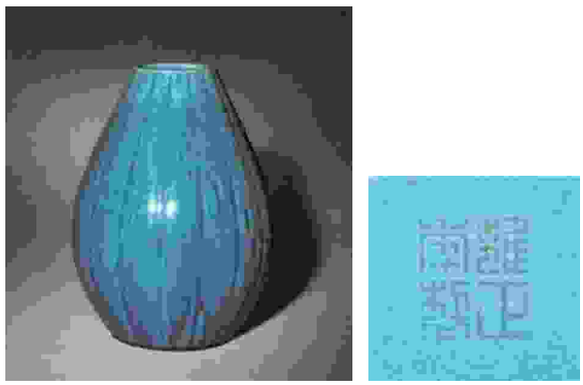


图 8　雍正孔雀绿釉瓜棱罐[8]

9、酱釉——是一种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高温釉，因使用紫金土配釉，而又称“柿色釉”、“紫金釉”。嘉靖时的酱紫色泽较浅，釉面有的光亮，有的晦暗。康熙时釉色褐，多用于器物口部边沿。乾隆时在酱色地上抹金并加以描金的仿古铜彩器，是当时制瓷工艺中的特殊品种。酱釉多用于仿古器，有宋代“紫定”的效果。雍正时期所烧制的酱釉最为成熟，施釉较厚，釉色深沉，釉色均匀，釉面光亮。



图 9　雍正酱釉浅碗[9]

10、米色釉——米色釉是一种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高温釉，釉色黄中泛白，类似小米的颜色。始创于清代康熙朝，后朝均有烧造，但惟有雍正时期的制品最为精美，此种釉色常见于盘碗之上，并且雍正时期创新出一种使用留白方法搭配组合出图案的品种，也有在留白中使用矾红加绘出图案的。釉色略有深浅浓淡，釉面光滑平整，施釉均匀，较其他朝代制品釉色淡雅清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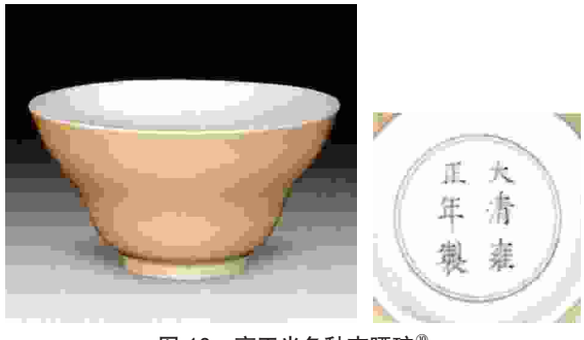


图 10　雍正米色釉束腰碗[10]

11、白釉——白釉是一种以氧化铁为成色剂的一种高温釉，也是瓷器的本色釉。白釉通常普遍被认为比较容易控制，但好的胎土与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胎土淘炼不够精细或含有杂质，釉的颜色即受影响。一般瓷土和釉料，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氧化铁，器物烧出后必然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青色来。如果釉料中的铁元素含量小于0.75%，烧出来的就会是白釉。古代白瓷的制作，并不是在釉料中加进白色呈色剂，而是选择含铁量较少的瓷土和釉料加工精制，使含铁量降低到最少的程度。这样在洁白的瓷胎上施以纯净的透明釉，就能烧制白度很高的白瓷。白釉出现于北朝，而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是我国至今所见的最早的白瓷。清代雍正时期的白釉比其他朝代略有分别，多仿制明代制品，以明代永乐时期的甜白釉为主，所烧制出的釉色均不透明，呈粉红色，对比明代白釉器，施釉方面则均匀许多，釉面也更加滋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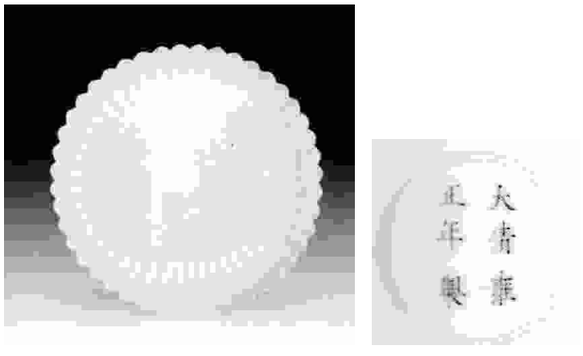


图 11　雍正白釉菊瓣式盘[11]

12、炉钧釉——炉钧釉是以铜和钴为呈色剂的一种混合低温釉，清代雍正时期所创烧。烧制的方法是先以高温烧成瓷胎，挂釉后在低温炉中第二次烧成，故称“炉钧”。清代《南窑笔记》中记载：“炉均（钧）一种，乃炉上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者为佳，青点次之”。《景德镇陶录》亦记载，“炉钧釉，色如东窑、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流淌变化过之”。《陶成纪事》中又有记载，（炉钧釉）“如东窑、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为流淌变化过之”。书中记载的东窑的颜色是半透明的绿色，宜兴挂釉之色介于不透明的蓝紫之间。雍正时期所烧制的炉钧釉中，红点中带紫色，恰似成熟的高粱麦穗之色，故有“高粱红”之称谓。此时的炉钧釉，施釉较厚，釉面凹凸不平，普遍发蓝的地方略厚，发紫色的地方略凹，釉水从上至下自然流淌，色彩之间相互夹杂，形成自然流动的美感。



图12　雍正炉钧釉三孔花插[12]

13、厂官釉——厂官釉是以铁为呈色剂的一种高温釉，清代《南窑笔记》中记载：“厂官窑，其色有鳝鱼黄、油绿、紫金诸色，出直隶厂窑所烧，故名厂官，多缸、钵之类，釉泽苍古，配合诸窑另成一家，今仿造者用紫金杂釉白土配合，胜于旧窑”。鳝鱼黄釉属于结晶釉的一种。配釉时用长石少许，并加少量的镁，经 1300 摄氏度左右的高温氧化火焰烧成。釉色黄润，带黑色或黑褐色斑点，象鳝鱼的皮色，故名“鳝鱼黄”。明代就有鳝鱼黄的名称，《陶雅》中记载：“鳝鱼皮以成化仿宋者为上”，说明宋已有之。清代唐英所著《陶成纪事》

中记载：“一仿厂官窑，有鳝鱼黄、蛇皮绿、黄斑点三种”。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雍正朝已经可以成功烧制出这三种釉色的厂官釉器。雍正时期的厂官釉瓷器，施釉均匀，一般口沿与胎体凸起之处积釉较薄，由胎体映衬出草黄色。釉质较厚的部分，釉面均不光亮，呈现亚光的效果。此釉康熙朝无制作，至乾隆朝及后朝各代制作不及雍正时期品种齐全，釉色单一，釉质干枯，不及此时期润泽。



图 13　雍正厂官釉花浇[13]

14、天蓝釉——天蓝釉是以其含钴量在 2% 以下，釉里的铜、铁、钛等金属元素均起呈色剂作用的一种高温釉，釉色因似蔚蓝的天空，故而得名。它是清代康熙时期始创的品种，呈色稳定，幽倩美观，可与豇豆红媲美。至雍正时烧制出的器物在前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尤以天蓝六方大碗最具特色，每方绘紫色葡萄一串，还有绘蝙蝠的，绘法装饰仿外销瓷，均为一火烧成。此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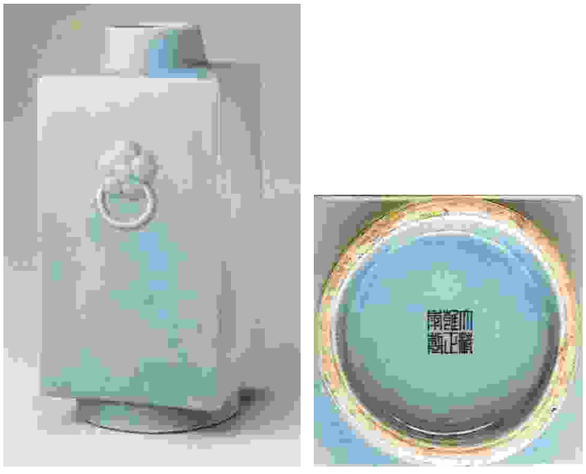


图14　雍正天蓝釉梅花双环耳四方瓶[14]

釉色分为深浅两种，深者色似晴空，浅着色似月光，釉面不甚光亮，但釉色富于变化，施釉一般比较均匀，无垂流现象。晚清民国时期多有仿制雍正天蓝釉制品，釉面多呈玻璃样的光泽，无雍正时期釉面滋润的质感，比较容易区分。

二、雍正时期的单色釉仿古

雍正时期的单色釉在仿古方面更加出众，可以称之为清代制瓷业最为精彩的一章，仿制出的器物直追两宋，仿制品种包括：宋代汝窑、官窑、哥窑、钧窑、龙泉窑。并在釉色上极尽追求一致的效果。雍正时期督陶官唐英所著《陶成纪事》一书中记载雍正时期“仿古各釉色”中有关仿宋的就有下列诸项：

（1）铁骨大观釉——有粉青、月白、大绿三种；

（2）铜骨无纹釉；

（3）铁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种；

（4）铜骨鱼子纹汝釉；

（5）钧釉——有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骡肝、马肺、新紫、米色、天蓝、窑变十种；

（6）龙泉釉——有深、浅二种；

（7）湘窑宋釉——有米色、粉青二种。

1、仿汝釉——明代宣德时期有仿制，后朝停烧。至清代雍正时期开始恢复烧制，烧制水平远在明代宣德朝之上，因为雍正时期仿制精细程度之高，无他朝可比。此时修胎规整，胎体灰中闪褐色，极像宋代汝窑瓷器的“香灰胎”，釉色天蓝，匀净浑然一体，有细小开片纹，与宋代汝窑釉的蟹爪纹相似，釉的表面有桔皮纹，器底露胎处可见泛灰黄色的火石红痕，欠火力的胎釉，则有些凹凸不平或釉色泛白不匀等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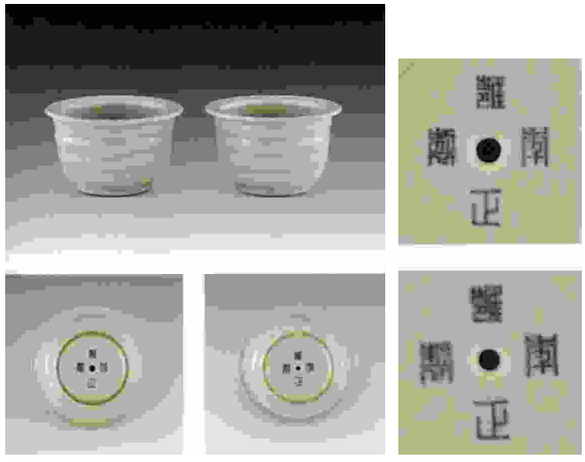


图15　雍正仿汝釉花盆[15]

2、仿官釉——清代蓝浦著《景德镇陶录》中谈及景德镇窑仿官釉器时，讲到：“官窑器，自来有专仿户，今惟兼仿，碎器户亦造，若厂仿者尤佳”。说明当时景德镇的民窑也烧制仿官釉器，但高质量的产品仍旧是御窑厂所烧制。雍正朝仿官釉釉色有粉青、天青、灰白等色，釉面有冰棱型几何开片，或无开片，部分器物亦有宋官窑器的“紫口铁足”特征，仿制惟妙惟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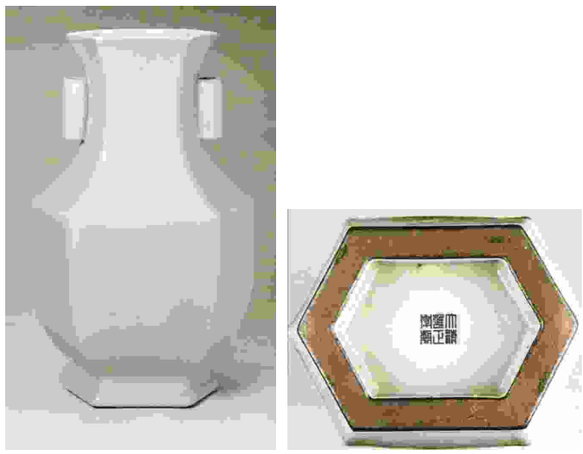


图16　雍正仿官釉六方贯耳瓶[16]

3、仿哥釉——雍正时期仿哥窑器物从色泽区分，有月白、灰黄、粉青、灰青、油灰、深浅米黄等种类。最显著的特征是釉色沉厚细腻，光泽莹润，如同凝脂，在显微镜下看，可见瓷釉中蕴含的气泡较浓密，通体布满交织的开片纹，开片由大而深以及小且浅两种线条组成，俗称“金丝铁线”。宋代哥窑瓷器在明代成化朝时有少量仿制，到雍正时期由于仿制比较成功，水平高超，故才出现较大件的器物，其它器型多为葵口碗、琮式瓶以及文房类的笔筒、笔架、笔舔等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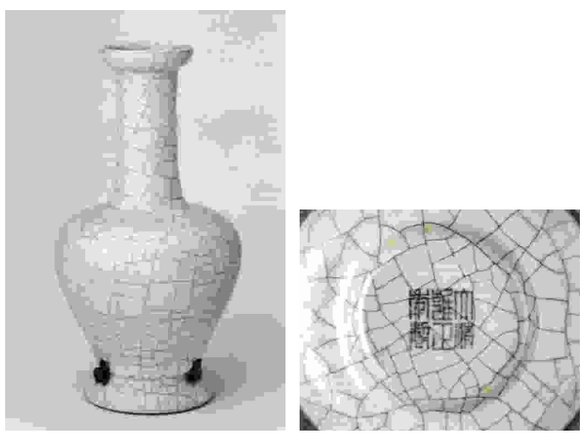


图17　雍正仿哥釉三羊尊[17]

4、仿钧釉——清代唐英著《陶成纪事》一书中记载，雍正七年（1729 年）开始仿制宋代钧釉器，其中一种以天蓝釉色为基础而烧制出像宋代钧窑一样带红斑的釉色，称之为天蓝仿钧，其蓝色富于深浅变化，色调纯正，釉面滋润，无开片，通常底部施有酱色釉，模仿宋代钧窑制品而故意施釉不匀。而其中映现出的红斑，有红紫、淡红、淡紫、灰褐等不同的色调，这都是由于窑火的温度不同所导致。由于在连续的玻璃介质中悬浮着无数圆球状的小颗粒，这些小颗粒能散射短波光，使釉面呈现美丽的蓝色乳光；又由于釉料中还原铜的呈色作用，而现出红紫色，与天兰色互相掩映，好似一片彩霞。诗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词句来赞美它的变化万千、绚丽多姿的色彩。雍正仿钧釉虽然在造型及釉面上仿制的惟妙惟肖，但无论此时的官窑或是民窑，器物身上的时代特征仍旧比较明显，有些仿制比较逼真的，也可以从平整光亮的釉面上区分。



图18　雍正仿钧釉弦纹瓶[18]

5、仿定釉——雍正仿宋代定窑釉，胎体白中闪黄，胎质略比其他釉色品种的显松软，类似浆胎，釉面多凸显不够平整，有波浪纹及细小的开片，对比乾隆时期的仿定釉制品，则无胎骨中明显的黑线，以及不曾使用半脱胎的烧制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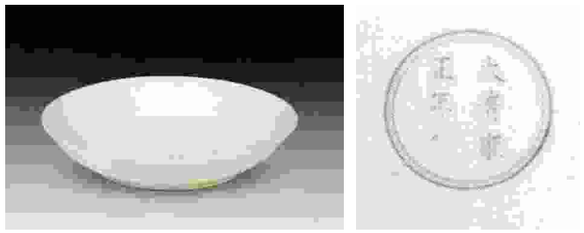


图19　雍正仿定窑釉盘[19]

单色釉瓷器的烧制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陶瓷历史的发展，可以说是陶瓷发展的一条基线，从青瓷、白瓷、五大名窑以及龙泉精品，到最后色

彩斑斓的各种色釉，无一不是从单色釉延伸而来。而雍正一朝在单色釉瓷器烧造方面的诸多成就，当时的御窑厂用色之巧、烧制水平之高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一时期官窑不仅烧制出各种美丽又高贵的釉色品种，还惟妙惟肖地仿制出各色前朝著名品种。并且创新品种典雅秀丽，仿古色釉端庄静穆，可谓集诸色之大成。不仅文献中多有记载，且有传世实物加以佐证。单色釉瓷器既可独立观赏，又可组合成趣，以不浮、不嚣、不繁、不媚之态，表达出单纯的美感，它的莹洁素雅，必定为后世所推崇和景仰。

①瓶高 25.8 厘米，口径 5.2 厘米，足径 9.3 厘米，瓶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渐收敛，浅圆圈足。此瓶外壁满施霁红釉，足内施白釉，底署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②盘口径 15 厘米，足径 9.3 厘米，高 2.9 厘米，盘敞口，弧壁，圆圈足，底施白釉，署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③瓶高 14.6 厘米，口径 3.3 厘米，足径 1.7 厘米。瓶撇口细颈，溜肩，肩以下逐渐收敛至足，圆圈足，通体施黄釉，足内署阴刻“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④渣斗高 20.5 厘米，口径 22.7 厘米，足径 8.6 厘米，渣斗大撇口，粗颈，圆肩球腹，圆圈足微外撇，足内施白釉，底署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这件渣斗大口小腹，造型古朴端庄，釉面匀净光亮，色泽呈深沉的蓝色，高雅至极。

⑤壶高 11.6 厘米，口径 7.5 厘米，足径 14.5 厘米。壶敛口，口下渐渐丰满，平地无足，底有支钉痕，壶盖与壶口合实紧密，似浑然一体，盖顶配有桥式钮，壶身一侧置圆柱状曲柄，另一侧置圆柱直流。外表满施青釉，底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此壶属于雍正时期的粉青釉品种，釉色高雅与壶型相得益彰。

⑥碗高 3.3 厘米，口径 6.9 厘米，足径 2.6 厘米。撇口，深腹，圆圈足，碗外壁施绿釉，足内署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⑦碗高 4 厘米，口径 9 厘米，足径 2.9 厘米。撇口，弧形深腹，圆圈足，足墙较矮，碗外壁施松石绿釉，足内署青花单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⑧罐高 22 厘米，口径 6.8 厘米，足径 10 厘米。敛口，鼓腹，圆圈足，通体满施孔雀绿釉，釉色介乎于霁蓝与淡蓝之间，釉质较肥润，足内署阴刻“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

⑨碗高 4.8 厘米，口径 16.8 厘米，足径 7.9 厘米。撇口，弧壁较浅，并装饰有凸起弦纹两条，圆圈足，除足内以外满施酱釉，底署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此碗胎薄，施釉均匀不见垂流现象，可见工艺之高超。

⑩碗高 8.1 厘米，口径 15.3 厘米，足径 6.3 厘米。此碗敞口，深腹，碗壁在腹部中间急收成凹进的形式，以下渐敛至足，外表施米色釉，底署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⑪盘高 3.4 厘米，口径 17.6 厘米，足径 11.2 厘米。盘撇口，浅弧腹，盘壁做菊瓣样，底署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⑫花插高 7 厘米，口径 5.8 厘米，足径 5.2 厘米。此花插平顶，顶部均匀开有三个圆形插孔，束颈，腹呈扁圆形，圆圈足，通体施炉钧釉，底部阴刻“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

⑬花浇高 26 厘米，口径 4.9 厘米，足径 8.8 厘米。此器直口一侧外撇呈流，长颈中部凸起成球状，溜肩，直腹，腹下渐收至足，圈足微外撇。颈部与肩部衔接处装饰三条凸起弦纹，肩部与腹部下方分别装饰相呼应的菊瓣纹饰，整体满施厂官釉，属于雍正时期厂官釉的鳝鱼黄类品种，黄中微闪绿。底署阴刻“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

⑭瓶高 27 厘米，口径 6.5 厘米，足径 11.5 厘米。瓶直口，短颈，长方形腹，肩下两面各有堆塑的梅花下方配环形装饰，通体施天蓝釉，底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篆书款。此瓶釉水滋润，色彩淡雅清新，虽施釉不够均匀，釉色有浓淡，但模仿蓝色的天空更加贴切。

⑮花盆口径 13 厘米，高 13.3 厘米。平折沿式口，器身有横凸宽弦纹四条，圆圈足，满施仿汝天蓝釉，底署青花“雍正年制”四字十字型款。

⑯瓶高 45.5 厘米，口径长 9.3 厘米，足径 19.4 厘米。瓶呈六方型，撇口，束颈，颈部两侧装饰圆柱型贯耳，溜肩，直腹渐收敛，六方形足微外撇。通体施仿官釉，釉色为粉青色。底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篆书款。

⑰尊高 27 厘米，口径 7.3 厘米，足径 9.8 厘米。洗式口，细长颈，丰肩，肩以下渐收，圈足外撇，瓶身由上至下共装饰凸起弦纹四条，以及素胎堆塑羊头三组，除装饰的羊头外通体满施仿哥釉，底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篆书款。

⑱瓶高 25.2 厘米，口径 7 厘米，足径 11.7 厘米。瓶盘口，细长颈，扁圆腹，腹收至足，圈足外撇。通体施仿钧釉，底施酱色釉，署阴刻“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此瓶釉色由蓝、红、紫三色组成，部分因釉水垂流造成釉薄露胎现象。

⑲盘高 4.3 厘米，口径 21 厘米，足径 12.4 厘米。盘敞口，弧壁，圆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色莹润，盘内外壁与底釉不同，底部所施白釉白中闪青，而其他部位所施白釉则泛卵黄，底署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公司馆员）

清乾隆皇帝的裕陵妃园寝

付幸

清乾隆皇帝的陵墓在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其陵园称为裕陵。其后宫除裕陵地宫中与他合葬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孝仪纯皇后魏氏、慧贤皇贵妃高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氏外，其皇后乌喇那拉氏及众多嫔妃则葬在裕陵妃园寝内。

裕陵妃园寝坐落于河北省遵化市东陵乡境内，东距裕陵 0.5 公里，西距菩陀峪定东陵（慈禧陵）0.25 公里，南距峪大村 0.5 公里[①]。据笔者调查，所处经纬度为北纬 40°11.302′，东经 117°38.523′。该园寝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因葬入纯惠皇贵妃，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进行了改建、扩建，一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才完工。此后，改称纯惠皇贵妃园寝。直到嘉庆四年（1799）才定名为裕陵妃园寝。这座妃园寝的规制较高，超过了一般规制，仅次于景陵皇贵妃园寝。

一、妃园寝内葬人物

裕陵妃园寝中葬有一位地位非常显赫的人物，即乾隆皇帝的皇后乌喇那拉氏。按照历代陵寝制度，帝后埋葬地称之为陵，而此园寝中葬有皇后却不称陵，殊为可怪。

皇后乌喇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左领那尔布之女，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月初十日，雍正时，世宗将她赐给弘历为侧福晋。乾隆二年（1737）十二月册封娴妃，十年（1745）十一月晋封为娴贵妃，十三年（1748）三月孝贤皇后薨逝，皇太后见娴贵妃端庄贤惠，有母仪天下之才，劝皇上立娴贵妃为皇后，乾隆帝认为孝贤皇后逝世不久，还在丧期内就立新的皇后，不太合适。为了尽孝，乾隆帝折中了一下，十四年（1749）四月将娴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开始摄六宫之事，代行皇后之权。一年后，孝贤皇后丧期已过，十五年（1750）八月册立乌喇那拉氏为皇后。十七年（1752）生皇十二子永瑆，十八年（1753）生皇五女，二十年（1755）生皇十三子永璟。三十年（1765）正月，乌喇那拉皇后陪同乾隆帝第四次南巡，途中失宠，被送回京师。同年五月，乾隆帝下旨，收回那拉皇后的 4 份册宝，即皇后 1 份、皇贵妃 1 份、贵妃 1 份、妃 1 份，注销了皇后入宫以来的所有册封。皇太后钮祜禄氏支持皇帝的做法，下旨将令贵妃升为皇贵妃，即后来的孝仪皇后。这种做法，使那拉皇后的权力被皇贵妃取代了，所有的宫中赏赐和份额也被大量裁减，她手下的侍女，也只有两名了[②]。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那拉皇后逝世，时年 49 岁，以皇贵妃礼葬入裕妃园寝。在享殿祭祀时，未设神牌，也无祭品。值得注意的是，妃园寝是安葬皇后以外皇帝嫔妃的地方。皇后或葬入帝陵，或单独建陵。可是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喇那拉为什么葬在裕陵妃园寝呢？据《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后妃》中记载“皇后乌喇那氏，佐领那尔布女。后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十五年，册为皇后。三十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三十一年七月甲午，崩。上方幸木兰，命丧仪视皇贵妃。自是遂不复立皇后。”可见，因为那拉皇后剪了头发，触犯了国俗大忌而失宠，才葬入妃园寝的。

这个为乾隆帝生了皇子永琏、永璟的乌喇那拉皇后到底为何自行剪发，而触犯国俗大忌，直至其逝世，乾隆皇帝都没有原谅她，目前仍是个难解之谜。按一般规律，凡葬于妃园寝内的，无论地位高低，都应各自为券，而乌喇那拉皇后死后，却葬在裕陵妃园寝中的纯惠皇贵妃地宫中。乌喇那拉皇后的棺木在地宫中，居于纯惠皇贵妃的左侧，而纯惠皇贵妃的棺木在地宫中，居中而卧，堂堂的皇后地位明显低于皇贵妃。

该园寝内除葬有乾隆皇帝的一位皇后外，还葬有皇贵妃二位、贵妃五位、妃六位、嫔六位、贵人十二位、常在四位，共计三十六位，内葬人数之多，在清代妃园寝中位居第二。这些嫔妃分五排葬入妃园寝内。第一排三座宝顶，居中明楼后宝顶下为纯惠皇贵妃和乌喇那拉皇后，左为颖贵妃，右为婉贵妃。第二排七座宝顶，左起容妃、豫妃、忻贵妃、居中庆恭皇贵妃、舒妃、愉贵妃、循贵妃。第三排九座宝顶，左起惇妃、芳妃、恂嫔、慎嫔、仪嫔居中、诚嫔、怡嫔、恭嫔、白贵人。第四排十一座宝顶，左起金贵人、宁常在、新贵人、福贵人、张常在、秀贵人、揆常在、瑞贵人、慎贵人、武贵人、平常在。第五排有五座宝顶，左起寿贵人、顺贵人、陆贵人居中、鄂贵人、晋妃[3]。（图1）据史料及宴子有、于善浦先生的考证，这些嫔妃的生平，简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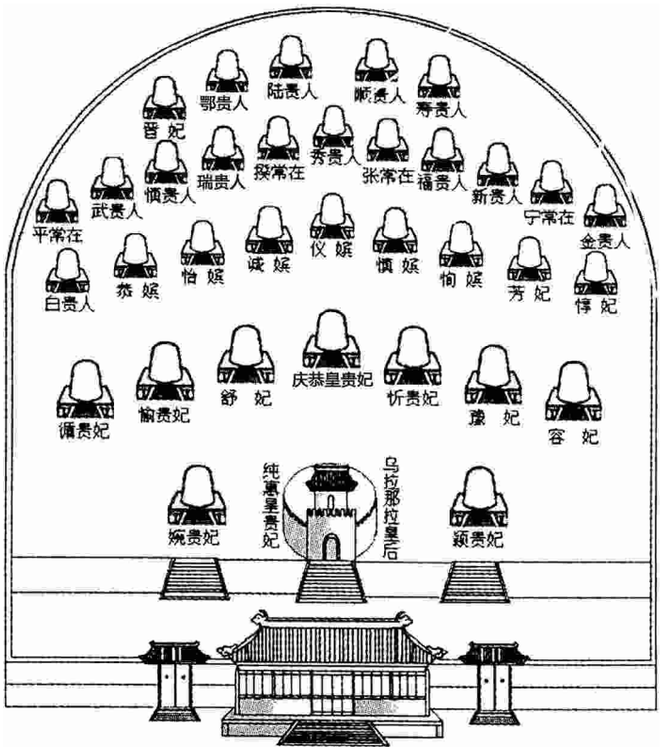


图1　裕陵妃园寝墓位分布图

纯惠皇贵妃，苏佳氏，苏召南之女。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二十一日，初侍高宗藩邸，雍正十三年（1735）生皇三子永璋，同年封为纯嫔。乾隆二年（1737）十二月晋封为纯妃。八年（1743）生皇六子永瑢。十年（1745）生皇四女，同年十一月晋封纯贵妃，二十五年（1760）四月累晋纯皇贵妃。同年四月十九日薨，五月尊谥为纯惠皇贵妃。二十七年（1762）四月十九日葬入裕陵妃园寝。

庆恭皇贵妃，陆氏，陆士隆之女。初封贵人。乾隆十六年（1751）册封庆嫔，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晋封庆妃，三十三年（1768）十月累进庆贵妃。三十九年（1774）七月薨。四十年（1775）十月葬入纯惠皇贵妃园寝。因陆氏曾抚育过嘉庆皇帝，故嘉庆四年（1799）追封为皇贵妃。

颖贵妃，巴林氏，蒙古镶红旗人，都统兼轻车都尉讷钦之女。雍正九年（1731）生，初入宫赐号为贵人。乾隆十六年（1751）册封为颖嫔。二十四年（1759）晋封为颖妃。嘉庆三年（1798）奉旨晋封为颖贵妃。五年（1800）二月薨，六年（1801）二月入葬。

婉贵妃，陈氏，陈廷璋之女。康熙五十五年（1716）生。高宗时，入侍潜邸，初号为贵人。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册封为婉嫔。五十九年(1794)晋封为婉妃。嘉庆六年（1801）尊封为婉贵太妃。十二年（1807）二月薨。同年十一月入葬。

忻贵妃，戴佳氏，总督那苏图之女。乾隆十九年（1754）册封为忻嫔。二十年（1755）生皇六女，二十二年（1757）生皇八女，二十八年(1763)晋封为忻妃。二十九年(1764)四月薨，三十年（1765）以贵妃礼葬入妃园寝。

愉贵妃，珂里叶特氏，亦作海佳氏或海氏，员外郎额尔吉图之女。康熙五十三年（1714）生。初入侍藩邸，号海常在，乾隆时，赐号贵人。乾隆六年（1741）生皇五子永琪，同年十一月册封为愉嫔。十年（1745）晋封为愉妃，五十七年（1792）五月薨。五十八年（1793）十月以贵妃礼入葬。

循贵妃，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总督桂林之女。初封为贵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册封为循嫔。五十九年（1794）晋循妃。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薨，四年（1799）九月以贵妃礼入葬。

舒妃，叶赫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侍郎永绶之女。雍正六年(1728)生。乾隆六年(1741)选入宫，赐号贵人。十一月册封舒嫔，十四

年（1749）晋封舒妃。十六年（1751）生皇十子。四十二年（1777）薨。同年九月葬入妃园寝。

豫妃，博尔济吉特氏，赛桑根敦之女，生于雍正七年（1729）。乾隆二十三年（1758）入宫，封为多贵人。二十四（1759）册封为豫嫔。二十九年（1764）晋封为豫妃。三十八年（1773）薨。四十年（1775）入葬。

容妃，和卓氏，即香妃，新疆维吾尔族人，其父为回部台吉和札麦。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容妃随父兄入宫，初封贵人。容妃在宫中很受皇帝宠爱，进宫两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封为容嫔。三十年（1765）皇帝第四次南巡，容妃是随驾的几个最宠爱的妃嫔之一。这年十月持节封为容妃。在以后的岁月里，容妃还陪伴皇帝巡游过泰山、曲阜孔庙、盛京祖陵等。每逢容妃生日，皇帝都会为她庆贺摆宴。乾隆帝还赏赐给她许多珍贵的礼物。五十三年（1788）四月，容妃因病在京师西花园逝世。同年九月葬入裕陵妃园寝。

惇妃，汪氏，满洲正白旗人，都统四格之女。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二十八年（1763）十月入宫，封永常在，三十六年（1771）正月晋封为永贵人，十一月册封惇嫔。三十九年（1774）十一月晋封为惇妃。四十年（1775）正月生皇十女，即固伦和孝公主。乾隆帝老年得女自然十分高兴，而且这位公主又是爱妃所生，长得十分俊俏，貌似其父，故惇妃十分受宠。四十三年（1778）惇妃因毒打一名宫女致死，被降为惇嫔并罚银一百两。可是由于乾隆帝十分喜爱惇妃所生公主，不久又恢复了惇妃的名位。嘉庆十一年（1806）惇妃薨。嘉庆十二年（1807）葬入妃园寝。

芳妃，陈氏，陈廷伦之女。乾隆三十一年(1766)封明常在，四十年（1775）晋明贵人。五十九年（1794）册封芳嫔，嘉庆三年（1798）仁宗奉太上皇帝敕旨晋封芳妃，六年（1801）薨。同年十一月入葬。

晋妃，富察氏，主事德克精额之女。高宗时，初入宫，封贵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尊封为晋妃，道光二年（1822）薨，宣宗（道光帝）尊为皇祖晋太妃。三年（1823）入葬妃园寝。晋妃是乾隆帝所有嫔妃中最后逝世的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葬入裕妃园寝的嫔妃。

怡嫔，柏氏，柏士彩之女。乾隆六年（1741）册封怡嫔，二十二年（1757）薨。同年十一月入葬妃园寝。

慎嫔，拜尔噶斯氏，德穆齐赛音察之女。乾隆二十四年（1759）新封伊贵人。二十七年（1762）册封慎嫔。二十九年（1764）薨，三十年（1765）闰二月葬入纯惠皇贵妃园寝。

诚嫔，钮祜禄氏，二等侍卫兼佐领穆克登之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封兰贵人。四十一年（1776）晋封诚嫔。四十九年（1784）入葬。

恭嫔，林氏，拜唐阿佛保之女。初为常在，乾隆十六年（1751）赐号贵人，五十九年（1794）册封恭嫔。嘉庆十年（1805）薨。十二年（1807）入葬。

仪嫔，黄氏，戴敏之女。雍正时，为藩邸格格。十三年（1735）晋封为嫔。乾隆元年（1736）薨，追封仪嫔。由于当时妃园寝尚未建立，其棺椁长年暂安，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才葬入妃园寝。

恂嫔，霍硕特氏，亦作郭氏。台吉乌巴涉之女。乾隆二十四年（1759）封郭常在，二十五年（1760）晋封郭贵人。二十六年(1761)扈从木兰，薨于行在。追封恂嫔。二十七年（1762）随纯惠皇贵妃葬入园寝。

瑞贵人，索绰络氏，礼部尚书德保之女。初为瑞贵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入葬纯惠皇贵妃园寝。

鄂贵人，西林觉罗氏，巡抚鄂乐舜之女。乾隆十五年（1750）封为常在。五十九年（1794）赐号为鄂贵人。嘉庆时尊封为鄂太贵人。十三年（1808）卒。十四年（1809）入葬裕陵妃园寝。

寿贵人，柏氏，乾隆二十九年（1764）封为常在，五十九年（1794）进封为寿贵人，嘉庆时尊为寿太贵人。十四年(1809)二月卒。三月葬裕陵妃园寝。

白贵人，乾隆十五年（1750）时，称白常在，五十九年（1794）封为白贵人。嘉庆十年（1805）葬入裕陵妃园寝。

金贵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封为金常在，四十二年（1777）封金贵人。四十三年（1778）入葬纯惠皇贵妃园寝。

武贵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封武常在，四十五年（1780）为武贵人，四十九年（1784）葬入纯惠皇贵妃园寝。

新贵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封新常在，四十九年（1784）葬入纯惠皇贵妃园寝。

福贵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封福常在，三十年（1765）葬于纯惠皇贵妃园寝。

秀贵人，乾隆十年（1745）薨，十七年（1752）与仪嫔等人第一批葬入妃衙门。

顺贵人，钮祜禄氏，总督爱必达之女。乾隆十三年（1748）生，三十一年（1766）进宫，初

封常贵人。三十三年（1768）册封顺嫔。四十一年（1776）晋封顺妃。四十四年（1779）行册封礼。五十三年（1788）顺妃降为贵人，同年十二月葬纯惠皇贵妃园寝。

陆贵人，亦名禄贵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封禄常在，四十年（1775）时晋封禄贵人，五十三年（1788）葬入纯惠皇贵妃园寝。

慎贵人，乾隆十五年（1750）封为慎贵人，四十二年（1777）入葬纯惠皇贵妃园寝。

张常在，乾隆十年（1745）薨，十七年（1752）首批入葬妃衙门。

宁常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封宁常在，四十九年（1784）葬入纯惠皇贵妃园寝。

揆常在，乾隆十五年（1750）封为常在，二十二年（1757）入葬纯惠皇贵妃园寝。

平常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封平常在，四十三年（1778）入葬纯惠皇贵妃园寝。

二、妃园寝建筑规制

裕陵妃园寝坐北朝南。其建筑布局由南往北依次为马槽沟一道，其上建有一座一孔石拱桥，以青白石构成，桥面为五路条石，桥下有拱券一座。桥长15.38米，宽4.35米。桥孔宽2.50米，进深3.91米。望柱面宽0.27米，通高1.46米。栏板面宽1.48米，高0.82米，厚0.20米。地伏石宽0.35米，高0.18米[④]。该桥保存基本完好。拱桥东侧有一座豆渣石平桥，下有桥洞三孔。桥长9.65米，宽3.30米。该桥栏板不全，其余保存较好。桥北面建有一条用砖铺砌的甬道。东西厢房为布瓦硬山顶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一间。用途、建筑形式均与景陵贵妃园寝相同。东西厢房早年均已被毁。1979年清理遗址，台明石活归安，现仅存台明。台明面阔17.75米，进深7.05米[⑤]。在厢房的北面，建有东西值班房各一座，为单檐硬山卷棚顶，面阔三间，为8.58米，进深一间，为4.14米。后院面阔8.68米，进深2.95米。东西值班房早年被毁，仅存遗址。1979年11月至12月清东陵文管所清理废墟，复建了两座班房。重建后的班房改为水泥地面，前檐改为玻璃窗、玻璃门[⑥]。妃园寝宫门，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单檐歇山顶，上覆绿色琉璃瓦。宫门面阔13.90米，进深10.60米。宫门前有一座月台，面阔15.88米，进深5.82米，高0.80米。月台前有一座用青白石砌成的礓磋[⑦]。

在宫门左侧建有一座焚帛炉，为单檐歇山顶，上覆绿色琉璃瓦。焚帛炉面阔2.98米，进深2.09米。现保存较好[⑧]。

乾隆二十五年（1760）大规模改建妃园寝。增建明楼、方城、东西配殿，在享殿前增加月台，改建园寝门等。改建工程始于乾隆二十五年，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竣工，直接动用白银134004.303两。另外从京师领取的铜、铁、铅、颜料、琉璃瓦料等共计合银22938余两。

增建的两座配殿建筑形式相同，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均为单檐歇山顶建筑，面阔（各至两山外皮）17.68米，进深7.77米。台明面阔18.50米，进深9.10米，高0.65米。前设走廊，廊内金砖边长0.52米[⑨]。东配殿为存放祝板、制帛的地方，当享殿维修时，又是临时的祭祀场所；西配殿为祭祀时，喇嘛念经，为死者超度亡灵的地方。目前西配殿除部分琉璃构件不全外，保存基本完好。东配殿因残破严重，经河北省文化厅批准，实行落架保护。现仅存台明。20世纪70年代末对西配殿进行了修缮，现保存完好[⑩]。

妃园寝院内正中建有一座享殿，建筑形式与一般妃园寝相同，面阔五间，为23.48米，进深三间，为11.82米。台明面阔24.48米，进深12.89米，高0.81米。单檐歇山顶式。殿内有暖阁三间，内原供奉神牌。中暖阁供奉纯惠皇贵妃、庆恭皇贵妃、愉贵妃、忻贵妃、循贵妃的神牌。东暖阁内供奉颖贵妃、豫妃、容妃、惇妃的神牌。西暖阁供奉婉贵妃、舒妃、芳妃、晋妃的神牌。暖阁早年被毁。中暖阁内须弥座面阔2.75米，进深1.45米，高0.40米。东西暖阁须弥座尺寸与中暖阁相同。享殿前有城砖铺砌的月台，面阔13.36米，进深6.63米，高0.64米。1980年对享殿进行了复原修缮，目前保存完好[⑪]。

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建妃园寝时，还将三座园寝门及两边的面阔墙拆除，改建到享殿两旁建卡子墙，设园寝门。两座园寝门规制相同。园寝门门洞面阔3.07米，进深2.92米。门前月台面阔7.12米，进深1.62米，高0.62米[⑫]。后院的前部正中增建方城一座，面阔（南面须弥座圭角）12.66米。月台面阔15.30米，进深3.95米，高3.10米[⑬]。方城上建明楼一座，为单檐歇山顶式，上覆绿色琉璃瓦。明楼内竖碑一通，碑身宽1.12米，厚0.55米，高2.93米[⑭]。上涂红朱砂。碑额题“大清”字样，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碑阳面刻“纯惠皇贵妃园寝”字样，也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汉字楷体居左（东），满文在右（西）。碑阴无字。碑座面阔1.66米，进深0.72米，高0.94米[⑮]。碑

座为须弥座形状。上枋前后刻“二龙戏珠”，下枋刻杂宝，上下枭刻仰伏莲花瓣。明楼因早年残破，被拆除顶部。80年代初期，对明楼顶部进行了复原，现保存完好。在方城后面，仿帝后陵规制，增建大宝顶一座，环以带雉堞的宝城，园寝后院宝城北面及东西两侧，建有三十四座圆形的宝顶，四面以宇墙环绕，宇墙高1.00米，厚0.45米，挑头沟咀长1.27米[16]。宇墙上覆绿琉璃瓦。宝顶用三合土夯制而成。前面的宝顶经过维修，保存较好。后面宝顶上的红泥大部分脱落，已露出城砖。

裕妃园寝的地宫类型，和其它妃园寝的地宫类型一样，可分为四种，即皇贵妃型、妃型、嫔型、常在型。纯惠皇贵妃地宫是裕陵妃园寝中规制最高的一座。1982年初开始清理纯惠皇贵妃地宫，该地宫位于最前排正中，整个地宫由墓道券、闪当券、罩门券、门洞券、梓券、金券组成。墓道券和闪当券为砖券，其余为石券。墓道长14.46米，宽2.73米，高4.20米。地面铺青白石。棺床为石质。石床上有两具棺木，居中的为纯惠皇贵妃的内棺，左侧是乌喇那拉皇后的棺椁。两具棺木，均北向。如今纯惠皇贵妃只有内棺，无外椁。内棺前高1.25米，后高1.18米，前宽1.25米，后宽1.20米，全长2.15米。乌喇那拉皇后棺椁俱存，外椁前高1.60米，后高1.58米，前宽1.40米，后宽1.35米，全长2.50米。两具棺木皆残破严重[17]。（图2）



图2　纯惠皇贵妃地宫

容妃地宫位于裕妃园寝前排第二排东数第一座宝顶下，该地宫在1945年以后，被土匪盗掘。1979年10月地宫盗口（踏跺）塌陷，当时清东陵文物保管所派出专门人员，随即清理了香妃地宫。该地宫由罩门券、石门、门洞券、梓券、金券组成。棺床为艾叶青石，容妃棺木居于宝床正中。清理时发现有椁无棺，椁的一侧被盗匪砍成一个长方形洞，椁的前后各有一块卡棺石。石椁前高1.53米，后高1.43米，前宽1.30米，后宽1.25米，长2.53米[18]（不包括葫芦）。在地宫中还发现了香妃的头骨、牙齿、发辫、哈达残片和其他丝织残片，及各色宝石、猫眼石、珍珠等。通过对棺头所书回文古兰经及头骨前额突出的鉴定，证实了容妃就是香妃，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1982年5月，容妃地宫与纯惠贵妃地宫，同时对外开放。（图3）



图3　容妃地宫

裕妃园寝早在1929年就曾被盗，其中本园寝中地位最高的纯惠皇贵妃地宫被盗。地宫内两具棺椁被砸毁，尸骨凌乱，珍贵随葬品已全被掠走。1945年至1949年裕妃园寝屡次发生盗案，三十几座宝顶几乎全部被盗掘，并多次被扫仓，珍贵文物已荡然无存[19]。光绪本《清会典事例》卷九四九记载裕陵妃园寝的规制为：“琉璃花门二座，广一丈八尺，纵九尺，檐高一丈一尺；正中飨殿一座，广六丈七尺七寸，纵三丈五尺三寸，檐高一丈五尺二寸；两庑各五间，广五丈一尺五寸，纵二丈二尺四寸，檐高一丈三尺五寸；东有燎炉一座，广九尺三寸，纵六尺五寸，高八尺六寸；南正中大门三，广三丈三尺八寸，纵二丈七尺二寸，檐高一丈三尺八寸；门外设左右班房，东西厢各五间，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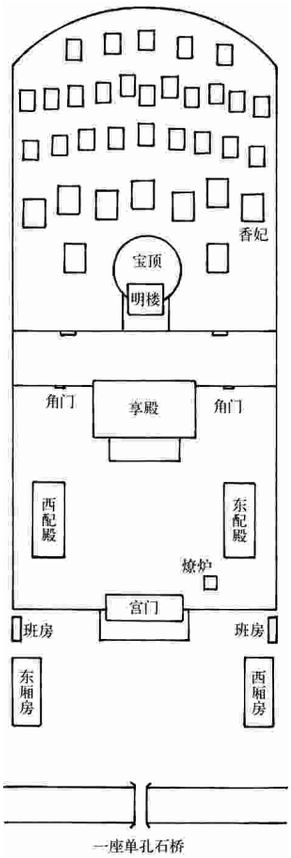


图4　裕陵妃园寝平面示意图

丈一尺，纵一丈七尺三寸，檐高一丈；前有一洞石桥一座，围墙周长一百三十丈六尺，高一丈四尺。”（图 4）

三、妃园寝建筑特点

1、标准规制的妃园寝，不建方城、明楼，而这座妃园寝仿照景陵皇贵妃园寝规制，在其后院正中增建了方城、单檐歇山顶的明楼。

2、标准规制的妃园寝，在享殿后设园寝门三座，中门带门楼，两旁门为随墙角门，而这座妃园寝却仿照昭西陵的做法，将园寝门改建在享殿两旁。这是清代第一座将园寝门建在大殿两旁的妃园寝，对后来的妃园寝布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标准规制的妃园寝，不建东、西配殿，而这座妃园寝仿照景陵皇贵妃园寝规制，建了东、西配殿，都是面阔五间，比昌陵、慕陵、慕东陵的三间配殿规模还大。

4、标准规制的妃园寝，宝顶建在园寝门后面的长方形砖石月台上，而这座妃园寝仿照皇后陵规制，在方城后面，增建大宝顶一座，环以带雉堞的宝城，它大大超过了标准规制的妃园寝，仅次于景陵双妃园寝。

5、裕陵妃园寝宝顶排列顺序混乱。清代后妃等级森严，她们死后，应按等级高低，在园寝内排好位置，可穴位划定之初，是按照当时后妃等级的顺序排列的，等过了若干年后，其顺序可能发生变化，有的升级了，有的降级了，但是当初划定的穴位却不易更改，尤其是已经死去多年的后妃，就更不好更改了。如第二排中，舒妃的位置高于西侧的愉贵妃、循贵妃。按等级愉贵妃、循贵妃都比舒妃高，可是舒妃死得最早，她死于乾隆四十二年，而愉贵妃死于乾隆五十七年，循贵妃死得更晚，她死于嘉庆二年。所以先入妃园寝的舒妃之穴当然高于愉贵妃、循贵妃，这样才出现了等级高的位置低于等级低的位置的现象。

裕陵妃园寝是一座规制较高的妃园寝，它反映了清朝社会的历史、思想、文化、艺术及民俗，对于研究清代的建筑史、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及清代的宫廷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有许多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传说、故事，作为著名旅游圣地清东陵的一部分，它以自己的独特之处，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参观游览。

---

①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4 页。

②李寅：《清东陵揭秘》，第 125 页，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

③宴子有：《清东西陵》，第 325、326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版。

④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6 页。

⑤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7、8 页。

⑥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9、10 页。

⑦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11 页。

⑧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12 页。

⑨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14 页。

⑩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14、15 页。

⑪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16、17 页。

⑫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18 页。

⑬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20 页。

⑭⑮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22 页。

⑯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23 页。

⑰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31 页。

⑱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清东陵—裕陵妃园寝记录档案，第 32 页。

⑲李寅：《清东陵揭秘》，第 132 页、133 页。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摄影：郭力展）

北京民俗博物馆馆藏丧俗文书

李彩萍

丧葬礼俗是人生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生的终点。《礼记·曲礼下》载：“人死为大，丧之以礼”，可见丧葬礼仪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俗中，人们的基本思想之一，就是“不死其亲”，即不把死去的人当成亡人，而是把它当成灵魂和肉体仍存在的“活人”。[①]为了表达这种灵魂不灭的思想，便出现了很多繁琐的丧礼程式。这种程式既要让死去的人安宁，也要让活着的人满意，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其所表现出来的一是“孝”，二是“敬”，即念祖怀亲的情结。通过这些程式规范人们代际之间的联系，以此提供一个社会性的情感纽带，从而促进社会治理。[②]伴随着丧葬程式产生了很多相关的各类丧俗文书。如讣闻、祭文、哀启、路引、殃榜、墓地图、礼单、超度文书等等。北京民俗博物馆收藏了一批清末民国时期的丧葬文书。通过这些文书不仅能够了解当时的丧葬习俗，也能够揭示中国人生死观深层的文化内涵。

一、报丧仪程——讣告

1、讣告的含义

讣告是把某人不幸去世的消息通知其亲属、好友和有关方面的一种公告式文书。它是人死后的第一种程式。讣告又称“讣闻”、“讣文”、“讣帖”。讣：告丧、报丧的意思。讣，《说文》作“赴”。古代的“赴”即跑、奔。古人报丧重在奔跑与急速。

报丧仪式最早见于《礼记·杂记》：“凡讣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左传·隐公七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赴、讣音同。讣告的目的，一是邀死者的生前亲友前来与死者“见最后一面”；二是邀他们前来襄助丧事。另外，在古代亦有为了使丧事公开化以此证明死者确系“正常死亡”的意思等等。

2、讣告的格式

讣闻一般以书札的形式，有一套固定的文辞，比较严格。内容一般介绍亡人生前的官衔、品级。大体如“不孝某某罪孽深重，弗自殒灭，祸延显考某大夫，其府君，恸于某年月日时终正寝，距生于某年月日时，享寿若干岁，不孝某某侍在侧，亲视含殓，遵礼成服。”[③]最后写上“叨在：乡、学、世、寅、戚、谊”（红字）字样，结尾写“哀此讣闻，某日接三，某日唪经。”最后要在讣告结尾写上“孤子某某泣血稽颡”[④]之类的文字，再列上丧礼日程，下面依次开列子孙成服的名单。讣闻一般的形式是一个大折子，有白色、烟色、黄色。字体为大宋扁体，折面仅有讣字，翻篇才是正文，自左至右竖写，无标点，外用封套，下款为丧居地址。清代讣闻多出自士大夫之手，措词考究，民国时期这项业务由刻字铺来承担。旧时的北京鼓楼前的地安门外大街云林阁刻字铺[⑤]即是专为红白喜事刻写请帖、讣闻的铺面。

3、讣告中的成服礼俗

大户人家的讣告在结尾都要列具成服的顺序，以示区别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丧服制度的核心是“五服”。“五服”源于西周的宗法制。根据儒家经典《仪礼·丧服》载有以下五等孝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斩衰”是最重的孝服。子、未嫁女为父、承重孙（父为嫡长子，已死，嫡长孙为承重孙）为祖父，妻妾为夫，服斩衰。服期三年。“衰”是指丧服中披于胸前的上衣，下衣则叫作裳。斩衰上衣下裳都用最粗的生麻布制成，左右衣旁和下边下缝，使断处外露，以表示未经修饰，所以叫做斩衰。“衰”是指不缝缉的意思。

“齐衰”是次重孝服，用本色粗生麻布制成、缉边。子、未嫁女为母，承重孙为祖母，服齐衰三年。已嫁女为父，孙为祖父母，夫为妻，为叔伯父母、兄弟，出嗣之子为生父母，妇为舅姑，妾为妻，

服齐衰一年。重孙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五个月，玄孙为高祖父母服三个月。

“大功”是轻于“齐衰”的丧服，为伯叔父母、为堂兄弟、未嫁的堂姐妹、已嫁的姑、姐妹、已嫁女为母亲、伯叔父、兄弟等，服期九个月。丧服以熟麻布制作。

“小功”是轻于“大功”的丧服，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姐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未嫁从堂姐妹，和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妯娌等。服期五个月。丧服以较细的熟麻布制作。

“缌麻”是最轻的孝服，为本宗的高祖父母、族伯父母、族兄弟姐妹、未嫁族姐妹和外姓中为表兄弟、岳父母穿孝都用这个档次。以细麻布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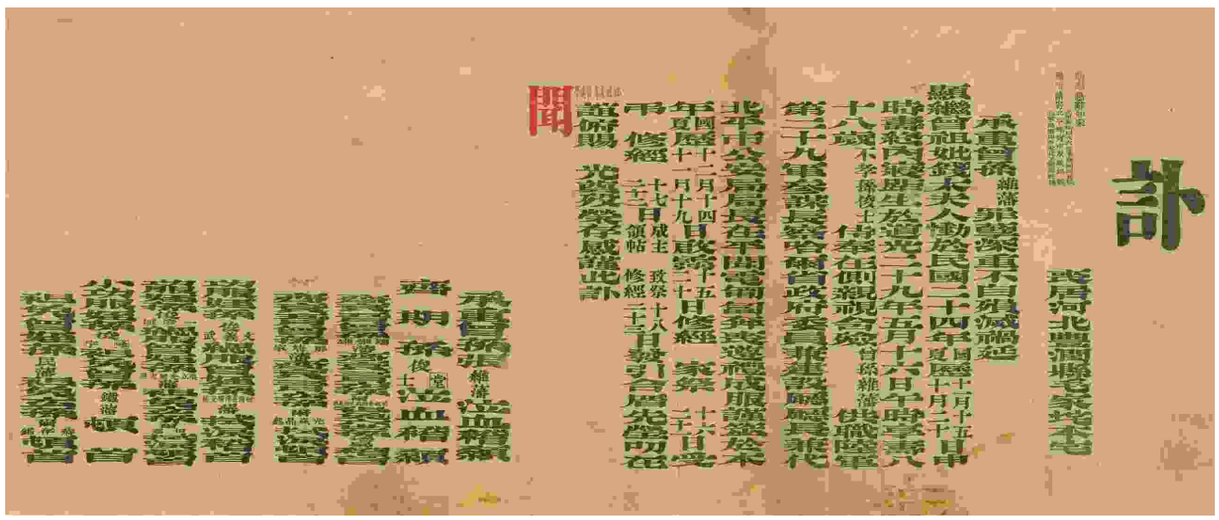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为“袒免”。《礼记 · 大传》说，为五世之外的亲族“袒免”。“袒”，是袒露左肩；“免”，指不戴冠，用布带缚髻。凡五服以外的远亲，因无丧服之制，只好袒免，以示悲戚哀恸之情。

五服不仅标明了亲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也约定俗成地规定了亲族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什么样关系的人穿什么样的孝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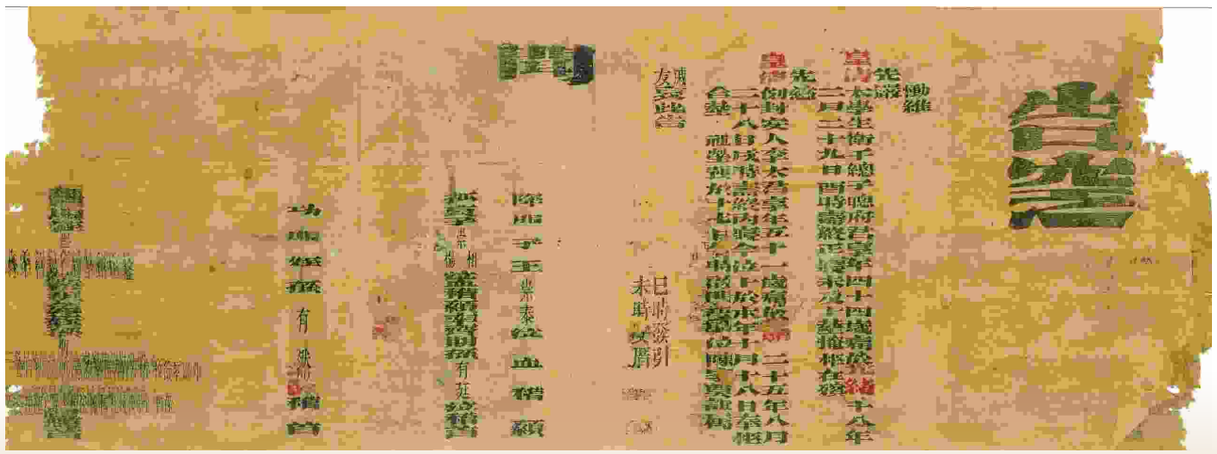
样式一：民国二十四年（1935）讣闻文书（图一）

该讣闻长 107 厘米，宽 44 厘米，讣告为铅印宋体，颜色为淡烟色。封面一个大“讣”字。启文格式为“鼎惠恳辞如蒙”，上面的一列竖写小字告诉了奔丧者的住址、吊唁通讯地址。下款为“丧居河北丰润县毛家坨本宅”。正文的格式比较正规。除对丧者进行简单的介绍之外，也介绍了奔丧者的官衔、职位。告知亲朋、好友，启灵、修经、家祭、成主、发引、合茔等具体时间。文中提到寿终内寝，说明是女性，如果是寿终正寝则为男性。文中用红字书写的乡、戚、友、年、世、寅，意为“同乡、亲戚、朋友、世交、同僚、同学”等。最后开列子孙成服的名单，齐衰期服孙 ××，大功服 ××，……。用黑框框起来说明是已故者。

样式二：民国三十六年（1947）合葬讣告（图二）



图一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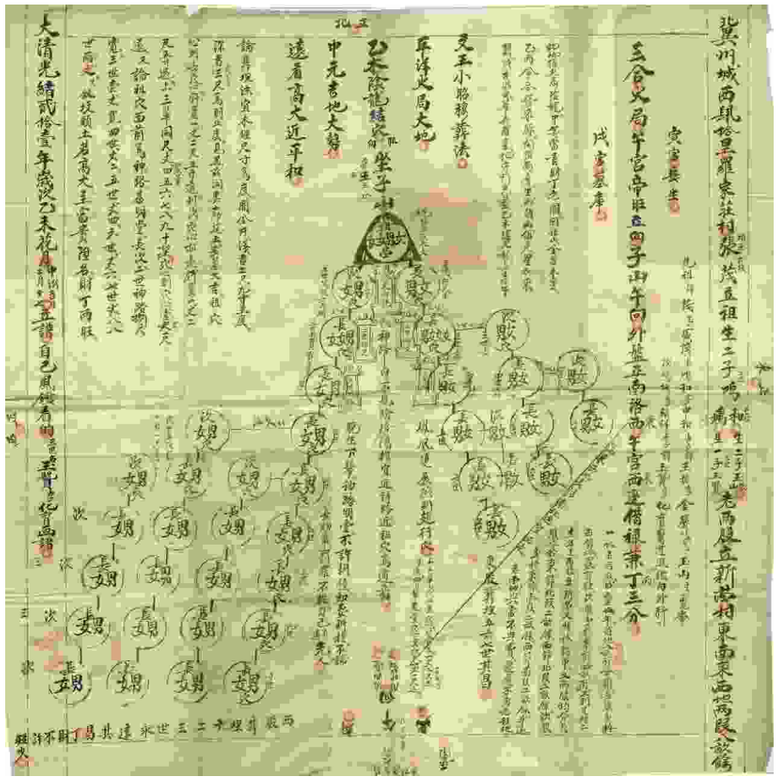
该讣告是一件合葬文书，封面为“告窆”两个大字。“窆”是下葬之意。长 67 厘米 ，宽 26 厘米，黄颜色。“先严”指其父亲，“先慈”指其母亲。父亲在光绪十八年就去世，几年之后母亲去世，又于民国三十六年把二位合葬在祖坟中，文中告知亲朋、好友合葬、祭奠、发引的时间。

二、择墓仪程——墓谱图、殃书

1、光绪二十一年（1895）墓谱图（图三）

人逝去之后，坟墓成为死者的“生活场所”。人们对于墓地的选择、营建以及日后的维护等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传统社会中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族、家庭，或自己筹划，或同子女商量为自己准备墓地，以应不时之需。

该墓谱是清光绪二十一年河北冀州张茂家茔。长 70 厘米，宽 70 厘米，高丽纸手书，包括墓主名讳、葬式、葬法、方位、道路、四至界地、埋葬次第、禁忌等内容。最后用画图的方法排列了长幼男女埋葬排列顺序。从墓谱图的这个结构来看，内容很丰富，把前世、现时和来世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家族是一个非常有秩序、和睦的家族。一般的墓谱图主要是堪舆山、水、土、穴、砂，四至方位等内容，这张墓谱图有点遗嘱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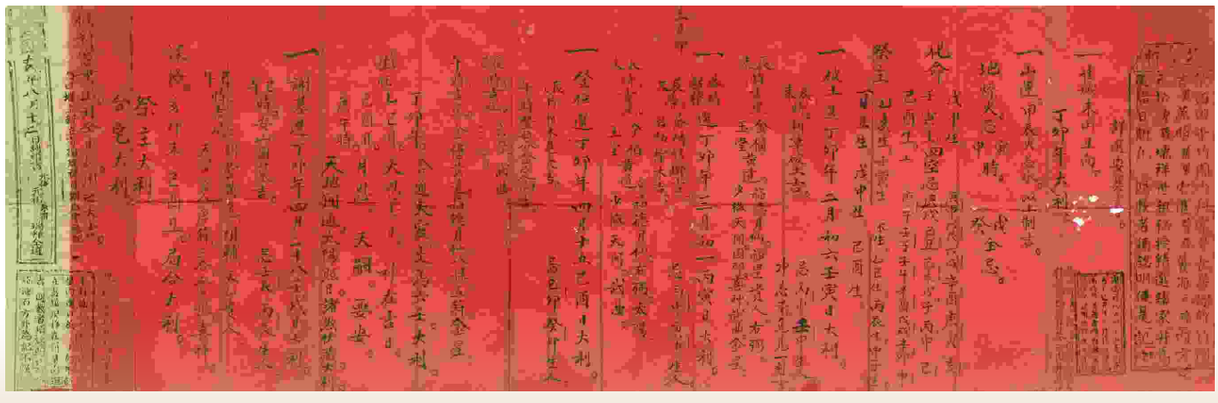
图三

2、殃书

所谓“殃书”，也称做“殃榜”，作为办理丧事的时刻、方位、禁忌等方面的依据。[6]传统社会中，民间普遍认为，家里死了人是“人生最大的不吉利”，为了躲避这样的凶变，也为了后代的兴旺发达，子孙平安，家人在办理丧事前，要请阴阳先生进行各方面的观测，并开具“殃榜”。

样式：民国十年(1921)殃书(图四)

该文书长 73 厘米，宽 24 厘米，是民国十年谢维吉家所用。文书前为序，告知“世祖秘授精选，诸家造福，赐教者须认明便是”。后面主要对山运、火期、化命、祭主、破土、落砖、移棺、谢墓等方面，根据天干、地支进行了认真的时间上的勘探、推算，以此来选择吉日。一般情况下这些日期的定夺都是由家人事先定好，如果不犯大忌，阴阳先生就不做更动了，如果推测有问题，在时刻上稍有改动。在文中的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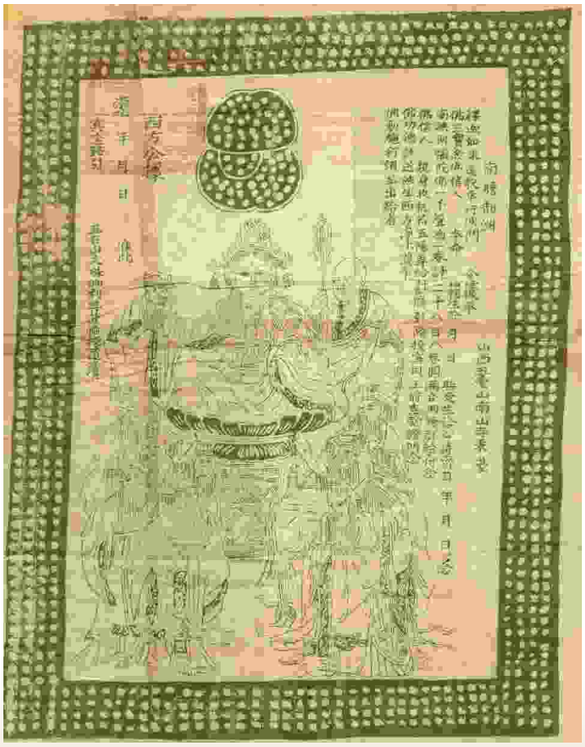


图四



图五

均有方框，内有字迹，但已模糊不清。旧京各城头均有阴阳术行业。如北土城胡同一善堂王、西城翠花横街下坡伯寿堂俞等[7]。



图六

三、成主仪程——木主牌位

成主也叫点主、题主。是丧葬中的一项比较重要的仪程。所谓“主”，也就是神主、牌位，因为是木头做的，也称“木主”。 建立木主牌位目的是为了让死者的神魂依附于上，留给后代奉祀。这一习俗起于何时，据《史记·伯夷列传》载：“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说明在周代就已经有了给先人建立木主之举。又《清通礼·凶礼·官员丧礼》载：“葬之日，择宗亲善书者一人题主。”可见题主是清代丧礼的通则。成主多是与家族的宗法有关，传统的家族都有祠堂，祖先的牌位是靠成主这一仪式确定的，明确了宗法关系，也涉及到“慎终追远”的大事，所以比较隆重。点主要选择日期举行仪式，一般要请死者生前的好友或是和尚、有名望的人，一般牌位上要写“显考某公讳某某府王之位”的“王”字上面请点主官加一朱点，成为主字。经过点主之后生者认为死者可以早日超生。在丧礼中，点主算是喜事，所以孝子们要脱掉丧服换成吉服。[8]点主的过程很复杂，礼数讲究，比如研墨、研银朱、备鸡血、讲经书、三拜九叩、致词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该主牌（图五）是普通的木制作，长 26 厘米，宽 6 厘米，下面是一个方形座，座中间有槽，分内函、外函两部分。

此主牌为男性所用，显考：父死曰 “显考”。如果是女性则是“某公配某封某氏某之神主”。内外函木主是用白粉涂刷，故也称“粉面”。在两函神主的 “主”字上面的点是用鸡血点成。为什么用鸡血，有说是鸡与吉谐音，有说是鸡血辟邪，大概是一种心理的安慰。该主牌为普通的木主牌，没有雕花镂空，讲究人家是楠木或是檀香木制作，下面是须弥座，前脸还有雕花栏杆，座上才是牌位，外面套带有雕孔的立罩。[9]

四、祭祀仪程——路引、百日祭文

1、路引

在北方的一些宗教的亡灵世界里，亡灵的“回归”需要有人的帮助和指导，试图给死者提供一张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通行证，以便让他平安顺利地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生”。但是茫茫的阴间，从哪里走呢？于是由活着的人来给他“指路”。“指路”就是为鬼魂指引升天的道路。

这是一张木刻印刷的路引（图六），可能是为

念佛的信人所用，其文辞是事先按照一定的体例和格式印制好的，落款为崇祯 × 年 × 月 × 日，盖有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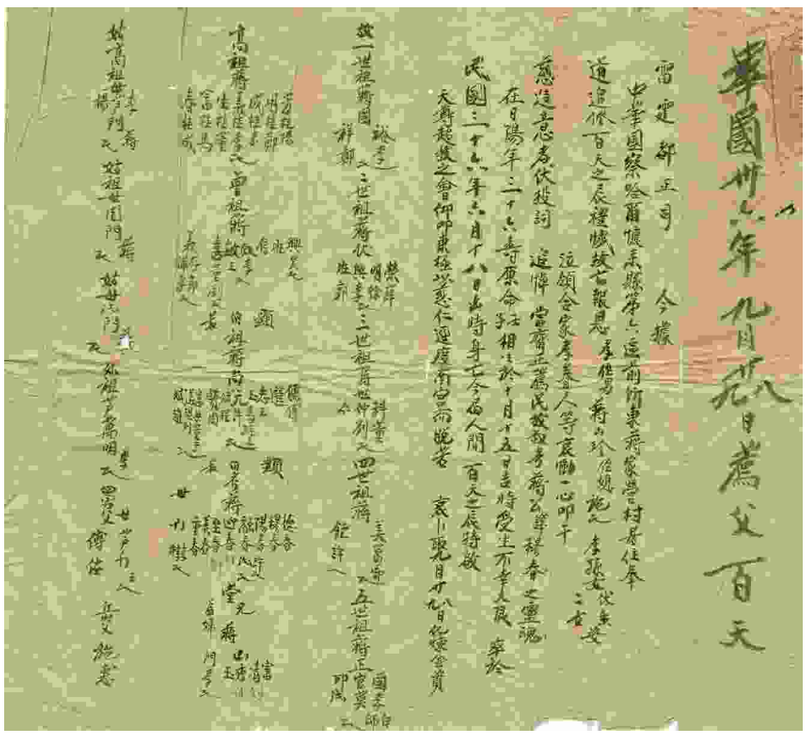
2、百日祭文

祭祀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比如七七、百日、周年祭墓，来表达心中的哀思。祭文有很多的名称如“行香文”（用于国忌日）、“亡文”（通称，祭父为亡考文，祭小孩为亡孩文）、“忌日文”（主要是祭辰日如七七、百日等）。还有一种为“亡斋文”，也称“追福文”⑩。它是在佛事做道场上出现的。下面这幅百日祭文（图七）就属于此类，是丧家追修百天的祭文。

该祭文出自于民间之手，行文和字体不是十分的讲究，长 53 厘米，宽 50 厘米，是侄子及全家做的。另外在最后列具了所有亡去祖先的名称，在祭祀亡人百天的时候也不忘记对所有先人的祭祀。

丧葬习俗内容广博丰富，精华与糟粕并存，丧葬文书多种多样，形式各不相同。通过这些丧葬文书的探究，可以了解传统丧葬礼俗的文化内涵，通过了解丧葬习俗的各种仪程，可以了解失去亲人后的心理表现过程。对于文书的研究，其社会价值和其反映的人的心理需求主要表现在：一、永恒的观念。其实每种仪程，都希望自己的亲人或崇敬的人永远不逝。这种观念是原始人以“灵魂不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不管是墓谱，还是牌主、祭文，在活者的心中通过这种规划、祭拜、祭祀，使心灵得到安慰，并且要不断的传福祉与后人，使子子孙孙兴旺发达以实现自己的生命永恒。二、孝道观念。孝道文化在文书中也是随处可见。比如殃书：把山运、火期、化命、祭主、破土、落砖、移棺、谢墓进行了认真的时间上的勘探，尽管在今天看来有些迷信，但能够看得出，活着的人为失去的亲人是何等精心细致的操办，这个过程表达了人们怎样的情感世界。“路引”是为了亲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制造畅行无阻的通行证，生的世界就是一个艰难的世界，有各种难关和苦难，需要通过各种形式才能得到圆满的结局。路引就是死亡之后的通行证。表现活着的人“孝”到了极致。三、家族观念。通过丧葬仪程礼节，墓谱中图序从祖代排列到今人，像一个金字塔，非常有秩序。人们按照这样的排序规矩，一辈一辈的传下去，不仅规范了家族、家庭的秩序，也使得家族更加和谐，家族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丰富，丧葬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在相应的发生变化，通过每一个仪程的了解，并从理论上分析它们，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全面理解死亡文化，也为我们认识文明社会提供了更好的窗口。



图七

①谢洪欣：《〈金瓶梅词话〉葬前礼俗考察》，《民俗研究》2007 年第 4 期。

②王夫子：《殡葬文化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6 月第 1 版。

③④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 2 月。

⑤⑥⑦⑧常人春：《红白喜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年 6 月第 2 版。

⑨陈华问：《丧葬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⑩雷绍锋、张俊超：《丧葬习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3 月第 1 版。

（作者为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万寿寺行宫及其文化遗产

孔祥利

始创于明万历五年（1577）、坐落在京西北长河岸边的万寿寺，不仅以恢弘的寺院建筑规模著称，更以其具有壮观的行宫建筑群于寺院一侧而为世人瞩目。建于清代的万寿寺行宫，其兴建与发展同寺院的兴衰紧密相连，也与清皇室的巡幸文化、祈寿文化紧密相关。研究万寿寺行宫兴建与发展的历史渊源，揭示这些文化联系的内涵，也有利于挖掘万寿寺文化遗产，也有利于万寿寺行宫的保护和利用。

一、行宫兴建体现的皇家巡幸文化

万寿寺在明代即出现皇族驻跸活动的记载。据记载，万历十六年（1588），明神宗曾在寺院假山用膳。《长安客话》载：万寿寺假山“上曾于此尚食，不敢启视。”[①]这是万历皇帝去巡视他的寝宫时在万寿寺驻跸的记录，也是万寿寺最早具有的皇帝巡行记录。

万寿寺当时的假山及后花园所行使的功能之一就是为皇家驻跸服务。万寿寺的假山以及寺后的果园所构成的园林景观是供皇族巡幸时休憩的最佳理想场所。据记载，当时的假山由三座具有佛山道场象征意义的山石构成，山上分别坐落代表在此说法的菩萨殿：观音、普贤、文殊。山下有四个水池环绕，山后有亭榭连接水池。假山之后是广阔的果园，种植多种珍贵植物和果树。这种寺院内的园林式建筑景观，具有很好的实用观赏性。而在寺院中建立这种景观的目的，无疑是为皇家巡幸服务。所以它本身的作用具有了行宫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皇家巡行时游乐的需求。在明代大学士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文》中即可见当时明确的记录：万寿寺“中为大延寿殿五楹，旁列罗汉殿各九楹，前为钟鼓楼、天王殿，后为藏经阁，高广如殿，左右为韦驮、达摩殿各三楹。修檐交属，方丈庖湢具列。又后为石山，山之上为观音像，下为禅堂、文殊、普贤殿。山前为池三，后为亭池各一。最后果园一顷，标以杂树，琪株璇果旁启，外环以护寺地四顷有奇。”[②]为什么在碑文中要描述寺后的果园情景呢？这种景象显然不是寺院随意的装饰和布置，而是一种特意的规划。后来万历皇帝的巡幸以及在假山上的用膳活动说明了这一点。可见早在明代万寿寺就开始实施了与皇家巡幸文化相关的建设。当时虽无行宫建筑之形，但是已具有行宫功能之实。实际上，万寿寺从兴建之始，就与皇家的巡幸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代行宫的兴建是明代万寿寺作为皇家驻跸地功能延续的表现。因为清皇室更注重行宫建设，所以皇家驻跸功能进一步体现在实体上面。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直到康熙年间，才有精力和实力在京郊营建离宫别馆。营建离宫是清皇族巡行皇宫之外的建筑活动惯例，也是政权稳定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皇室的巡幸活动才有可能在京西北进行。这个时期清皇室在京西北的建设便以畅春园的建设为中心展开。

作为崇奉佛教特别突出的清皇族，清世祖于顺治二年（1645）即赐予皇家寺院万寿寺新的寺匾。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取代旧皇朝的行为，也是必然之举，因为万寿寺毕竟是皇家寺院。然而在顺治十一年（1654）万寿寺却惨遭火灾重创，仅余残垣断壁。清初学者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这样记述：“寺乃万历初所造，为母氏祝禧，最为巨丽。己亥二月，余在退谷，寺僧报夜毁于火。”其所作诗赋称：“丹垩尚焕烨，俄惊劫火红。形骸原土木，焦烂倾西东。”[③]其描述反映当时寺院已经残破不堪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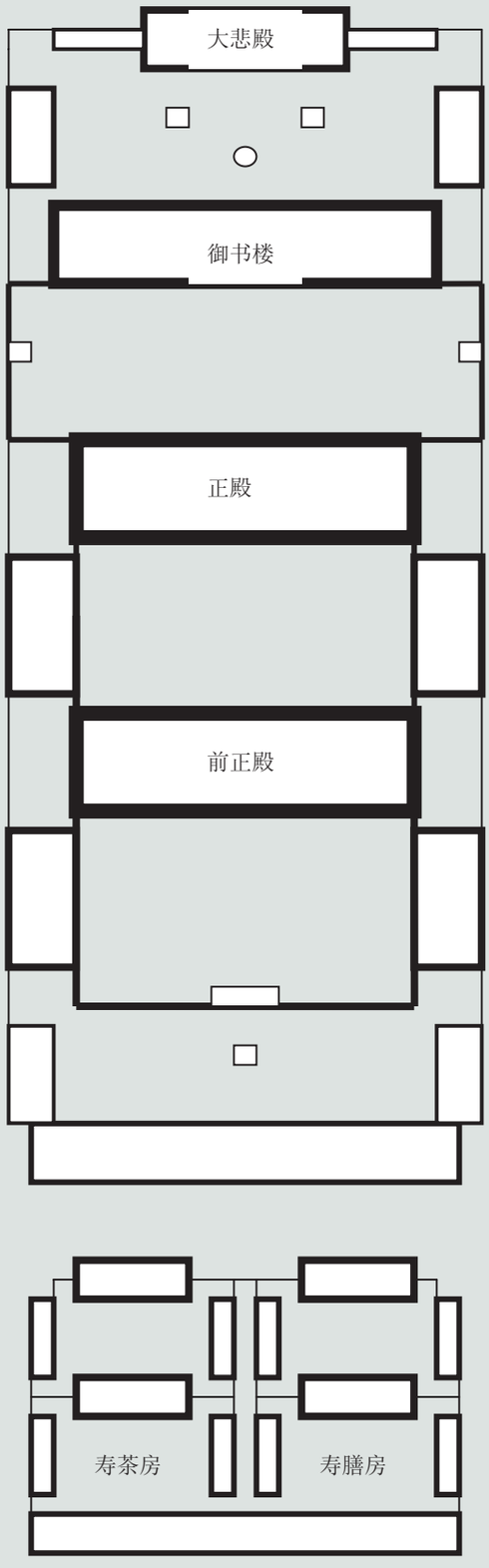
万寿寺遭遇火焚后，顺治皇帝数年后也去世，所以万寿寺难以在顺治年间修复。康熙初年，皇族还没有精力去营建离宫的时候，一座皇家寺院的荒废也更不是皇族所能关注的。直至康熙皇帝登基二十余年后，国家政权得到了稳固，内忧外患得到了解决，清圣祖才开始着手营建京西北皇家御园。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京西北的皇家建筑群才会得到皇族的重视和关注。

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首选万泉河水系一带来营建畅春园。按照清皇室巡幸的惯例，在往返离宫的途中要建设行宫、行殿，作为休憩之所。从畅春园向南返宫路途中建有一条土路直达万寿寺，此街由万寿寺得名万寿街。此街南端抵达长河，其东侧即为万寿寺。从畅春园顺此路南行至万寿寺，恰好所行路程是西直门出城后的大约一半，对于长途跋涉的皇族来说，此时有一处行宫作为歇息之所是必要的。万寿寺作为皇家敕建寺院，皇族于此建立行宫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可见，万寿寺的地理位置在行宫建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修缮畅春园离宫的同时，对其外围的环境进行修整当然是必要的。万寿寺作为行宫地点的选择，使它列入了修缮工程之列。故在康熙二十五年畅春园修缮工程启动之时，万寿寺得到皇室的重修和扩建。据乾隆初年大臣励宗万的调查报告《京城古迹考》所载，“寺院殿宇九层，庄严色相，巍焕如新。”[④]当时修建之后的万寿寺中路有九层殿宇，这与明代所记载的五进院落不同，增加了两进院落。寺院不仅得到重修，而且得到扩建。寺院的重修和扩建，不仅是对佛教寺院的尊崇表现，而且也是皇族建立行宫的需要。

康熙朝对万寿寺的改造实际上就是对寺院原有园林景观设施的改造。明代万寿寺以最后的假山和寺后果园作为接待皇室成员游兴的场所，清皇室则一改前朝的做法，将寺后园林景观作为寺内一景，更向后扩展寺院二进院。由于假山地区作为园林功能的减弱，假山周围的水池也由此被掩埋，两侧则建有配殿长廊，假山后建佛殿三重。而行宫则建于寺院西侧，以示更为隆重实用。行宫附在一座皇家寺院一侧，是皇家尊贵的需要，也是恩泽于佛祖的祈求。这个时期行宫在寺院西侧的出现，规模还比较小，仅为一个行殿院落。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万寿寺皇室驻跸功能有了从形到实的转变。

万寿寺的重建、扩建以及行殿的增建举措，实际上就是清皇室离宫建设的外围工程。从万寿



万寿寺行宫建筑示意图

寺增辟行殿的那一时期起，万寿寺这座皇家寺院的兴衰就与皇室御园的建设休戚相关，皇室在御园的任何重大活动都会影响到万寿寺及其行宫的建设，也就是皇室的巡幸文化在影响着万寿寺行宫的发展建设。

这种情况在清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乾隆时期，清高宗加紧了对离宫的修缮和扩建，西北御园规模进一步扩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繁盛时期。这种情形证实清皇室巡幸文化达到了巅峰。与之相应的建设便是皇宫至御园间御道的建设。长河水域的疏浚和河道堤坝的绿化建设是其中之一。水上御道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长河沿线皇家寺院园林建筑的修建与扩建。仅于长河沿线就建有万寿寺、真觉寺、紫竹禅院三处行宫，以万寿寺行宫为最。这种庞大的行宫规模则与万寿寺建筑规模相匹配。

万寿寺之所以能在乾隆年间扩建行宫，其地理位置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真觉寺行宫相比，在这一点上万寿寺占有优势。因为它在长河御道上的居中位置，而且是从圆明园出发后返宫的第一站点。而从皇宫出发到御园，行水路则在广源闸换舟，皇帝需从水上转移到陆路上，再到闸的另一侧上龙舟。在这种活动中，行宫的存在显得异常重要，因为皇族有中途休憩的需要。据《乾隆御制诗文集》记载，乾隆皇帝此时造访万寿寺的机会频繁，其在巡幸寺院后，到行殿休息或者办公都是可行的。

二、行宫发展展现的皇家祈寿文化

万寿寺兴建行殿后，也就是它在得到清皇室真正重视之后，其皇家寺院的地位才真正显示出来。与明代万寿寺由太监主持寺院活动，受宫廷控制的特征不同，清代万寿寺由佛界高僧主持寺院的佛事活动，他们以居万寿寺讲经说法为荣，更有以终身修行此寺为幸者。因此，万寿寺僧众在清代得到了在佛界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万寿寺僧众与皇家的联系实际上就建立在行宫兴建之后。皇家要通过在行宫的驻跸活动建立与寺院僧人的联系。行宫的最初功用仅为皇帝巡幸时驻跸之用。其地位和作用自然不可为人所轻视，就是寺院本身也为此身价百倍。清皇室对万寿寺的修缮和扩建就是尊崇佛教的无言宣告。从这以后，万寿寺佛教文化的发展也与皇家活动密切相关。这种发展的直接纽带就是皇家的祈寿文化。

清皇室是重视寿文化的皇族，每逢皇帝、皇太后寿典，必然在皇宫举办隆重的寿典。除此之外，信奉和崇拜佛教的清皇室还要举办寿典的佛事活动。万寿寺行宫的兴建为皇家在万寿寺举办佛事寿典活动提供了条件，又因为万寿寺寺名的缘故，万寿寺寿典活动更富有实际意义。

我们从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六年御制重修万寿寺碑文就可以看到选择万寿寺作为清皇室的佛事寿典场所的意义。这种选择是促使万寿寺行宫得以扩建发展的根本原因。皇家祈寿文化的发展促进着万寿寺行宫的建设，使之不断完善和壮大。

乾隆年间，畅春园乃至后来的圆明园，都是皇太后常年居住的场所。乾隆皇帝探望母亲常往来于皇宫与畅春园之间。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母后慈宁皇太后六十寿辰即将到来，乾隆皇帝往来畅春园更加频繁。为了表示孝心，乾隆筹划举办大规模的寿典活动。寿典中的佛事活动是重要的一项内容，乾隆皇帝为此亲自选择活动场所。慈宁皇太后的寿典要在皇宫内举办，从畅春园返回宫中的路途上，刚好是举行佛事寿典活动的时机。而万寿寺的地理位置以及寺名、行宫的存在都成为选择作为佛事活动的最佳场所之一。据乾隆十六年重修万寿寺碑记载：“自昆明湖循长河而东，缘岸所乔林古木，僧庐梵舍远近相望。广源闸西，万寿寺实为之冠。宏畅深静，规制壮丽。考碑志，建自明神宗初，迄今二百余载矣。朕时从舟过之。乾隆辛未之岁，恭值圣母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皇太后六旬大庆，海内外臣民举行庆典，朕恭奉大安舆由畅春园道西直门，至大内。銮舆所经，兹寺适居其中，且其嘉名符祝釐之意，命将作新之，更加丹臒，绣幢宝铎，辉耀金碧，以备临览。”[5]可见，乾隆在选择万寿寺作为佛事寿典的原因主要为二：一是地理位置居中，万寿寺居于皇家巡幸路途的中间位置，刚好在畅春园至西直门的中间地带；其二，是万寿寺的寺名“万寿”符合祝寿的喜庆意思。因此，命将万寿寺重修一新，且扩建改建行宫，增建寿茶寿膳房，使之更适合寿典之需。

《乾隆十六年重修万寿寺碑记》接下来引经据典讲述了“万寿”二字的含义。“《传》有之曰：万，盈数也。《诗》、《书》之称寿者曰，欲至于万年，曰万寿无疆，又有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皆举成数以致其欢欣颂祝之诚。而《帝王世纪》则谓天皇氏寿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寿一万八千岁，人皇氏寿九千岁，合四万五千岁，则上古盖实有之，非虚言也。至释氏《阿含经》则谓四天王寿五百

岁，以人间五十岁为一日，忉利天寿千岁，焰摩天寿二千岁，兜率天寿四千岁，化乐天寿八千岁，他化自在天寿一万六千岁，摩身天寿三万三千岁，而曰梵天寿命无有大期，古佛且有无量寿之号。贝叶经函，支那传译，净众敬持，故凡以欢喜心作佛事、植功德林报罔极恩者，咸有取焉。”[6]这段文字充分展示了寿文化中经典文献关于“万寿”这个含义的论述。这个论述不仅涉及到传统文化，也论及佛教经典关于寿文化的定义。乾隆皇帝在这里的阐述，表明的是以佛理寿文化与中华传统寿文化之间内涵的相通性，证实祈寿文化中的种种敬佛活动是敬重佛教文化的表现。这个解释也说明皇家在万寿寺举办佛事寿典的合理性。

万寿寺修复扩建工程的重点就在行宫方面。寺院中路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康熙年间所留下的格局，只是将建筑又粉饰一新。新增建的建筑主要在西路，于西路前方添置寿茶寿膳房两组两进的四合院，它用来作为寿典时御用茶膳之所。在其后改建行殿五间。同时进行的还有寺院东路建筑群的建设。乾隆母后的生日在冬天，寿典前一日，乾隆皇帝与他的母后乘冰船沿长河水路至万寿寺，礼佛之后，即在行殿内享用寿茶寿膳房提供的饮食。

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逢乾隆母后七十寿辰，此时正值乾隆皇帝全力扩建圆明园之时，为使寿典更加隆重喜庆，乾隆皇帝下令再度重修万寿寺。据乾隆二十六年《御制重修万寿寺碑文》载：“盖贞元嘉会保泰者，兢兢乎千载一时，而我圣母皇太后七秩庆辰适逢斯盛。朕将率亿兆臣庶祝嘏延洪，以圣节崇启经坛，莫万寿寺宜。爰敕内府丹垩即工，视乾隆辛未例，弗懈益虔，事载葳，系之辞曰：维兹寺修建端委，暨诸天无量寿义着在前文者，无俟繁称矣。曷记乎？则敬颂我圣母爱民延禧之懿训，以质言胪近事可乎？”[7]乾隆皇帝在碑文中发出了“以圣节崇启经坛，莫万寿寺宜”的赞叹。再次重申万寿寺作为寿典佛事活动场所的合理性。令内府遵照乾隆十六年的成例进行修饰一新，并完善行宫建筑群。

这一次重修他在寺院中路添加了中西合璧门，引进了洋式建筑（法国巴洛克式建筑，扩建圆明园时已引用），又增建御碑亭。在西路行殿院新建建筑，据《乾隆皇太后万寿庆典奏案》中录《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奏案》中载：“西所大悲坛五间，顺山厢房十间，后楼五间，顺山厢房十二间。新建重檐八方亭一座。”可知此年行宫的后楼和大悲殿建成。“粘修行宫前殿五间，后殿五间”，可知此二殿建于乾隆十六年。增加了后楼、大悲殿等建筑院落。至此，行宫建筑全部就绪。一组完整、功能齐全的行宫建筑群诞生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事已高的慈宁皇太后居于皇宫，在皇宫举办过寿典之后，仍赴万寿寺举行八十寿典的佛事活动。可见，万寿寺已经被清皇室视为寿典佛事活动的专用场所。

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往来颐和园期间驻跸万寿寺行宫。凭借六十寿典佛事活动在万寿寺举行，慈禧下令重修万寿寺。即使在国库银两很紧张的情况下，在修缮颐和园的同时，还是修缮了万寿寺。其在重修碑文中说：“粤壬辰癸巳之岁，万寿山、颐和园告成，皇太后以春秋令日，清跸莅止道西直门，经广源闸，御凤舸西迈，闸之上有万寿寺焉。寺为乾隆中一再修建，高宗纯皇帝御碑纪事。谓嘉名符祝釐之义，特敕将作葺而新之。兹者恭逢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六旬庆典，懿旨申谕：以民生国计为念，罢臣工进献，发内帑，普振各省穷黎。凡踵事增华之举，概以撙节，渊乎懿哉！皇太后之心，一佛之心焉。维兹寺宇为慈圣所瞻礼，且成宪具在，敢不恪尊？于是侈者举之，驳者饰之，鞮鼓不劳，轮奂斯美，既固既完，竖石中除，爰刻铭曰：……”

可见，慈禧皇太后重修万寿寺，虽然强调要以撙节为重，但还是以遵循乾隆先例为名义，作为修缮的理由。这里所强调的是，万寿寺的祝寿功能，“且成宪具在，敢不恪遵？”说明皇家的祈寿文化活动在万寿寺始终延续不断。

三、行宫布局显示的皇家建筑文化

万寿寺建筑群就寺院整体布局上而言，具有三路建筑规模、集寺院、园林、行宫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特点。具体到行宫建筑群本身，它也形成了集宫殿、园林、佛堂建筑于一体的建筑格局。这种三位一体的建筑风格，表明了万寿寺行宫建筑艺术的特征。

乾隆二十六年以后完善的行宫建筑群，具备了皇族休息、处理政务、礼佛、饮膳等宫廷中所应有的四大功能。建筑的风格也由此形态各异，群体布局合理，堪称皇家行宫建筑的典范。建筑群按不同的功用，从建筑风格到体量等级、形式规模都有着显著区别。形态各异的建筑汇聚一堂，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行宫建筑艺术风格。行宫的进深和跨度与寺院中路大体相同，建筑规模与寺院建筑可相媲美。

行宫建筑群的构成：由附属建筑、行殿建筑、后宫建筑、佛堂建筑依前至后四部分组成，对应行宫的四大功能。

附属建筑坐落在行宫的最前端，临街，即寿茶寿膳院建筑群，是由两组小型的四合院构成。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皇家寿典时制作和提供寿茶和寿膳。这也是万寿寺行宫建筑的特点之一。由于寿茶和寿膳房建筑群的从属地位，它的建筑体量比其它行宫建筑都小。主建筑五开间，分前房与正房两个院落，东西两个跨院。东西配房各三开间。屋顶采用硬山卷棚顶规制。

行殿建筑群为行宫主体建筑，由一组大型的四合院组成，主建筑有前正殿和正殿，为皇帝处理政务之所。两座殿堂高大宽敞，显示出皇家宫廷建筑的气派和堂皇。前正殿采用卷棚式悬山顶，正殿采用卷棚式歇山顶，各五开间。两侧各有东西配殿，各五开间。前正殿又称乐康殿，其东西配殿又称为昭景斋和来鹤轩。正殿又称履绥殿，其配殿又称燕喜斋和景云轩。院落由游廊将正殿与配殿连接环抱，正前方有垂花门。垂花门两侧为院墙，饰透花窗。垂花门前为前庭院，院南正房五间，两端偏房四间各开侧门，两侧配房各八间。院中有木影壁一座。院落与寿茶寿膳房院不连接，表明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建筑采用苏式彩绘，是典型的王府式四合院规制。

在行殿之后，为后宫式建筑，主建筑为御书楼，是两层楼阁式建筑，上层前廊两端接游廊，转接两侧爬山游廊，游廊下端出口接行殿后端游廊。东侧游廊中部有八角亭一座，西侧游廊中部有四方亭一座。爬山游廊九级，外侧围墙饰透花窗各16个，形态各异。下层楼阁有穿堂门。楼下两侧、爬山游廊下有太湖石装饰堆砌的山石。书楼开间为五间。屋顶用硬山卷棚式。庭院布局呈现宽阔、舒朗、典雅的风格，楼、廊、亭、石共同构成了园林式的建筑品位，浓郁的园林氛围显然是为皇族休闲所设计的。所以此建筑的功能是御书楼，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休闲之所，也为皇太后的休憩之所。后为慈禧皇太后行宫驻跸时的休闲之所。

行宫最后端是佛堂建筑大悲坛殿，这里是供奉观音菩萨的场所。乾隆皇帝的母后慈宁皇太后因最喜参拜观音菩萨，所以在行宫中特立供奉之所。建筑群以大悲殿为主殿，五开间，卷棚硬山顶。两侧偏房各五间，东西配房三间。大悲殿前立《金刚经》碑两座。碑文书写《金刚经》文，碑内绘七级浮屠，宝塔内绘佛像多尊，经文则环绕佛像书写，旋转起伏，曲折展开，漫布宝塔的各个角落层面，及至塔檐，形成迷宫式的文字走向构图。读者只要依照迷宫路线读经，就能读遍全文。

行宫中建立佛殿建筑，正是体现皇家崇佛思想的征象，也象征皇家以佛心治理国家的思想意识。正如乾隆二十六年重修万寿寺碑文中所称：“维兹寺修建端委，暨诸天无量寿义着在前文者，无俟繁称矣。曷记乎？则敬颂我圣母爱民延禧之懿训，以质言胪近事可乎？向者东南耆耇，颙迓安舆，树颔翘趾者相属。偶会偏隅赈赈，朕上体慈怀，载稽撰日，阅丙子而丁丑，阅辛巳而壬午，迨取道展礼清凉，则祥霙甘澍，醞酵缤纷，九宇奄观倍稔，揆诸古德所云觉照佛心，福利仁化，何以加兹？若乃西人叩关请师，亟于救焚拯溺，朕荷天祖鸿庥，寅承敢后，每旁午擘画，禀命璇闱，备仰我圣母始事之勤劬，与功成之恺豫。迄今流沙数万里，悉古乌孙、大宛、勃律、于阗诸部，不啻偃修罗之弓戟而亭以慧云，沃以法雨，同登极乐国土者。我圣母寿世无量之心，一我佛寿世无量之心，而朕额手庆抃，即愿以无量万世寿我圣母者，庶于是焉征实可记也夫！”

在这段碑文中，乾隆皇帝特别赞扬了皇太后“爱民延禧”的懿训。他把太后的这种慈心比喻为佛心，激励他发奋治理国家而获得民众的拥护爱戴。在这里佛的教诲发挥了巨大的作为。太后敬佛崇佛的结果就是告诫他爱民勤事，以德治理天下。所以“我圣母寿世无量之心，一我佛寿世无量之心”，以佛理教诲为指导，天下得到妥善治理。所以敬佛是理所当然的需求。即使到了慈禧太后时期，也要以此标榜“皇太后之心，一佛之心焉。”（光绪二十年（1894）《重建万寿寺碑文》）以此作为修缮万寿寺，敬佛崇佛的原委。

行宫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体量采用了与寺院中路建筑主体建筑的体量大致等同的做法，这样它们就共同构筑了万寿寺建筑群的皇家气势，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群相互映衬，相互媲美，造就了万寿寺建筑群的艺术特色。

①（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万寿寺》。

②（明）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十二《敕建万寿寺碑文》。

③（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五。

④（清）励宗万：《京城古迹考·万寿寺》。

⑤⑥⑦（清）于敏中等纂：《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九。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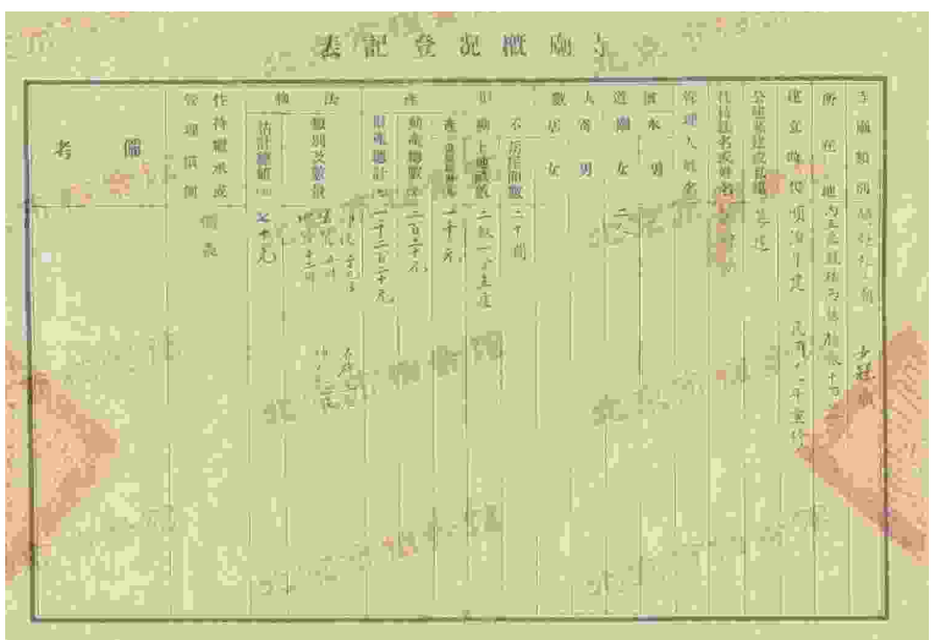
试谈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

韩建识

长期以来，关于铸钟娘娘的传说在北京广为流传，说的是当年在铸造钟楼上的大铜钟时，久铸不成，监工的女儿担心父亲获罪，伪托参观，乘人不备，投身炉中，钟才最终铸成。后人感其孝心，建庙祀之。铸钟娘娘庙位于鼓楼西铸钟厂。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发现今人关于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历史有多处可商榷之处，本文试就该庙的历史、所祀之神、格局变迁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前身是真武庙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载：“德胜门东为铸钟厂，其地有真武庙，内有顺治辛卯年刘芳远撰碑。”[①] 1958 年 9 月北京市对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进行文物古迹调查登记时发现石碑 4 块：一是北城司正知五品大夫服俸刘芳远撰重修圣庙碑，该碑坐北朝南，碑首浮雕流云，长方形石座，全高 2.00 米，宽 0.80 米，厚 0.16 米，顺治辛卯（顺治八年，1651 年）孟冬吉旦立石，碑在中殿前西旁；二是时任该观主持王志诚撰重修铸钟娘娘大殿碑记，该碑高 0.60 米，宽 0.30 米，乾隆乙巳年（乾隆五十年，1785 年）孟冬朔日吉立石，碑在后殿内东墙上；三是重修娘娘庙金炉圣母大殿碑，该碑高 0.60 米，宽 0.30 米，碑额为线雕流云，书“名标千古”，道光七年（1827 年）立，碑在后殿内西墙上；四是重修娘娘庙金炉圣母大殿三间碑，该碑坐北朝南，碑首浮雕流云，长方形座，全高 2.00 米，宽 0.80 米，厚 0.16 米，额书“万古流芳”，大清道光戊子年（道光八年，1828 年）三月十五日望日良辰吉立石，碑在中殿前东旁。从以上 4 块碑上的碑文可以看出铸钟娘娘庙名称的变化。《刘芳远撰顺治辛卯年重修圣庙碑》载：“兹者铸钟厂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庙……”，《王志诚撰乾隆乙巳年重修铸钟娘娘大殿碑记》载：“兹因鼓楼西铸钟厂真武庙……”，《道光七年重修娘娘庙金炉圣母大殿碑》和《道光戊子年重修娘娘庙金炉圣母大殿三间碑》载：“兹因鼓楼西铸钟厂娘娘庙……”，[②] 可见，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在清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名称是真武庙，道光七年以后的名称



1948年铸钟娘娘庙登记表

是娘娘庙，由真武庙改称铸钟娘娘庙应发生在清乾隆五十年到道光七年这段时间，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前身应是真武庙。[3] 1958 年 9 月北京市对铸钟娘娘庙进行文物古迹调查登记时，该庙前殿内仍有一高约 2.5 米的泥坐真武像。[4]

关于铸钟厂真武庙的始建年代，主要有始建年代不详[5]、建于清顺治年间[6]、大致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或以后的时期[7]等观点。《刘芳远撰顺治辛卯年重修圣庙碑》载："兹者铸钟厂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庙，左伏魔右玄坛龙王，后殿金炉娘娘众神，其来久矣。……"该碑立于清顺治八年，碑文既然说此真武庙"其来久矣"，那么其始建年代应该不晚于明代。明代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中，百分之百都建真武庙。[8]明万历八年（1580 年）刘效祖撰《重修真武庙碑记》载："国朝设立监局司厂衙门多建北极玄武庙于内、塑像其中而祀之者何也？缘内府乃造作上用钱粮之所，密迩宫禁之地，真武则神威显赫，祛邪卫正，善除水火妖媚之患。成祖靖难时阴助之功居多，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不建庙而祀之。"[9]可见，明朝设立监局司厂衙门中建真武庙的目的，一是真武大帝善于除水火之患，二是明成祖（即永乐皇帝）在靖难之役时，真武大帝有阴助之功，所以要建庙而祀之。鼓楼西铸钟厂是明代铸钟之所，明代铸钟厂中建真武庙是合理的。《刘芳远撰顺治辛卯年重修圣庙碑》中提到"北极真武玄天上帝"、"伏魔"，真武大帝封为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关帝封为伏魔大帝，都发生在明朝。所以，笔者赞同铸钟厂真武庙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或以后的时期的观点。

二、金炉圣母是指女娲

关于铸钟娘娘的传说，在《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中出现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是，娘娘本来是一位妙龄少女，明朝时钟楼上的钟为铁钟，清朝时想改铸铜钟，让少女的父亲监制。铜钟久铸不成，少女担心父亲获罪，就伪托参观，乘人不备，投身炉中，铜钟才最终铸造成功。工人居民感其孝心，对她建庙祭祀；二是，传说元朝敕铸铜钟时，所派的监工大臣姓邓，他的女儿殉身救父的故事情节如前述。[10]上文已述，铸钟娘娘庙的前身是真武庙，那此庙是为祭祀铸钟娘娘而建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另外，铸钟娘娘又称金炉圣母，娘娘和圣母一般应是指地位较高的女神，作为监工的女儿，是不应该称作圣母的。如遵化铁厂奉祀的为救其父而投炉的二女就称金、火二仙姑。[11]关于北京铸钟厂铸钟娘娘的传说，其中的人物身份不一，而且见于文献较晚，笔者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成书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的《北平旅行指南》。与北京铸钟厂铸钟娘娘的传说相似的内容见于南京铸钟厂关于钟神的传说。《白下琐言》载："倒钟厂钟卧于地 ，半陷土中。相传铸时屡不成，督工者将获谴，有幼女伤父不免，投身火中以殉，遂为钟神。"[12]因此，笔者认为北京铸钟厂铸钟娘娘的传说应该是根据以上类似传说编造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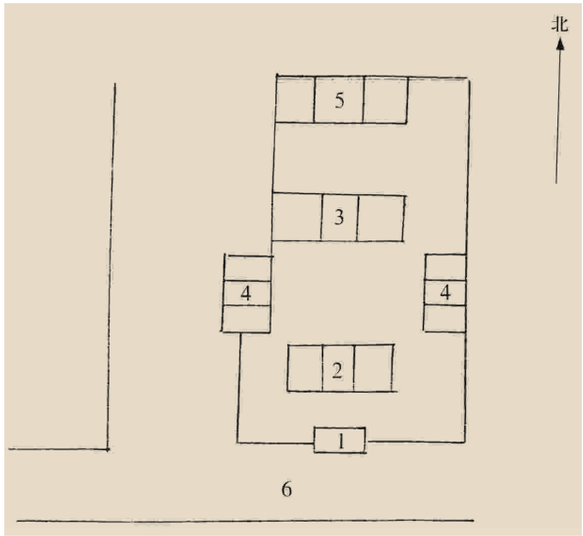
北京铸钟厂铸钟娘娘不是监工的女儿，那她又是谁呢？笔者认为，铸钟娘娘即金炉圣母应是女娲。女娲因炼五色石补天而成为铸造业的行业神。（乾隆）《博山县志》卷二《祀典》载："炉神庙，在洪教寺后，业玻璃者所建，祀古女娲氏，取义于炼五色石以补天也，系民间私祭。"炉神庙是明万历年间山东博山琉璃行业所建，该庙圣母殿内供奉的正是女娲娘娘。在古代山西忻州地区，铸造业祭祀"炉神圣母"，[13]"炉神圣母"应是女娲。明代铸钟厂是明政府铸钟场所，在此地的真武庙中祭祀铸造业行业神——女娲也是合理的。

明代的真武庙之所以后来又改称铸钟娘娘庙，原因是到了清代，该庙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上文已提到，铸钟厂建立的目的，一是真武大帝善于除水火之患，二是明成祖在靖难之役时，真武大帝有阴助之功。在明代，真武庙是铸钟厂的厂庙。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该庙作为厂庙的作用逐渐消失，由于该庙靠近钟楼，把它与钟楼上的大钟联系在一起似乎更贴近人们的生活。于是，奉祀主神就由真武大帝变成了铸钟娘娘，庙名也由真武庙改称铸钟娘娘庙。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和填写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六月的北平市铸钟娘娘庙寺庙法物登记表[14]中没有提及真武大帝，这进一步印证了真武大帝已经不再是该庙所祀主神。如《北平旅行指南》一书在谈到"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时载："庙在鼓楼迤西铸钟厂，殿凡二层，前祀关帝，后祀铸钟娘娘……"[15]从这些描述已经看不出该庙与真武大帝有什么关系。

三、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历史沿革

真武庙在明代建成后，据笔者已知资料，它经过了清顺治、乾隆、道光及民国 4 次重修。

铸钟厂真武庙因年久失修，殿宇渗漏、颓坏，清顺治八年，信士弟子庞成功对其捐资重修，当



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建筑格局示意图（1958年9月绘制）
1.山门　2.前殿　3.中殿　4.配殿　5.后殿　6.铸钟厂

时王守道为该观主持。此时，该庙前殿祀真武大帝，左右分别祀关帝和龙王，后殿祀金炉娘娘。乾隆五十年，真武庙内金炉娘娘大殿三间因年深日久而渗漏损坏，由于重修所需钱粮浩大，独力难成，时任主持王志诚募化十方施主，鼎新金炉娘娘大殿、彩塑金身。道光七年，时任主持黄宗禄向上驷院司理圈厩长信官彭礼寿募化重修了渗漏不堪的金炉圣母大殿三间、真武帝大殿六间、山门三间。[16]

据出版于民国二十四年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记载，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当时有殿两层，前殿祭祀关帝，后殿祭祀铸钟娘娘。[17]据调查人张伯英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调查填写的北平市铸钟娘娘庙寺庙登记表，该庙属于女冠庙；位于内五区鼓楼西铸钟厂 14 号；民国十八年（1929 年）重修；曾义明任主持；有房屋 20 间，土地 2 亩 1 分 5 厘；偶像有金炉圣母、关帝、吕祖、灵官、配像等共 29 尊，均为泥质；礼器有木漆花瓶 4 个、木漆蜡阡 4 个、木五供 2 堂、木漆香炉 4 个；法器有铁钟 1 口、铜磬 1 口、铁磬 3 口、鼓 1 面、木鱼 1 个；经典有全真经 1 本；雕刻有石碑 2 座、神龛 2 座；其他还有供桌 7 张、柏树 2 棵、槐树 1 棵；有庙照 1 件；有女道士 2 人：曾义明，72 岁，河北固安人，幼年出家，教育程度为识字，由师传授，于民国十四年（1925 年）接任主持；徒弟孙礼焕，60 岁，河北大兴人，民国八年（1919 年）出家。每年补助道教会经费洋 6 元；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神外自住出租。[18]

1948 年北平市民政局进行第二次寺庙登记，从登记情形看，铸钟娘娘庙系华山派，本庙住二人，孙礼焕为主持，徒弟崔智平：河北大兴县人，女，40 岁，民国三十年（1941 年）二月十九日出家，识字。其它与 1936 年的登记情形基本相同。[19]

据 1951 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文物调查表》，铸钟娘娘庙位于西四区旧鼓楼大街西铸钟厂 14 号；庙内有大像 4 尊及群像、磬 1 口（光绪己丑年）、石碑 3 座（顺治辛卯年，康熙二十四年，道光戊子年）、钟 1 口（道光庚寅年）、鼓 1 面。建筑保存的相当完整，保管者为孙礼焕，使用者和使用情形为市民作为住宅。[20]

据 1958 年 9 月北京市文物普查时填写的《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铸钟娘娘庙位于西城区果子市办事处铸钟厂 14 号。该庙坐北朝南，三重殿。山门一间，面阔 4.30 米，进深 4.90 米，硬山，箍头脊，筒瓦顶，大式做法，纸糊顶棚，前砖券门口，棋盘大门两扇，首有额书：“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前殿三间，面阔 9.60 米，进深 4.50 米，硬山，箍头脊，仰瓦灰梗，小式做法，普通式样门窗；中殿三间，面阔 12.10 米，进深 12.00 米，硬山，二卷勾联搭，前箍头脊，后调大脊，大式做法；配殿东西各三间，硬山，箍头脊，合瓦顶，大式做法；后殿三间，面阔 12.00 米，进深 8.40 米，硬山，调大脊，筒瓦顶，大式做法，五架梁，六檩澈上明造，六抹方格门，四抹方格窗。（见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建筑格局示意图）附属文物有：后殿内有泥坐娘娘、文士相共 9 个（残毁）；前殿内有泥坐真武一，高约 2.50 米；吕祖一，高约 1.50 米，另有泥坐、站佛共 20 个，高者为 1.80 米，小者为 0.50 米；另有碑 4 块，如前文所述。此时，该庙西、南二面为铸钟厂，其余二面靠民居；建筑已老旧；该庙归街道生产合作社使用，道教组管理。[21]2000 年前后，该庙被完全拆除。

四、20 世纪 40 年代铸钟娘娘庙道士崔智平接充主持一案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二十日铸钟娘娘庙道士崔智平向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呈报：铸钟娘娘庙由坤道度师孙礼焕充任主持，已经呈准登记有案，现在她因年老力衰，退居修养，所遗主持职务依照子孙小庙惯例，应由坤道崔智平接续继承，要求准予备案，以便接管。具结保人为灵佑宫主持孙信正、地母庙主持王诚茗、福田观主持张信启。由于没有得到答复，十月，崔智平再次向市政府民政局就接充铸钟娘娘庙主持一事提出催请。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七月十五日北平道教会理事长赵心明向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呈报调查情况：经查，该庙系华山派，与府右街长清观同属本家，具结保人并没有该观道士，是否同意有疑问，因此，通知该观道士来会问话。去年九月二十五日据刘智瑞等声称，本年夏历七月二日孙礼焕生日，大家都去给她作寿，饭后孙当家开家庭会议，商议铸钟娘娘庙更换主持，李礼志提议让崔智平接充，因此日是孙当家好日子，大家不便反对，后来回到庙内，都感到不合情理。因铸钟娘娘庙是我们公产，孙当家不应让她女儿接庙。孙当家照旧当家，毫无问题，如果更换崔智平当家，必须等李礼妙回来再计议，因为李礼妙是崔智平的师傅。十一月八日据黄智教等声称，此庙是我们曾师傅遗传的小庙，应该先由礼字辈师兄弟接充主持，孙礼焕想将此庙交给崔智平，我们不赞成，家庭会议，我们都没有表示，虽有记录，也没有签字盖章。十一月十日据崔智平声称，此庙原来是一个破坏小庙，孙当家接管庙务后竭力整理，现在很整齐，我于民国十四年（1925 年）进到庙内，阮礼仪是我的度师，孙礼焕是我师叔，我接充主持，家庭会议并没有人表示反对，留有谈话记录，但没有盖章签字。又据具结人孙信正等声称，孙信正与王诚茗系龙门派，张信启系华山派，内中有无纠纷我们不知道。又据长清观道众联名具呈，表示反对，大意同前。据调查，该崔智平原来是孙礼焕的俗家女儿，出家后拜阮礼仪为度师，阮礼仪与孙礼焕系属师兄弟，所以称孙礼焕为师叔，原呈称铸钟娘娘庙由坤道度师孙礼焕充任主持，迹近蒙混师徒，此不合者一；更换主持没有取得本家同意就遽行呈报，此不合者二；所具保结也多数不是本家，此不合者三。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民政局程局长依据道教会的调查结果，做出了“於例不合，未便准行”的批复。九月十八日崔智平再次向民政局就其批复提出异议。随后，民政局程局长批示，要求道教会做进一步调查。[22]据上文所述，1951 年铸钟娘娘庙的保管者仍为孙礼焕，崔智平接充该庙主持一事似乎没有最终得到道教会的认可。

五、小　结

综上所述，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前身是真武庙，真武庙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或以后的时期，清代乾隆五十年至道光七年这段时间，真武庙改称铸钟娘娘庙，奉祀主神也由真武大帝变成了铸钟娘娘。金炉圣母应该是指女娲，而不是传说中监工的女儿。该庙在清顺治八年、乾隆五十年、道光七年、民国十八年（见 1948 年铸钟娘娘庙登记表）经过了 4 次重修。该庙建筑主要有前后二层殿。我们已知的该庙主持有：清顺治八年是王守道，乾隆五十年是王志诚，清道光七年是黄宗禄，民国十四年是曾义明，民国三十六年是孙礼焕。铸钟娘娘庙位于鼓楼西铸钟厂，民国二十五年门牌号是内五区鼓楼西铸钟厂 14 号，1951 年门牌号是西四区旧鼓楼大街西铸钟厂 14 号，1958 年门牌号是西城区果子市办事处铸钟厂 14 号，20 世纪 80 年代门牌号是西城区小黑虎胡同 24、26 号。[23]

①（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 54《城市》。

②④⑯㉑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 1958 年 9 月“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庙 991（石 1856–1859）。

③陶金在发表于《中国道教》2007 年第 2 期的《明朝内府廿四衙门与皇城内的真武庙》一文中已提出“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即原铸钟厂之真武庙”。

⑤㉓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59 页。

⑥⑩⑮⑰马芷庠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卷一，北平：经济新闻社，1935 年。

⑦庾华：《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考》，《北京文博》2008 年 3 期。

⑧宗力、刘群著：《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9 月第 1 版，第 75 页。

⑨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57 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 4 月第 1 版，第 83 页。

⑪（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 1。

⑫（清）甘熙：《白下琐言》卷 4。

⑬乔润令著：《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244 页。

⑭⑱北京市档案馆藏“内五区铸钟娘娘庙主持尼曾义明送寺庙登记表及社会局的批示”，J2–8–1138。

⑲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内五区铸钟娘娘庙主持孙礼焕呈送登记表及内五区的调查报告”，J3–1–171。

⑳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 1951 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文物调查表》，编号 439。

㉒北京市档案馆藏“铸钟娘娘庙道士崔智平关于接充主持的呈文及民政局的训令”，J3–1–63。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副研究馆员）

翻阅昨天的照片 感受今天的发展

——前门商业大街老店铺的变迁

叶 芷　周 莎

前门商业大街形成于明代，兴盛于清代。这里曾经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从人们头上戴的，脚下穿的，各类杂品百货，到花样繁多的糕点铺，餐馆、茶庄、药铺，应有尽有，是老北京商业繁华的象征。本篇汇集了新中国诞生初期（20 世纪 50 年代）前门商业大街部分老店铺的照片（亦是市文物研究所所藏老照片）。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老店铺的招牌、匾额依旧存在，但我们可以从店铺前、大街上人们的衣着明显地感受到新时代的变化，此时，国家刚刚完成了对私有制工商业的改造，各商家店铺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的招幌，在各家店铺前“比比皆是”，这些招幌唤起我们对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记忆，它见证了我们走过的一段道路。

旧京影像已成为永恒的回忆，历史迈入了 21 世纪，古老的北京城、古老的前门大街，又迎来了新的大规模改造与建设，老店铺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北京城里最具人文色彩和北京色彩的步行商业街之一。在迎接祖国 60 年大庆到来之际，谨以此图片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 华诞的献礼。

大北照相馆　始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原址在宣武区石头胡同，当年以擅长拍摄戏装照著称。新中国成立后，50 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国营企业，1958 年迁址到前门大街 2 号。从 1954 年起，大北照相馆承担起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党代会、全国政协会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中外宾客的大中型会议团体合影照任务，为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丰功伟绩留下了历史性的纪念。该馆还承揽全国各地社会各团体会议留念的拍摄工作，60 年来拍摄达数万余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及各界人士高度赞扬和信赖，并在全国照相行业享有盛誉。现今的大北照相馆坐落在前门商业街五牌楼东北角，是一座上下两层的建筑。





大通食品店　前身为丽都餐厅，始创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1953 年迁到前门外大栅栏东口路北的两间门面（两层楼），更名为“大通食品店”。夏季经营“冰棍、汽水”等冷食，批发兼零售；冬季经营元宵、奶酪、杏仁豆腐等。1956 年公私合营后，将前门大街的同丰酒店、颜料店和珠宝市秤杆铺撤销，并入大通，使大通的铺面房多达 20 间。食

品又增添了花样品种，并以“炸糕、切糕、盆糕、年糕、元宵、小豆粥”等品种最为出名。20 世纪 70 年代迁到前门打磨厂西口，改名“迎群小吃店”。80 年代重新改建装修。店名恢复为“丽都餐厅”。并请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书写了匾额。



老正兴菜馆　最早的老正兴是由无锡人蔡正仁、卓人兴于清末同治年间在上海合伙开办的。店名取于二人名字中的“正”和“兴”二字，原址设在上海西藏路以东四马路，以经营河鲜海味菜肴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6 年由上海迁到北京，最初设在前门大街路西 46 号。1988 年 9 月 1 日翻建后扩大了营业面积。饭庄主要经营传统上海风味菜肴，尤其擅长烹调各种河鲜鱼菜，注重选材，制作考究。老正兴的风味面点更别具一格，花样丰富，总计百十余种。除北京之外，在全国各大省市以及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都开办有老正兴菜馆。



力力餐厅　始建于 1954 年，原址在前门外廊房二条 79 号。1958 年迁至现址前门大街 30 号。以经营正宗四川风味菜肴为特色，约有 200 余种菜肴。60 年代初郭沫若先生及陈毅和罗瑞卿等四川籍中央首长也经常来光顾。1964 年秋，郭沫若先生为力力餐厅亲自题写了匾额，并赠诗一首。1995 年因房屋老化，拆除重建，1997 年重新开业。餐厅建筑面积 107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300 人就餐，餐厅装饰典雅，店堂宽敞明亮，风格独特。



南庆仁堂药铺　药铺为民国年间北京中药业的四大家之一。领东掌柜是中药业有名的王子丰，民国元年（1912 年）最先开办了东庆仁堂，由于买卖经营得当，生意兴隆，此后又相继开办了南庆仁堂、北庆仁堂、西庆仁堂等药铺。位于前门大街 128 号的南庆仁堂于民国七年（1918 年）开业，经营品种中以第一灵丹、疏风定通丸闻名。同时以经营人参、鹿茸、牛黄、麝香、阿胶等贵重药材为主，表明其资本雄厚，高人一筹。1956 年公私合营，经营方式为专门零售药店。“十年动乱”中曾改名“康复药店”，1989 年恢复了老字号。1991 年 7 月重张开业，零售兼批发参茸保健品、饮片等四千余种中西药。



庆林春茶庄　民国十五～十六年（1926 ～ 1927 年）福建人林子丹创办。林子丹生长在茶乡，他善于经营，且方式有独到之处，将罐装茶叶改为拼配零售，扩大了经营品种，颇受顾客欢迎。又

因地理位置繁华，货色齐全，开业不久，便享誉京城。此后相继在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内、前门地区的劝业场和五牌楼东侧开了分店。1956 年三家分店都参加了公私合营，1968 年东安市场内的分店拆迁，而后在前门大街的改造中，东侧分店亦被拆除。2008 年的复建中恢复和保留了原前门大街路西的分店。老字号庆林春茶庄又得到了新生。

现今的庆林春茶庄位于前门商业街路西 4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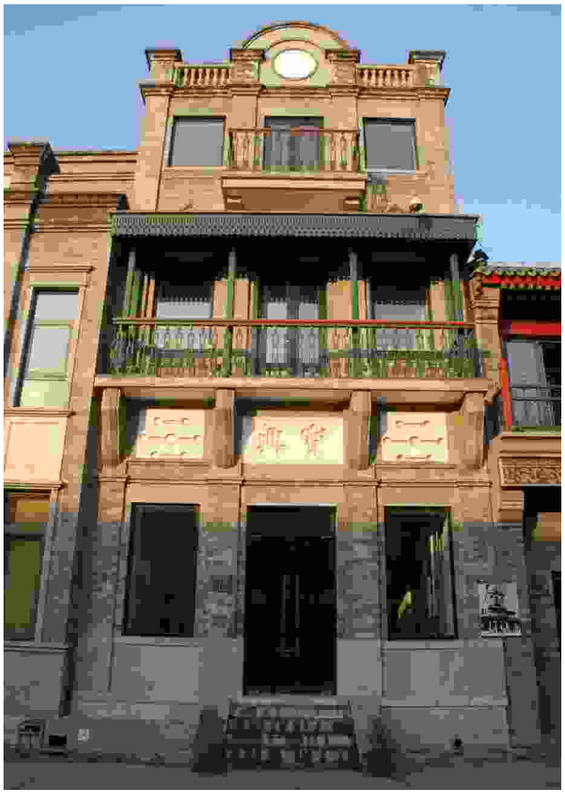
森泰茶庄　清咸丰年间（1851—1861 年）安徽歙县人王森泰创办。位于前门大街珠市口以南。初为一座两层木结构小楼。门前“森泰茶庄”牌匾是清末翰林张海若所书。原茶庄正堂挂有张大千的猛虎图和张善子的春、夏、秋、冬四季彩屏和孔雀图。茶庄有专人常驻江南采办茶叶，拼配在北京进行。其经营的茉莉花茶叶具有色正、汤清、味醇的特点，为北京人所喜爱。民国初年，森泰茶庄相继在前门大街珠市口迤北、安定门大街、崇文门外小市口、京西蓝靛厂开办过四家分号。1956 年参加了公私合营，此后货源由北京茶叶公司供应。经营品种有红茶、绿茶、花茶、乌龙茶、保健茶等高、中、低档茶叶。“十年动乱”中茶庄改为“春莉茶庄”，1988 年恢复老字号，扩大了营业面积。经营品种多达 5 大类 180 余种。现在的森泰茶庄保留的乃是初创时前门大街珠市口以南的店铺。

盛锡福帽店　民国元年（1912 年）山东掖县人刘锡三在天津创办。民国六年（1917 年）扩大重新选址开张。1919 年巨资买下一部全套的电力制造机器，设立了加工厂，自产自销，打开了销路。此后又设立了皮帽、便、缎、通、毡帽等工厂。并创立了品牌“三帽”牌产品。生产的帽子，四季齐全，种类多达 200 个。20 世纪 30 年代，在南京、上海、北京、沈阳等地又设分店。并在北京开办了四家分店。其中前门大街分店设在现址前门商业大街 37 号。1956 年参加了公私合营。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建立了自己的加工厂，保持了老店的特色，并多次为中央领导同志出国访问加工特制的帽子。“十年动乱”中改为“红旗帽店”。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恢复了老字号，80 年代扩建了厂房，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增加了“三帽牌”产品，同时还增添了旅游帽、小礼帽等。

如今，老店位于前门商业大街 37 号，已修缮一新，等待开业。







通三益　创始于清朝嘉庆二十年(1815年)。相传由山西太谷县姓李的商人开办，店铺位于前门大街五牌楼南，为通州南货庄三益贞的分号，取名通三益。以经营干果海味品为主。道光二十年(1840年)，通三益开始出售以宫廷秘方制作的苓贝秋梨膏，成为店内一大特色。因具有润肺祛痰、止咳祛喘、安神生津、健脾养胃之功效，且老少皆宜，深受顾客欢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通三益食品店也获得了新生；1956年参加了公私合营；“十年动乱”中改名“秋江食品店”；1982年，老匾重张。



随着前门商业区改造与建设，现今的通三益位于前门大街6号，已修建完毕，等待重张。



祥聚公饽饽铺　民国元年（1912年）回族人王殿文在前门大栅栏东口路西创办，取名祥聚公。饽饽起源于满文“bobo”，是满语，故称。以制作京味糕点为主，如满汉饽饽、萨其玛、京八件等。还制作时令糕点，如正月十五上元佳节的元宵；二月二龙抬头的太阳糕；三月三的玫瑰鲜花藤罗饼；五月五端午节的粽子和五毒饼；六月、七月的绿豆糕；八月十五的中秋月饼；九月九的花糕；冬天寒冷时的芙蓉糕。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尚小云、侯喜瑞、李洪春等人经常光临。1956年公私合营，祥聚公并入“北京糕点三厂”。“十年动乱”中遭到破坏。1985年在前门外鲜鱼



口街内重新挂出老牌匾，并恢复传统的生产工艺和各式糕点。90 年代在广渠门内大街设立了门市部，增添的新品种多达几十种，年产量过千吨，并在全市设立了多家食品店及专柜，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一条龙羊肉馆 创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 年），位于前门外大街 31 号，一条龙羊肉馆原名南恒顺羊肉馆，由山东禹城韩家寨韩姓人开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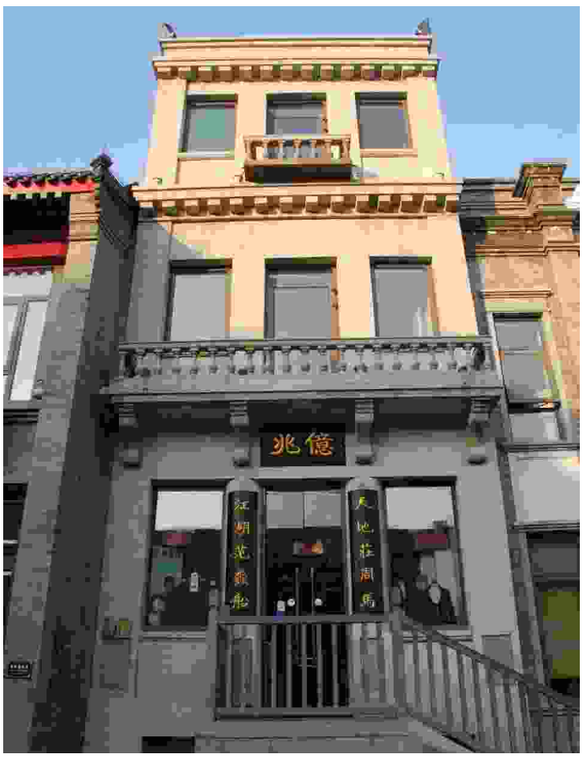


相传光绪皇帝曾来此吃饭，此后，南恒顺被叫成一条龙，因此买卖兴隆，门庭若市。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大栅栏着火，南恒顺被烧毁。庚子事变后，筹资建房，改成面阔三间，楼高二层的店堂。传至第六代东家韩同利手中，他请来原清廷笔帖式杨铎声题写了“一条龙”牌匾，于 1921 年悬挂在门头，并同时悬挂有一条龙和羊肉馆两块牌匾。1956 年公私合营，经营得当，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十年动乱”中店名曾改为“利群饭店”，1982 年恢复原名。1988 年重建新店，改为具有伊斯兰教风格的三层楼房，经营具有特色的“一条龙涮羊肉”及回民菜肴。

现今，位于前门大街 27 号的一条龙羊肉馆已重张开业。

亿兆百货店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创建，最初在前门外瓜子店胡同开设亿兆针织毛纺商店，又称洋广杂货商店。主要经营上海货和日本货。1936 年，又在前门大街路东购置十几间铺面房，并开设零售店，称亿兆百货商店。因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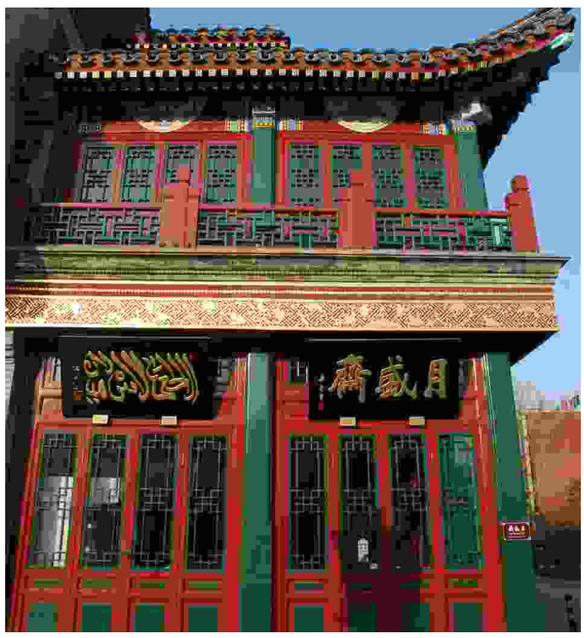
雄厚，货源充足，所以直接从上海和日本引进货源，生意兴隆。20 世纪 40 年代，该店的批发部也建立起来，经营业务遍及北方的各大城市，在北京百货业中堪称榜首。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扶植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下，生意更加兴隆。1956 年进行了公私合营。1966 年改为“红卫针织毛纺商店”。1971 年改为“春秋针织毛纺商店”。1980 年恢复亿兆毛纺商店老字号。2008 年，随着前门商业街的改造与建设，重建的亿兆百货店由原址的路东迁到了路西。

现今的亿兆百货店位于前门商业大街 4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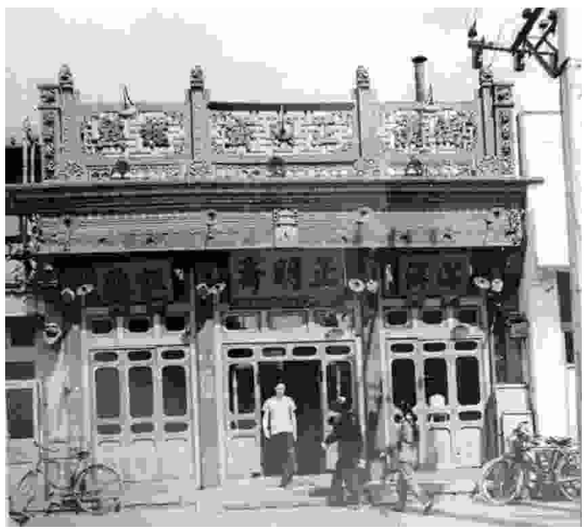
月盛斋　清乾隆四十年（1775 年）由回族人马庆瑞创办，全名为“月盛斋马家老铺”，店铺位于前门里户部街路东，迄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马氏一门五代以制售酱羊肉、烧羊肉、酱牛肉等著称，享誉京城。1950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为扩建天安门广场，将户部街上的月盛斋迁至前门外大街五牌楼路西的永增和银号旧址（原门牌号为前门大街 3 号），1956 年公私合营后，建立了熟肉食品加工场，扩大了经营范围。“十年动乱”期间，月盛斋曾改名为“京味香”，1979 年重新恢复了老字号。1988 年荣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之后建立了月盛斋前门专卖店。90 年代中期引进了日本软包装食品生产线，形成了日生产 1 万袋的产品规模。如今的月盛斋，除前门专卖店外，在全市各大食品市场、超市等还设立有月盛斋清真专柜。

现今的月盛斋前门店坐落在前门商业街五牌楼的西北角，与大北照相馆相对而望。





正明斋饽饽铺　总号开业于清咸丰十年（1860 年）。位于前门外煤市街路东，是清末以来北京有名的满汉糕点铺。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瑞芳、正明、聚庆诸斋，此三处，北平有名者。”正明斋所售糕点品种齐全，制作质量高。根据季节出售不同的品种，春天有藤萝饼、榆钱糕、玫瑰饼；二月二龙抬头有太阳糕；夏季有五毒饼、绿豆糕；中秋节有自来红、自来白等。除供应时令糕点外，还供应特需的糕点，如京城百姓婚丧喜庆之事，祭祖的堂供，各寺庙中祭佛的糕点等均来自正明斋。从清朝咸丰年间总号创办算起，经过清末、民国，先后开设有七家店铺。直至 1949 年前开始走向衰败，总号关闭，六家分号只剩前门大街一家，“十年动乱”又遭摧毁。直到 1980 年正明斋才又恢复了老字号，得到新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和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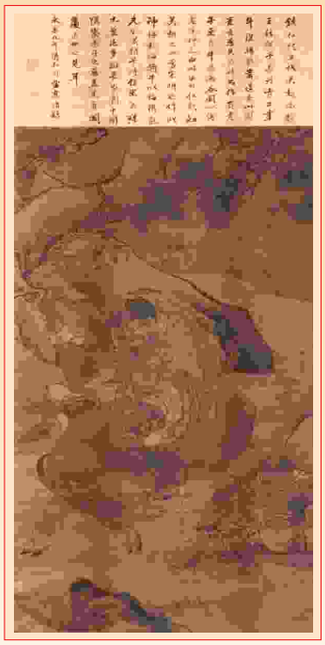


图1 《钟馗驾牛图》画心修复前

明 代《钟馗驾牛图》色彩分析

何秋菊 楼朋竹 范胜利



图2 《钟馗驾牛图》修复后

一、前 言

明代大幅《钟馗驾牛图》为绢本设色宣和裱挂轴画，作者高淮，文物尺寸 275cm×92cm；画心尺寸 166×71cm（图 1）。原画经后人修复过，采用以绢整托原画心的方法，但因后托的绢丝较粗，并且染色偏青黑，补色后造成补洞颜色偏暗。在钟馗的红色绶带与牛腹处有两处补洞颜色空缺，造成画面色彩近看有些不协调，需要全色。画身水污严重，尤其天地水渍污垢较重，天头和地头左半有油污；画心已酥脆，左半部边起翘多处，布满破洞且有污渍和白霉。

传统古书画修复中的全色环节是残破古书画恢复整体性、原有作品风貌的关键环节之一。古书画修复中的全色主要依靠全色者的经验及绘画修养进行配色、补色。全色材料多采用市售的丙烯颜料、国画颜料等，与古代绘画所用材料并不一致。因古书画历年较久，颜料颜色及成分不可避免的产生变化，运用现代书画颜料调配很难还原古书画的色彩风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固有色彩，恢复古书画气韵，采用无损检测方法对古书画颜料进行成分、配比、保存状况以及全色前后色彩对比等研究已成为古书画科学修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对于国内古书画修复中全色环节中的色彩还原研究鲜有报道。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字画组修复人员针对画像的损坏现状，依据文物法所规定的原则对该画进行了除尘、易脱落部分的加固、清洗、整形、缺失处全色、装裱等处理，使该画像重获生机（图 2）。实验人员利用均匀色空间法对该画像全色前后及污染等处进行了色彩量化分析，并采用漫反射光谱技术对印泥红色颜料成分进行鉴定。结果表明，该研究作为一种简捷的无损分析方法在书画的全色中的色彩还原等研究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二、分析仪器和方法

文物颜色的测量要求测试过程中文物样品不能被加热、刻划或破损，分光测色仪可符合这样的要求。仅需要将样品置于仪器测试孔下，通过测量其反射光谱即可得到颜色。实验仪器选用美国 X-Rite 爱色丽 SP64 便携式分光光度仪。仪器测试条件为：光源选用脉冲钨丝灯，钨丝灯能够提供重复稳定的光束，可以满足外观颜色测量对光源的需要；含光方式采用包含镜面反射（SPIN），能够反映物体的真实颜色；标准光源采用的色温为 6504K 的正常日光（D65），观察角为 10°；最小测量面积：MAV（直径 φ4mm）；反射分辨率：0.001%；测量光谱范围：400～740nm，每隔 10nm 取一个值。

三、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画像色彩量化

1、测色理论基础

色彩是视觉对象发出的（或反射、透射的）300-700nm 波长的电磁波在人的大脑中枢神经中产生的一种物理心理刺激。对色彩的主观评价常常受到观察光源、观察环境、观察者以及色彩观察模式多种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因此，要把人们对色彩的主观感受用客观值定量地表示出来。

1905 年美国画家 A.H. 孟塞尔发明了孟塞尔表色系统，即任何颜色按照它的色调（H），亮度值（V）和饱和度（C），表示为一个字母数字组合（HV/C），并利用孟塞尔色卡做目视测定。其他数字表示颜色的方法是由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研究出来的，最为著名的两种方法为 Yxy 色空间法和 L^* a^* b^* 色空间法。前者是于 1931 年根据 CIE 规定的三刺激值 XYZ 发明出来的，后者是于 1976 年发明的，给出了更为均匀的相对于视差的色差。这两种色空间法现已在全世界用于色彩交流。

量化色彩的量具是色差计或分光光度仪。由于色差计测量精度低，因此分光光度仪使用较为普遍。分光光度仪是在稳定的标准光源下，模拟标准观察者的视觉感度对视觉对象对光的分光能量分布值的评价，它不必考虑环境变化及照度的影响，而且也不受被测物体周围环境的影响。能够迅速准确的进行物体表面颜色测量，可在各种表色系统，如 CIE Yxy、CIE LAB、Hunter LAB、CIE LCH 等进行绝对值和差值测量。

2、色空间选择

采用 1976 年 CIEL^* a^* b^* 色空间法（图 3）无损监测画像颜色。在这一色空间中[①]，图中 $+a^*$ 为红色方向，$-a^*$ 为绿色方向，$+b^*$ 为黄色方向，$-b^*$ 为蓝色方向。L^* 是垂直坐标，是亮度的计量单位。色度变化由下至上变明亮。当 L^* 值为 0 时，则物体完全吸收光，呈黑色；当 L^* 值为 100 时，则表示物体全部反射光，呈白色。导出值色差变化 ΔE 表征颜色变化状况，色差△ E 值越大，物质的颜色变化就越明显，数字表达式为[②]△ E=[（△ L^*）^{2}+（△ a^*）^{2}+（△ b^*）^{2}]½。ΔE 大小决定了色差程度的大小（通常仪器测量误差 ΔE ≤ 1），具体见表 1[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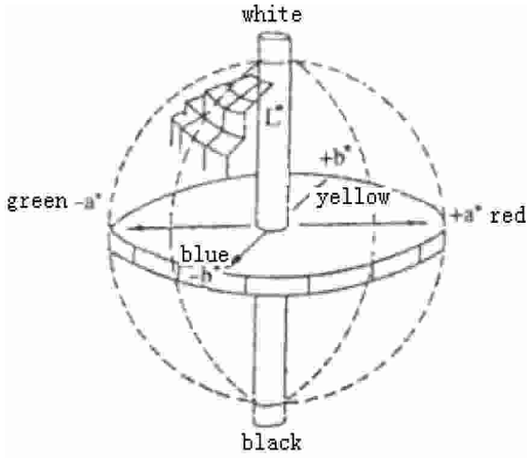


图3　Lab表示的色差立体图

表 1　ΔE 与物质颜色变化的关系

物质颜色的变化	ΔE
微量	0—0.5
轻微	0.5—1.5
能感觉到	1.5—3.0
明显	3.0—6.0
很大	6.0—12.0
截然不同	12.0 以上

3、测色结果与讨论

本文采用 1976 年 CIEL^* a^* b^* 色空间法考察了画像修复后的全色效果，对污染现状进行评价以及对画像主要颜色进行量化记录，统计结果见表 2。

对比《钟馗驾牛图》绶带尾部原全色处和新全色处测试结果可知，新全色处的颜色比原全色处亮度 L^* 稍微增加，b^* 值增大，略有泛黄，两处之间的色差△ E 为 3.03，差别较小。牛腹处原全色处和新全色处的色差△ E 仅为 1.79，差别轻微，新全色处亮度 L^* 稍有增加。根据文物修复可辨识性的原则，远看趋于一致，近看有所区别，这样的全色效果应该是符合要求的。

对比诗堂原色处和污染处测试数据可知，污染后亮度 L^* 明显降低，a^*、b^* 值均有所减小，表明红黄色褪色变浅，色差△ E 达到了 7.89 属于很大的差别。由天头绫子的数据可知，褪色处亮度 L^* 明显增加，b^* 值增大，表明表面泛黄。

测试点印泥、梅花等的数据是一个颜色的无损监测量化记录，例如对比红色印泥、粉色梅花、红

表 2　明代《钟馗驾牛图》色彩统计

测试点	绶带尾部		牛腹处		诗堂		天头绫子	
	原全色处	新全色后	原全色处	新全色后	原色处	污染处	原色处	褪色处
L^*	38.37	39.89	32.82	34.49	63.42	59.86	56.73	61.01
a^*	10.47	10.69	4.19	4.8	7.02	5.11	−5.94	−3.18
b^*	16.86	19.47	13.06	12.83	29.96	23.18	4.52	9.26
ΔE	3.03		1.79		7.89		6.96	
测试点	印泥	粉色梅花	红色绶带	画芯上小红果	黑色山头	蓝色裤边	右侧竹叶处	下方竹叶处
L^*	51.73	46.95	36.78	36.45	27.58	40.15	37.01	36.2
a^*	19.33	5.22	8.19	10.07	2.36	0.68	4.05	4.46
b^*	23.19	18.03	15	16.88	5.76	11.59	16.37	15.69

色绶带及画芯小红果的色彩数据，可知印泥亮度、红黄度最大；粉色梅花亮度次之，红度偏小，相对黄度偏大；红色绶带亮度较小，比粉色梅花稍偏红；花芯上小红果亮度最小，较红。这些客观数据与主观人眼观察效果相一致，而且更为准确一些，颜色量化数据可为画像的全色、清洗和复制品的制作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可作为一个档案资料保存，以考察画像修复完毕后，在保存过程中颜色的稳定性情况。

（二）印泥颜料无损分析

1．颜料鉴定理论基础

漫反射光谱技术是通过测量待测物对不同波长光的漫反射，获取有关物质表层信息的一种光谱分析技术。根据对大量彩绘颜料的反射光谱研究④⑤⑥，得知颜料的漫反射光谱曲线（R ～ λ）大致分 3 种类型，即“钟”型、“S”型和“斜线”型。一般蓝、绿色的颜料就属于“钟”型，钟顶所在的位置称为特征反射峰，每种蓝绿色颜料的反射峰所在位置不同；属于“S”型反射光谱的颜料有红、黄色的铅丹、朱砂、土红、石黄、藤黄等及其混合颜料。因该反射光谱呈“S”型而没有特征反射峰，所以很难直接根据（R ～ λ）曲线进行颜料种类鉴定分析，若令 R 的一阶导数为 D'（D'=dR/dλ），从而“S”曲线的中间部位斜率最大，出现一阶导数特征峰值，可对红、黄色颜料进行判定；白黑色颜料及介于之间的灰色颜料反射光谱曲线呈现“斜线”型，即无特征峰也无一阶导数峰，因此此类颜料不能采用该技术鉴定。

2．《钟馗驾牛图》印泥分析结果

印章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按汉制是指某官之章或印，表官职高低，后来广泛应用。除日常使用外，又多用于书画题识。印泥为古人封缄用泥，泥上盖印，故称印泥。印泥是印章的专用涂料。旧制印泥多以银朱或朱砂等为主要色素，经历了水印、蜜印、油印三个发展阶段⑦。现代所使用的印泥是仿朱砂印泥，其中并无朱砂成分，而是以红粉和黄粉为颜料混合艾绒、蓖麻油等制成。红粉为色泽鲜艳，着色力和遮盖力强；黄粉在印泥中主要起调色作用，使红粉的颜色泛黄，接近朱砂的颜色，即所谓仿朱砂印泥。

为了验证文献所述，采用分光光度仪在可见光范围内（400 ～ 740nm）对画像印泥红色颜料进行无损鉴定。图 4 为红色印泥的反射系数－波长反射光谱曲线，反射光谱曲线呈“S”型，通过对图 4 求一阶导数作图可知在 600nm 附近出现一个特征反射峰，该特征峰与标准朱砂特征反射峰位置⑧完全吻合，所以推断该印泥中所含红色颜料应为较纯正的朱砂（HgS），保存状况较好。印泥质量好坏主要决定于朱砂和蓖麻油的质量。其中朱砂是色素成分，它的化学性质较稳定，在强紫外光下，由红色六方晶系（α－HgS）转变为黑色立方单斜晶系（β－HgS），朱砂有一定毒性，可以防虫蛀，在古代常被作为颜料使用，所谓的“朱笔”沾的就是朱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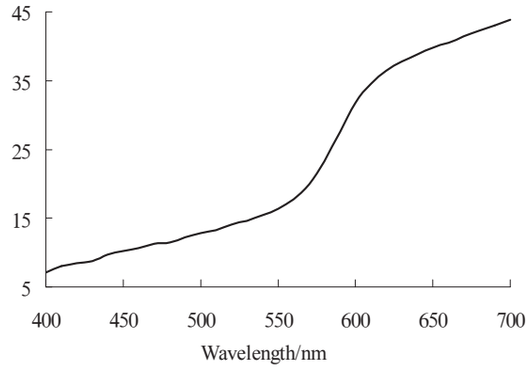


图4　红色印泥的反射光谱曲线

四、结　论

通过采用色空间法和漫反射光谱技术对明代《钟馗驾牛图》进行色彩分析表明：

(1)明代《钟馗驾牛图》绶带尾部及牛腹处原全色处和新全色处差别轻微，修复全色效果良好，达到了修复标准。

(2)红色印泥颜料成分为较纯净的朱砂，与文献描述一致。

(3)该研究作为一种简捷的无损分析方法在书画的全色中的色彩还原等研究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①卢英、武筠、郭莉珠：《档案保护实验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②③汤顺青：《色度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年。

④ Norman F. BarnesColor，Characteristics of Artists’ Pigments.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29，1939，(5)：208－2141.

⑤⑧王丽琴、周文晖、赵静：《光导纤维光谱技术无损鉴定彩绘文物颜料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7 年第 4 期第 19 卷。

⑥范宇权、李燕飞、李宗仁等：《莫高窟第 285 窟南壁多光谱无损分析初步报告（Ⅰ）》，《敦煌研究》2007 年 5 期。

⑦所桂萍：《印泥演变探究》，《档案》2001 年 2 期。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助理馆员）

北京市文物局2009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4月7日 启动天坛、香山、颐和园等11处文物保护单位开放区域部分建筑的安全检测工作。

4月8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女士来到大觉寺参观视察。

4月10日 在首都博物馆召开“2009年北京地区博物馆工作会议”。大会对2008年北京地区博物馆事业发展情况进行回顾，同时部署了2009年博物馆工作。

4月18日 在八达岭长城成功举办“明长城长度数据发布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王至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国家测绘局局长徐德明、市政府副秘书长侯玉兰等有关领导出席了发布仪式。

4月21日—24日 在大觉寺干部培训中心举办两期局系统法制培训班。局领导、局机关全体公务员，局信息中心、北京市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北京市文物进出境鉴定所全体工作人员及局属各单位馆长、书记共135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班邀请市法制办周继东主任做了题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专题讲座，《中国文物报》彭常新书记做了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专题讲座，邀请市法制办二处王子强副处长对《北京市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进行了解读。

4月24日 通过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组对北京市明长城资源调查资料审查验收工作。

4月28日 设立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并筹建评审委员会，印发《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管理规定（试行）》和《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评审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

4月29日 《周口店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经2009年3月31日市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4月29日予以公布，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5月11日 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报送市政府法制办。清理结果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决定保留的规范性文件8件，决定修改的规范性文件8件，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9件。

5月16日 参加“北京市科技活动周东城区会场”活动，摆放文物保护宣传展板，发放文物保护宣传册并设立咨询台。

5月18日 北京地区纪念第33届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隆重举行。今年博物馆日的口号是“魅力博物馆 人文北京城”。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启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北京市文物局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辉煌的成就 华彩的乐章——北京博物馆60年》主题展览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首展，之后在北京18个区县进行为期半年的巡展。

5月22日 在朝阳区体育中心成功举办北京市文博系统第五届运动会。共有37支代表队参加，包括市文物局机关、各局属单位及各区县文化委员会，运动员总数达到1900人。首都博物馆、市文物公司、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取得了团体总分前三名，文物局机关、朝阳区文委等12支代表队获得精神文明单位奖，其余25支代表队获得优秀组织奖。

6月2日 在首都博物馆多功能厅举办学术报告会，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做了题为《留住城市文化的“根”与“魂”——试论科学发展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报告，市文博系统约300人与会。

6月2日—5日 “2009年博物馆文物保管人员培训班”在孔庙国子监博物馆多功能厅举办。全市近50家文博单位的90余名保管业务人员报名参加，培训内容包括藏品的科技保护、保管人员应遵循的法律法规知识、保管岗位工作职责及相关工作流程规范、藏品相关信息的数字化处理、藏品实物拍摄基础知识、学术论文写作、藏品环境的安全保护措施及应急预案的制定、文物保管工作的道德规范等内容。

6月4日—5日 举办市文物局青年暨中层干部培训班。100余名35岁以下青年干部和中层干部参加培训。党组书记、局长孔繁峙同志为培训班做动员报告，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国民同志，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张若妮同志及巡视员巴爱民同志分别为培训班授课。

6月10日 作为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科

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组织单位，审核并推荐北京市单位申报国家文物局课题 17 项。

6 月 11 日 与拉萨市考察团召开座谈。6 月上旬，拉萨市副市长计明南加率领拉萨市文化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一行到我市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考察。

6 月 12 日 向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2009 年度增补项目”6 项。其中，图书资料中心申报的“1949 年以来北京城区寺观变迁研究”获得批准，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

6 月 13 日 “关爱北京文化遗产，建设人文北京”大型公益宣传活动于历代帝王庙成功举办。活动回顾了北京文物保护六十年历程，发布了长城、大运河、文物普查等三项大型文物调查工作阶段成果，并发布了北京文物保护公益歌曲《心中的城》MV。

6 月 17 日 公布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评审委员会人员名单。

6 月 19 日 根据四川省什邡市意见及文物修缮对口支援工作计划，市文物局与什邡市政府联合组织召开了什邡市龙居寺修缮工程方案专家预审会。

6 月 22 日 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西剖面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计划在年内完成。考古工作的实施将对遗址危岩进行清理，确保遗址和游客的安全，并结合考古工作加强遗址在地质学、人类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6 月 26 日 根据四川省什邡市意见及文物修缮对口支援工作计划，市文物局与什邡市政府联合组织召开龙居寺修缮方案研讨会。

6 月 22 日—30 日 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33 届大会，并向大会介绍了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有关情况。

6 月 28 日 “《周口店遗址保护管理办法》普法展”在房山区周口店镇山口村展出。展出的同时向村民发放“博物馆书签”、“北京人杂志”、“法规小册子”，受到村民的欢迎。

6 月份 完成了佛舍利赴云居寺展览的安全保卫工作。

2 季度 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88 周年暨表彰大会，对首都博物馆等 6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温桂华等 11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靳建春等 49 名优秀共产党员予以表彰。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要求，完成了“三定方案”的修订工作。

共收到市政府扩需办下发项目 557 项，已完成全部项目的核查工作，共 20 个项目需要办理文物手续，其中 8 项已完成。

在全市文博系统进一步开展了“平安北京”建设与火灾隐患合围攻坚行动，按要求实施了督导检查，对重点文保单位的火灾隐患进行了突击排查整治。

落实了局属单位的安全承包责任制，签订安全责任书。

开展文物安全工作知识竞赛，对局属单位干部职工的“应知”、“应会”知识技能进行了考核。

召开局属单位落实文物安全工作长效机制总结工作会，全面启动文物安全工作三种级别防控方案。

接待公、检、法等有关部门涉案文物鉴定 10 次，鉴定涉案文物 80 余件。

对 72 家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巡视检查，对 17 家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抽查。

2009 年第二季度市文物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生	老人
首都博物馆	243391	42751	200640	33470	29726
大觉寺管理处	63162	52632	10530	419	4269
正阳门管理处	75931	71834	4097	96	2469
徐悲鸿纪念馆	12875	0	12875	1067	2789
北京文博交流馆	13349	10854	2495	665	755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3.10–5.10 闭馆装修）	2445	0	2445	583	807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13910	0	13910	5720	1190
北京艺术博物馆	205333	202973	2360	478	802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8904	0	8904	167	840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8504	0	8504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12526	5093	7433	1693	2507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6711	3358	3353	463	838
白塔寺管理处	15040	6978	8062	195	2697
老舍纪念馆	6289	0	6289	2179	1985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	15861	13892	1969	172	1797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30589	28962	1627	71	871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101454	46669	54785	4034	119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陈晓苏主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402-0522-5

Ⅰ.北… Ⅱ.陈… Ⅲ.①文物工作－北京市－文集②博物馆工作－北京市－文集 Ⅳ.G269.2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931号

北京文博(2009 *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100007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邮箱)

中国印刷总公司

889×1194毫米 16开本 6.5印张 193千字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5元